

社論

從世界體系透視台灣 與南韓的政治變局

這個月，台灣與南韓的政局分別有了不同的變化。

由南韓的反對黨、學生與宗教團體於5月27日聯合組成的「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為了要求修憲以實行總統直接民選，從6月10日開始，在全國發動了持續17天，共兩千一百多次的示威遊行。17天中，參與示威的各階層民眾達73萬人，大學生為民前鋒，屢屢悍不畏死地與警察激烈對抗，終於迫使執政的民主正義黨及其後台——美國不得不俯順民情，根據長期以來反對勢力的民主要求提出政治改革方案，為南韓進一步的民主化打開了契機。

台灣方面，爭議頗久的「國安法」在民進黨發動了「五·一九」與「六·一二」兩次規模大小不一的抗議行動後，國民黨依然運用沒有民意基礎的表決部隊，強度關山，於6月23日在立法院逕行通過。

台灣與南韓的政經體制相類似，也同處於政治轉型期，何以政局會有這樣不同的變化？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九五〇年代初，美國為了圍堵共產勢力在亞洲的擴張，對岌岌可危的台灣與南韓進行大量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把兩地編入了國際反共政治體系中。

及至一九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美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極需輸出資本，並利用不發達國家的低廉勞力來生產美國所需的勞力密集產品。美援遂成了美國達到此目的的利器。美國一方面要求台灣運用美援建設電力系統、通訊設備、交通要道，及培養技術、管理人才；一方面透過「美國國際開發總署」(AID)積極壓迫台灣與南韓政府進行經濟改革、培育私營企業；就這樣雙管齊下地在兩地製造了有利於外資進入與私人企業成長的環境。於是，在六〇年代初期，台灣與南韓都採取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從而被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台灣與南韓的發展有幾個共同的特徵：一都是靠美國扶持起來的，二經濟上，都依附於美、日兩國而有了附庸的發展，三都是由高度集權的政府主導、策劃經濟的發展，四都壓制工人運動、控制工會以確保低廉的勞力。

但二者在同中又有異，那就是南韓的資本集中的程度遠高於台灣。南韓為求加速經濟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不惜大舉外債，並以低利優惠貸款及貿易保護等政策培植大財閥，建立了民族工業與企業。1985年的世界五百大企業中，南韓就有十家上榜，「三星」、「現代」、「金星」、「大宇」四家財閥的排名更在前50名內。但這樣一來，南韓的經濟由少數財閥壟斷，造成財富集中、貧富懸殊，導致民眾強烈的不滿，加深了社會的矛盾，也增高了政治的不穩定性。南韓大學生的左傾激進化，並與勞工結合，從事工運，與此有莫大的關係。

相形之下，台灣的當政者，一方面鑒於大陸失敗的慘痛教訓，較南韓重視社會的穩定與所得分配的平均；一方面也為了鞏固官營資本，故此並不刻意培植大財閥，而由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台灣的產業結構不像南韓那麼兩極化，政治、社會的穩定性也就相對地比南韓來得高，不易造成大規模而激進的群眾運動。

南韓群眾在這17天的示威遊行中，反美情緒甚為高漲，抗議的矛頭同時指向美國與全斗煥。雷根、全斗煥的銅像及美國國旗都被當眾燒燬，釜山的美國領事館也被迫關閉。這有兩個因素：第一，美國向來把南韓的戰略地位置於人權、民主之上，40年來一貫支持掌握實權、能穩定局面的獨裁者，從李承晚、朴正熙到全斗煥都得到美國的鼎力支持，特別是1980年美國協助全斗煥鎮壓光州事件，血腥屠殺兩千多人，更令學生與民眾切齒痛恨美國帝國主義對南韓內政的干涉與支配。第二，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只能容下一兩個霸權，南韓在產業結構上的力爭上游，使美、日兩國備感威脅。美國從七〇年代末期即視南韓為潛在的競爭對手，亟思置南韓經濟於其控制下，庶幾既可免危及美國的產業，又利於與日本競爭。1978年，美國國務院官員即表示美國對韓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是：「不讓南韓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成為第二個日本。」1980年以來，美國時時施壓要南韓開放壁壘，讓美國的農產品、服務業及高科技產品等進入韓國市場，全斗煥政權對此態度軟弱，不敢抗拒，頗令南韓的民族工商業者及右翼民族主義者不滿。今年初，美韓雙方在漢城談判301條款問題時，南韓民眾甚為激憤，官方不得不派出全副武裝的警察護衛會場，足見反美情緒之高。這次的示威是南韓左右派聯合大反美帝，尤其中產階級也加入遊行行列，這除了因刑求大學生朴鍾哲致死案造成的信任危機外，經濟因素當亦為一要因。美國此番也正是驚慌於反美、反獨裁勢力之強，恐怕若再支持全斗煥用武力鎮壓會造成更大的動盪，危及它在南韓的支配權，而予北韓可乘之機，才極力迫使民正黨讓步，串演出虛泰愚的民主宣言戲。

南韓執政黨承諾進行的八項政治改革能根本解決南韓的政治問題嗎？在導致政局不安的結構性因素沒有消失之前，恐怕不可樂觀。南韓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正面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國內則有要求財閥解體的強烈呼聲，加上勞工意識日益覺醒，工運漸興，學生與工人、農民的結合愈趨緊密，這些都是影響南韓政局的關鍵因素。

台灣執政黨也宣布將於七月解除戒嚴，但台灣同樣面臨國際市場的挑戰，產業結構的升級卻窒礙重重，未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能否再持有競爭力？無疑將對台灣政局有決定性的影響。

海峽

雜誌

The Channel

第二期



本期要目：

專輯：還我教育人權

王義雄、張忠棟、張曉春、林玉體、王曉波、王冬冬、林志

張大林：從「國安法」看國民黨的統治哲學

王冬冬：我們對「六·二二」的看法與呼籲

王度譯：新馬克思主義大師盧卡契訪問記

余宗理譯：亞洲的跨國公司與工會

陳若曦：東北遊記

還我教師權

還我教育人權

還我教師權

還我教師權

發行人 / 盧思岳

社務顧問 / 王津平 王杏慶 王義雄 李榮武
周合源 林孝信 林宗男 洪銘水
許登源 許達然 莫宗堅 陳映真
張曉春 黃溪南 蘇慶黎 寧明杰
楊祖珺 蔡仁堅 葉芸芸

社長 / 王拓

總編輯 / 杜崇仁

編輯委員 / 本刊編委會

執行編輯 / 余宗理

編輯部 /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11號10樓之1

電話 / (02)7012930 (02)7052635

發行所：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5弄7號4樓 111

郵撥帳號 / 1134151-2號盧思岳

零售：新台幣90元

長期訂閱：國內：全年新台幣900元，半年450元

國外：空運全年歐美地區美金60元

亞太地區美金51元

港澳地區美金45元

海外通訊訂閱處：China Tide Association,

P.O.Box 1724, New City,

N.Y.10956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Tide Association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伍捌伍伍號

經銷處	台北	聯宏書報社	(02)5620282
	基隆	宏恩書報社	(032)316843
	內壢	國華圖書供應局	(03)4553456
	中壢	志昇書店	(03)4251897
	新竹	文強堂	(035)253101
	苗栗	英華書局	(037)320810
	台中	全元書報社	(04)2700617
	嘉義	嘉聯圖書供應社	(05)2354993
	台南	永茂書報社	(06)2642655
	高雄	麗志書報社	(07)3849410
	屏東	環球書局	(08)7323071
	宜蘭	民生書店	(039)323765
	花蓮	花蓮文具店	(038)322941
	台東	徐氏圖書文具行	(089)322267

目錄

海峽 76年 7月號

社論

1
Correction
Page 0

專輯

還我教育人權

「教育人權座談會」記要

——王義雄、張忠棟、張曉春、林玉體、王曉波
王津平、林繼文、林志修

30多年來，在黨化教育的控制下，台灣的教師與學生的人格未受尊重，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橫遭剝奪。近一年來，從大學教授、大學生到中學教師都不再甘於受縛，力圖爭回尊嚴與人權，然而，路途艱難，荆棘叢叢。

《專 輯》	「台大教授聯誼會」為何難產？	●游賢達 18
	訪「台大教聯會」籌備發起人黃武雄教授	●游賢達 20
	被壓迫者的覺醒與怒吼	●本刊 22
	——專訪石文傑談「教師人權促進會」的使命	
	還我教師人權——六·一三辭職抗議活動演講稿	●李勤岸 26
	教師人權促進會成立宗旨及工作目標(草案)	28
	還我學生權！	●林佳龍 29
	國民黨如何控制校園？	●吳介民 30
<hr/>		
《海峽論壇》	不容公權力淪為政客謀利的工具！	●王義雄 31
	——王義雄立委質詢稿	
	審慎記取歷史教訓	●王 拓 33
	——我對「六·一二」的看法與呼籲	
	從「國安法」看國民黨的統治哲學	●張大林 36
<hr/>		
《圖片特輯》	「六·一二」事件寫真	40
《世界之窗》	七千萬台幣的幫兇費	●邱平妹 46
	林德之死	●何 胸 48
	雷根政府“強暴”美國保護民權的準則	●白 波 49
	柯拉蓉與菲共又要攤牌？	●李 建 51
	美國給瓜地馬拉留下爛攤子	●林仁傑 53
《人 物》	新馬克思主義大師盧卡契訪問記	●王度譯 54
<hr/>		
《經 濟》	剖析台灣的民營壟斷資本(下)	●李榮武 66
《香江話題》	楊尚昆訪美揭開對台新攻勢序幕	●韋 名 78
	他們真的愛香港嗎？	●韋 名 81
《勞工廣場》	亞洲的跨國公司與工會	●David Kowalewski/余宗理譯 82
	加工出口區抑或“加”害勞“工”出口區？	●姚國建 91
《文化批判》	期待台灣電影長大	●李荒原 93
	——對電影「期待你長大」的一些觀察	
《文 藝》	七十年代大陸新詩選析(上)	●高 準 95
	台灣人看草原(下)	●陳若曦 106

王拓出獄後的兩本傑作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 / 著

入獄將近五年的王拓，在監獄黯淡的燈光和灰逼的牢房裏，完成了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是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在苦難中堅持理想的具體表現。不僅在他個人的生命史和寫作上具有深刻的意義，對於這一代的台灣社會和青年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所描寫的，都是這一代台灣青年的理想和悲劇，他們為理想受苦，也在受苦時堅持理想。他們的理想和遭遇，值得每一位關心台灣與中國前途的人深思。

定價 / 200元

台北，台北！ 王拓 / 著

「台北·台北！」描寫了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風潮下，台北青年學生和工人激盪的思想和行動。自身在七一年保釣風潮中覺醒，在七五年台灣新一代民主運動中歷練，又投身在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中的王拓，以這長篇力作，刻劃了在思想、文化、政治上的探索、鬭爭、勝利和挫折，並且在苦悶、希望、愛慾和掙扎中燃燒的「保釣一代」的大河系列！

定價 / 上下500元劃撥六折

郵政劃撥10784418~8王拓

讓海峽成爲你和朋友們 共同的精神食糧

透過海峽，你們的友情更踏實翱翔的天地更遼闊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主管：_____

經辦員：_____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 1 1 3 4 1 5 1 - 2 號
戶 名	盧 思 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郵 局 郵 票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元
次	元

優待本刊長期訂戶：

● 每本訂價90元，全年十二期特價900元

掛號每年另加120元

● 國外一律航空郵寄：

歐美地區 \$U.S. 55元

亞太地區 \$U.S. 51元

港澳地區 \$U.S. 47元

局號：_____ 收據號碼：_____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 1 1 3 4 1 5 1 - 2 號
戶 名	盧 思 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郵 局 郵 票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續費	元
次	元

主管：_____

經辦員：_____

一、銀行交換票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日，以前存單。
存款局無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向，俾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請
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朋友！你關心台灣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嗎？

請閱讀最具前瞻性、進步性、思想性、批判性的

海峽雜誌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國外訂閱費率・歡迎為親友訂閱

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

通信欄

《海峽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新訂戶 續訂戶 電報掛號

■從 年 月起訂閱海峽雜誌，至 年 月止。

■訂閱(購)人(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_____ 先生/小姐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郵區□□□□□□

■郵寄方式：平寄 掛號(每年加120元)

■年 齡：25歲以下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職 業：公教 工商 金融 服務業 製造業
建築業 自由業及專業 學生 其他

■教育程度：高中 大學 研究所以上

此欄係請寄件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回覆應以關於該社之訂閱服務為限。否則應另寄寫。

六十年前，台灣人民就組黨了

邀請您參加兩項活動

六十年前的七月十日，台灣人民成立了第一個合法政黨——台灣民眾黨。

六十年前，在異族統治下，台灣人民曾經在民眾黨的領導下，風起雲湧，組織群眾，喚起群眾的民族意識與民主意識。

四十年來，我們深深感到：「民主尚未成功，同胞仍需努力！」
四十年來，民眾黨創黨領袖蔣渭水先烈的叮嚀：「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一直提醒著我們。

在紀念民眾黨創黨六十周年的今天，有感於此，我們將進行下列二項意義重大的活動，盼望您踴躍參加，也找您的同志、朋友一起參加：

一、向蔣渭水先烈上香致敬

時間：七月九日上午九時

集合地點：台北市六張犁崇德街一三二號福德宮（與富陽街交叉口）

二、台灣民眾黨創黨六十周年紀念大會

時間：七月十日晚七時

地點：金華國中大禮堂

（台北市新生南路、金華街交叉口）

夏潮聯誼會

會長 王拓

副會長 黃溪南

敬邀

聯絡電話 .. (02) 7012930 . 7052635

◎專 輯◎

「教育人權」 座談會記要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施行黨化教育未竟全功，撤退來台後，認為大陸的失陷固有多因，思想戰失利實為大端。為了鞏固政權，國民黨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嚴密控制思想、教育，在校園中進行了相當徹底的黨化教育。教師與學生的人格被踐踏、侮辱，未受到應有的尊重，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更橫遭剝奪，教育生機因而大受挫傷。近年來，因社經結構快速變遷，政治民主運動的聲勢日壯，久被禁錮的校園也無可避免的受到了衝擊。大學、中學的教師與學生紛紛敲出教育改革之聲。去年10月，台大「自由之愛」的學生提出大學自主、學生自治的校園民主改革，今年5月11日更於學校中遊行呼籲校園自由化，9名主要成員因而險遭退學、開除的處分。5月初籌備多時的「台大教授聯誼會」也在成立時，飽受干擾；5月中旬，台中私立立人高中教師石文傑因印發不為當道所喜的文章給學生閱讀而遭到解聘的威脅，中山大學講師李勤岸因不齒余光中任人唯親的腐敗特推行為乃憤而辭職，兩人痛感教師人權之受漠視而籌組「教師人權促進會」。凡此皆見台灣教育界要求教育人權與教育改革之勢已如春雷乍響，必將激起更大的響應。本刊特製作專輯，為收回教育人權效鼓吹之力。——編者



王義雄

立法委員

「一些比較有骨氣的老師，想要努力掙脫政治的枷鎖，爭取學校的自治、學術的獨立，恢復學術上的自由，使我們的教育、文化，能蓬勃的發展，不受政治的污染與干預，因此而付出了代價。」



過去四十年來，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透過學校，有系統的灌輸、訓練、管理學生，以達到政治的目的。四十年來，政治伸入了校園裏，教師如果不聽執政黨的話，就拿不到聘書。教師爲了求生存，只有委屈求全地待在校園裏，一些比較有骨氣的，就想努力掙脫政治的枷鎖，爭取學校的自治，學術的獨立，恢復學術上的自由，使我們的教育、文化，能蓬勃的發展，不受政治的污染與干預。一些老師因此付出了代價，但還必須一波一波的人努力去爭取，才能把學術從政治的枷鎖釋放出來。如果大家漠不關心，自求多福，一定會有更多的人爲了追求學術自由而付出更高的代價。

現在整個教育的問題就是出在學校不能自主。執政黨對大陸學潮的陰影還在，撤退到台灣後，雖然台灣大學在傅校長的主持下，有一度顯現以前北大學術自由的風氣，可是，傅校長過世之後，執政黨透過了人事上的委派，經濟上的支配，各種法規如大學法的制定，一步

一步地就把校園政治化了，甚至黨部、教官、情治單位也都伸進去了。結果教授爲了保住飯碗，自己設限，唯恐超越了限度，受到政治的干預，下一年度無法拿到聘書，於是學術就喪失了它的良心、自由。學生就陷在統治者所設定的教育模式裏，沒有判斷力，一到外國去留學，就產生所謂的文化衝擊，有很多人便懷疑起台灣的教育方式，甚至對執政黨採取敵視的態度。這就可以證明，四十年來執政黨的教育是失敗的。

四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突破。經濟的自由，必然也推動政治上的自由，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必然也會推動學術上的自由獨立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現在所產生的「教授聯誼會」及台大學生五一學生日的活動都是隨著政治、經濟自由化的必然走向。執政黨要擋也擋不住。在報章上我們看到，本來台大要阻止教授聯誼會的成立，也打算以退學、開除來處分「五一」學生日帶頭的幾位學生，但是，社會各階層的反應非常劇烈，才以象徵性的處罰，記小過來處理。這是政治自由化所必然帶來的，怎麼壓也壓不住。

談到教師聯誼，現在「夏潮聯誼會」爲了保障全國教師的權益，也準備組織「教師工會」，從工會法的觀點來看，第四條有明文的規定，政府機構的行政人員、教育事業及兵工廠的人員不能夠組織工會。因此，組織工會在現行的體制下可能還有困難，除非修改現行法，否則不可能組織工會，但是在工會法還沒修改之前，爲了共同以集體的力量來掙脫政治上所加給教育人員的枷鎖，我們可以組織像「台大教授聯誼會」的方式，以集體的力量來減輕政治的干預。

張忠棟

台大歷史系教授

「是因為政治出了問題，才有學生運動，並不是先有學生運動，才有政治的混亂。」



學生運動近來比較盛，有些人開始有些恐懼，尤其當權者對學生運動一直有恐懼，認為大陸當年的失敗是學生運動造成的，在這種恐懼之下，不管學生的要求合理不合理，他都把學生運動看成洪水猛獸，想辦法要堵住它，所以，造成很多觀念上的誤差。

第一個錯誤的觀念是認為學生運動是使得政治不安的主要原因，所以大家就舉很多歷史上的例子，東漢末年的學生運動，宋朝的學生運動，明朝末年的東林黨運動，清末的太學生公車上書的運動，好像這些學生運動都在歷史上造成了政治的不安定，最後造成了亡國、改朝換代的事。我的看法剛好相反，我認為歷史上這些朝代發生學生運動是因為政治上出了問

題，才發生學生運動。東漢末年的學生運動是因為官吏濫權，宋代發生學生運動是因為賈似道這些權臣誤國，明末東林黨發生事情是因為魏忠賢這些混蛋把天下搞得大亂，清末的歷史大家更清楚，如果清廷本身很健全，政治很上軌道，何至於康梁要來變法？何至於變法不成還要鬧革命？政治不上軌道，政治不振作，政治出了問題不解決，那這些有知識的人，大學生——過去的太學生就是現在的大學生——他一定要批評政治，提出改革的要求。這歷史上因果的關係非常清楚。但我們現在就有人故意要說，歷史上很多政治混亂的局面都是學生運動造成的。實際上，是因為政治的問題出來了，才有學生運動；並不是先有學生運動才有政治的混亂，這個觀念大家要搞清楚。

大陸失敗非因學運

第二點，有人認為學生運動造成了大陸的失敗，假如當年的學生都在學校裏不管閒事，規規矩矩地念書的話，大陸不會丟掉。這個說法其實和第一個說法一樣，也犯了根本的錯誤。如果我們順著這個觀念去講，我們永遠無法領受大陸失敗的教訓。大陸為何失敗？大陸失敗前學生運動為何起來了？那是因為抗戰勝利之後，政治腐化、貪污、經濟崩潰，社會解體。政治、經濟、社會都一團糟了，學生當然不能安心唸書。學生看到政治上這樣一團糟，他當然要出來管事。這樣，學生運動起來了，乃至於演變成一個全國的學生運動。台灣也有，但規模小得多，那時候，在南京、在北平、在上海，學生運動不得了，一波一波的，幾萬人上街，那個學生運動是個果，不是造成大陸失敗的原因。是大陸失敗的現象已經非常明顯了，政治、經濟、社會整個崩潰了，年輕人看不

過去，內心想挽回這個局面，所以大家結合起來，提出改革的要求來搞學生運動。他的用心並不是要把政府推翻掉，很多人是想挽救這個政府，救這個國家，現在來算這段歷史，你說是學生運動把國家搞亡了，把政府搞翻了，這是違背歷史，違背良心的話。

連帶地談到第三點。面對現今慢慢出現的學生運動，有人說這完全因為政府決定解除戒嚴，學生不怕了，才有學生運動，解除戒嚴，政治管制一放鬆之後，將來天下大亂，不得了了，所以順著這種講法，有人認為，根本不該解除戒嚴。在過去三、四十年，在戒嚴的狀況下，沒有學生運動，現在為什麼有學生運動呢？這是因為解嚴的關係才有學生運動。這個問題有值得討論的地方，跟這個看法有關係的，今天有很多的社會運動、街頭運動、請願的活動。也有人說，這是因為解除戒嚴，政治的管制放鬆了，所以這些運動都來了。換言之，他們認為解除戒嚴是個錯誤，不應該解除戒嚴，這跟對學生運動的想法是一樣。我想提醒大家，解除戒嚴的決定是去年九月底才做的決定，在這之前，政府的態度，甚至在做決定的前兩天，政府有關部會的首長還口口聲聲說我們現在是非常時期，戒嚴決不會解除，一直到那個時候，政府對戒嚴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很堅決的。但是我要請問各位，今天我們眼見的，這許多的社會運動包括比較明顯的，台大的學生運動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至少存在兩年了。請願的運動最晚可推到洲後村的事件，大家想想那是什麼時候的事？以後當然老百姓的街頭運動很多，黨外的街頭運動很多，各種的社會運動也很多，然後，學校裏有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愈壓制，反彈愈大

簡單地講，是因為很多的運動已發生在前，然後決定解嚴發生在後，所以，所有的運動是在政府還沒有表示要解嚴時發生的。在它堅決表示要維持戒嚴時這些運動已普遍發生了。這些運動在戒嚴的條件之下是不被許可的，非法的。根據戒嚴法，林志修搞學生運動，可以給抓到監牢的。街上很多請願、示威，包括黨外的示威運動是非法的，民進黨是非法的。但為什麼在戒嚴的狀況下，政府對這些運動不去管它。如果說堅持戒嚴就不會有學生運動，在這種推理下，戒嚴是最有效的東西，那過去在戒嚴的狀態下，為什麼發生這些運動，發生後為何不管？不根據戒嚴法取締。我想告訴大家，臺灣現今政治上有很多根本的問題到現在必須要解決了，在那裏擺著，拖了很久，沒有解決，現在已經引起大家的焦慮了。但除了政治問題，經濟、社會也有問題，大家的顧慮，憂慮的也愈來愈多了，這種憂慮的心情逐漸發展出來，形成各種運動。這種運動到處都是而且搞這些運動的人也是各類都有，管不勝管。戒嚴之下不准運動，人民照樣運動。所以，今天的解除戒嚴，與其說它是一個原因，造成運動不斷的發展與擴大，倒不如說，今天的解除戒嚴多多少少都有點不得已，是爲了我們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要政治的開放。但也是因爲我們發現戒嚴不管用。過去兩年，報紙上看不到，電視上更看不到，幾十個人隨時隨地身上掛了標語，拿個旗子就跑到行政院去了，這種事情現在非常普遍，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你說是因爲解除戒嚴所以才有學生運動，而想要再恢復類似戒嚴的制度來控制學生的話，我想是辦不通。

第四個問題是學生的運動能不能去堵住它？大陸當年的學生運動，政府何嘗不想控制，

不想壓制？但是用了一切手段，警察、軍隊、水龍頭、甚至開槍，但終沒有將學生運動壓下去，學生運動愈鬧愈大。以今天來講，台大的情形，過去兩年，學生一鬧再鬧，學校想方設法也要處分這些學生。然而，表面上看起來只有那幾十個同學在鬧事情，但是因為同學被壓制後，同情或支持這些學生的人却愈來愈多。去年「大新社」被停社，最先只有幾個社團的負責人簽名支持，學校說不行，要處分。過沒幾天，三十人的聯合聲明出來了，再過沒幾天，四十四人的聯合聲明出來了，再過幾天之後，一百多個研究生的聯合聲明出來了。學生愈鬧愈大。所以，學生的運動你要去了解它。學生的要求合不合理？合理的就要正視、接納。如果不管合理不合理，就只是壓制，那樣愈壓愈糟，學生運動會愈來愈大。

張曉春

台大社會系教授

「任何社會運動的產生是基於權利受到剝奪而引起的，是人們（包括學生）用自己的力量來補足自己的權利。」



最近我提出「勞動人權宣言」，為什麼叫做「勞動人權宣言」呢？因為勞動者包括勞力與勞心。凡是吃頭路，拿人家薪水的人，全都是勞動者，所以叫做「勞動」人權宣言，而不叫「勞工」人權宣言。

三、四十年來，法律明文規定的權利，勞動者都沒有享受到。「勞動人權宣言」第四條明白說明：解僱要有法律依據。石文傑先生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青年，是一個非常盡責的老師！但這樣一個好老師，竟然是將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下被解聘，實在非常不應該。

我們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有生存權、工作權以及財產權，並且應該給與保障。假如石文傑老師被解聘了，那麼公權機構要怎麼樣遵照憲法來保護他？公權機構對教育人員的尊嚴是否能夠給予尊重，這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其次，憲法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權、訴願權、當然也有訴訟權。那麼，假如石老師他遭到解聘，假如他也依據憲法來請願、訴願，不知道公權機構如何來處理？

教師工作沒有保障

從光復以後三十幾年來，我們教育人權受到的傷害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常說要尊師，但除了國小、國中老師比較不會受到解聘外，高中、大專老師常有遭到解僱的可能，因為他們是聘任的，校長看不順眼，隨便找一個理由，便把你解聘掉。像石老師，他是介紹文章給學生看，老師介紹好文章給學生看，是天經地義的事，不然豈不是填鴨子式教育？校方既不敢公開指出石老師到底犯什麼樣的過錯，才被解聘，而只是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加以解聘，不但侵犯了老師的生存權、工作權，也嚴重侵犯了老師的人格權。我們常聽到作官

的要我們尊師重道，而老師一天到晚如坐針氈式的，隨時都有被解聘的可能，那老師有何尊嚴可言？所以我覺得石老師這件事情，嚴重侵犯石老師的人權。

再者，私立學校的大專老師，他同樣是講師、副教授、教授，但要比公立的老師多教四個小時，這就是「同工不同酬」，工作時間不一樣，這是一種不當的勞動行爲。就是說，大學法應該沒有規定私立學校的授課時間要長一點，這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育人員不能夠同等享受教師人權。

爲什麼我們這些聘任的老師，常處在不安定的處境之下來從事教學？我看恐怕法律上有問題。法律上規定高中是聘任，大專是聘任，但是我們迄今沒有教師法。勞工至少還有勞動基準法、工廠法做爲保障自己權利的依據，現在我們的高中、專科以上老師，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被趕走，也沒有個保障。

應速訂教師法

我覺得當道者要回歸憲法體制的話，至少要做幾件事。第一從速制訂教師法。第二改進聘任老師的聘約。本來契約應當雙方來談條件，訂合同，現在我們從高中到大專老師所有的契約，完全是他們怎麼規定，我們怎麼做，因爲我們要吃飯，所以只有照做。現在沒有教師法，假如我們現在被解聘，不知道誰能幫助我們？按道理，教育會應該保障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人權，而今天的教育會只管立委、國代的選舉，今天石老師遇到困難，有沒有教育團體的立委或者國代肯仗義執言？因此，今天我們教育人權受傷害，一部分是要我們教育工作者本身負責，因爲，憲法規定的工作權，我們沒有享受到，應該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量保護自

己的權益，這是唯一可解決的途徑。所以我們在勞動人權宣言，最後有一段話：「如果公權機構未盡全責，無法確保勞動者可充足享有人權，則勞動者有權利以自力從事自保人權，即自力救濟亦是勞動者的基本人權之一。」所以我呼籲大家，對石老師可能面臨的災難，我們來支持他，石文傑遭到的命運，也可能是我們台灣地區所有教育人員面臨的共同命運，也就是我們應該有的人權遭受剝奪。

另一方面，教育人權應該包含兩部分，一部份是教育者人權，另一部份是學生的人權。學生也有他的人格，學生也有權利來管理他自己的事情。最近「自由青年」訪問我，記者問：「你認爲，學生各種活動對不對？」我說：「絕對對！」他說：「學生跑到校門外參加活動對不對？」我說：「絕對對！」因爲學生有兩種身分，兩種權利。第一，學生以國民身份，他有權利也有義務參與任何社會事務。如果大專學生他尚未成年，他有國民身分可以這樣做，如果他成年了，他有公民身份，難道只叫他去投票而不讓學生去表達他對國家社會的關懷？這是絕對不公平，只盡義務而不享受權利

用自己的力量來補足權利

我又說：我認爲，任何一個人不管關心勞工、關心環境，包括學生關心到他們自己的權利，這是絕對的愛國者。所以希望你用看待愛國者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學生在學校的活動及校外以公民身份來關心社會的舉動本身有絕對建設性的價值。我認爲他們不但是絕對的愛國者，同時，在各種活動中他們可以學習，學習民主政治、民主事務。你們不是從他們小時就說學生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國家棟樑。假如要做棟樑的話，是不是該讓他們去磨練磨

？所以我說學生去參加各種活動是對自己有一種期待，期待將來在社會做個棟樑。最後我補充一點，我認為，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任何社會運動的產生是基於權利受到相對性的剝奪而引起的。所以根據此前提，我有一個說法，任何社會運動，是人們（包括學生）用自己的力量來補足自己的權利。所以我暫時把它叫做權利補足論。從這個觀點來說，任何人關心社會，從事對社會整體有利的各種社會運動，本身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林玉體

師大教育系教授

「我們應使學生能獨立思考，尊重不同的意見。」



今天來與會，心情實在沈重，坐在我面前的，有大學老師，也有高中老師，有被解聘的，也有很有被解聘危險的。我個人在師大教書，也有兩次差點沒拿到聘書。今天很多人來參加這個大會，我希望大家互相要求，來發起一個力量，可以讓石文傑老師與李勤岸老師得以

繼續在教育界服務。若他們被解聘，這也實在是我們教育界之耻。我也希望，從今以後，凡是在台灣從事教育活動的老師，地位能獲得保障。

我們的社會和教育是比以前進步，所以當我看到張曉春教授發表「勞動人權宣言」後，我也在民衆日報上說我們也需要「教育人權宣言」。校長與教育機關是應該解聘那些講課不知所云，或是不認真教書的老師。台灣的教育史上，有些很優秀的老師被解聘，經濟學所說的「劣幣驅逐良幣」就是這種意思。例如在座的王曉波教授，以前在台大教，後來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他被解聘。另外也有位東吳教授黃爾璇，他現在是民進黨秘書長，他也被解聘。

應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力

就教育立場來講，如要培養一個很好的學生，應該要特別加強其能獨立思考，思考力、想像力強。台灣教育長度是增加了，以往只要讀六年，現在要讀九年，廣度、深度都增加了，但是純度愈來愈差，愈來愈黑。「純」我做此種解釋，他希望你很單純，訓練學生只知道一套觀念，不要讓學生知道另外一套的觀念，如石老師的問題就是他發了另外一篇文章給學生，但那一篇文章並不是教官、校長希望學生看的。老師希望學生思想非常單純，如同「蠢」之發音也就是呆，台灣的孩子非常優秀，素質又好，但一上學後就會變呆了，愈唸愈呆，讀小學小呆，讀中學中呆，讀到大學就是大呆，這如何培養一流人才？因他要學生只能單向思考。有人講了一個笑話說要中學生作文，題目是春天，結果學生的結語都是反攻大陸。有人認為這表示教育很成功，春天居然可連想到反攻大陸。在我看來這表示學生已被訓練成僵

化的思考模式，管你的作文題目是春天、夏天或什麼天，反正最後都是反攻大陸。這就是將學生的思想製造一個模式，學生不管有什麼刺激他都做同樣的反應，不同的題目都作同樣的反應，這種反應最保險，還會受到鼓勵，這就是台灣教育最失敗的現象。

軍訓教官引起校園糾紛

台灣校園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是軍訓教官。我想石老師的事也跟軍訓教官作對有關。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講軍訓教官應該退出校園，有某位記者就去採訪教育部軍訓處後寫了一篇文章說軍訓教官對台灣教育有重大的貢獻。第一是安定校園。我想一個大學或中學的校園安定要靠軍訓教官，就好比一個社會的治安很好是因為警察很多，那是很可恥的事。我且舉教育方面的例來說明。我們要培養學生自愛，自己管理自己。比如學生在考試時叫他不要偷看，第一種方式是四面八方請四個老師監考，這個學生技術再好也無法作弊，但代價太高，人的尊嚴都沒了，就像狗；第二種方式是培養他很自愛，使他自己覺得不應該作弊，能夠這樣就是教育的成功。如果說我們的社會治安好是因為三步一警察，五步一憲兵，這是個好的社會嗎？所以，如果說軍訓教官使校園安定這是很可恥的。第二是說軍訓教官訓練學生的體力，那麼體育老師是幹什麼的？第三是說軍訓教育不只訓練體力而且訓練思想，這一點很可怕。我想今天大學校園有很多糾紛都是因此而起。

我很贊成「改革從教育改革做起」這個標語，我們要訓練學生使他多方面想，不可只向一個方面想問題，要培養學生尊重不同的意見。要是動輒指持不同意見的人是「匪諜」，學

生思想就會僵化變呆。台大數學系的楊維哲教授寫過一篇文章「如何把資優的學生變笨」，我替他作的解答就是把他送來台灣。

現在政治與社會方面正在改革，雖然這不是執政黨自願而是民衆爭取來的。現在還有老師任意遭解聘的事，是故要爭取、維護教育權，在台灣以教育的民主化最差。台大的學生就因為他們想把心中的話說出來，竟然被記過處分，我感覺很悲哀。所以教育權要爭取，不可希望它會從天而降。但願像今天這樣老師被隨意解聘，因爭取自由、人權而被記過的事，能在以後台灣教育史中絕跡，永不重現。

王曉波

世界新專教授

「要還給我們下一代的希望，還給我們民族未來的生機，就必須還給我們獨立自由的校園」。



「夏潮聯誼會」昨天在自立晚報的廣告是這樣的一「民主的老師+進步的學生=自由的校園」，在這裏本人要向諸位報告，這與我的經歷正好符合，既是進步的學生，又是民主的

老師。

二十四年前本人是台大被停刊的「新希望」雜誌總編輯，應該算是「進步的學生」吧，十三年前本人在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解聘，也該是「民主的老師」吧！

「不要讓歷史批判 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

在二十五年前，台大學生曾發起一個自覺運動，當時經過五十年代大整肅的鎮壓，經過六十年代雷震事件後的陰影，台灣的青年徬徨、苦悶，在這種情況，台大的學生，只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台大是台灣第一個大學，當時國立大學很少，可說是集合了全台灣最會考試的青年。如果台大的學生都「去去去去美國」，那麼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前途，由誰來擔當。當時台大的學生在發起自覺運動時，就以「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為口號來自勉。因為有這個運動，所以後來台灣島內外的保釣運動有大量的自覺運動的朋友參加，後來台灣的民主運動，也有大量的台大學生參予。

自覺運動興起後，有關方面找了一批人去救國團還設立了一個自覺運動的辦公室。然後找一些學生去火車站前掃地、通水溝，當然這種社會服務我們也很同意。但我們認為真正問題，不在這些枝節上，問題在於台灣要如何發揚民主與科學，青年一代要如何有自覺自醒的精神，所以我們辦了一個〈新希望〉雜誌，這份刊物頗受到台北地區大專青年的歡迎，當時在師大、政大、文化學院等校都有我們的負責人。高信疆先生是文化學院的負責人。這樣的刊物竟然被查禁，被禁止出刊！不過，希望的種子已經埋下，怎麼可能不發芽、生根？

在那惡劣的環境下，我還記得當時徐復觀

教授曾勉勵我，不要為惡劣的環境而恐懼、而徬徨、失望。他說「即使是一棵小草，在那亂石堆那樣惡劣的環境，只要有種子、有生命力、亂石堆裏種子也要發芽。」所以，自覺運動之後，雖然壓力很大，但後來鄧維楨就糾合了一些朋友辦〈大學雜誌〉，也有林孝信糾合了留美學生創辦了〈科學月刊〉。

七十年代初，當時台灣興起了學生運動，也就是保衛釣魚台運動。正是我要寫研究所的畢業論文的時候，因此我常對人說「我是自覺運動走進台大，保釣運動走出台大。」保釣運動時，我即擱下了論文而來研究「釣魚台歷史主權問題。」

由於釣魚台運動興起後，台灣學生重新有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並有了學生言論自由及校園民主運動，也開始有了大學內自由意識的覺醒。當時我們也看到台灣社會、經濟正在走向一個轉型的社會。雖然台灣的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卻是犧牲了農民與廣大的勞動朋友的成長，所以有一些朋友，走向礦坑、走向社會的最底層，來認識和擁抱這個社會，也有了社會意識的覺醒。

在這個過程中，本人從進步的學生變成了民主的老師，1971年，我研究所畢業，留在母校擔任教職。1973年，我被警總約談了一天，他們認為我如此關心基層百姓生活，有思想左傾之嫌。我答以，蔣院長不也關心基層民衆的生活，他不也曾和我們一樣走向礦區、農村嗎？難道關心基層民衆生活的蔣院長也左傾嗎？當時我們主張，要中國統一就必須要在台灣確實實行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打不平的主義，今天我們社會如果仍有不平，那麼就沒有達成三民主義打不平的目的，反而成了製造不平。我因為主張以三民主義統

一中國，又被套上『隔海唱和』的罪名，然而事隔七、八年，在中共統戰的壓力下，國民黨也喊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不久，發生哲學系事件後，我這個「民主的老師」終於被趕出了台大。

有獨立自由的校園民族才有生機

最後，我想談，為什麼我們需要校園的自由？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最燦爛的時刻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而春秋戰國時代是自由教學，否則中國絕對無法產生孔子與孟子等百家爭鳴的盛況。

為什麼我們要主張校園自由及學術的獨立？中國的教學向來是有相當的自由，直到滿清以後，中國的書院才被干涉。剛才，張忠棟教授也提到的東林書院，在魏忠賢權傾天下的狀況下，在自由的校園中，尚有東林書院能批評朝政，而敢使天下之是非在東林。從滿清之後，書院被干涉，相對於世界史的發展，中國也開始衰微。在這之前比較世界史，中國並不落後。因為這樣的學術、教學的自由喪失後，我們只能培養出一群“趨炎附勢”的，沒有道德，沒有是非觀念的小人。所以我們的社會必然墮落、政治必然腐敗。宋朝在韓侂胄當權之時，愛國詩人陸游曾言「士氣崢嶸未可非，人才消磨方當慮」，也就是說，知識份子論政的士氣雖然尖銳，卻不可非議。應當憂慮的是沒有好的教育，沒有獨立自由的教育，不會有新一代的人才出現，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要恢復學術的自由，我們的民族才能有生機。所以我要呼籲：請還給我們下一代的希望，請還給我們民族未來的生機，就必須還給我們能獨立自由的校園。

王津平

前淡江大學講師

「教育的本質就是愛，任何對教育工作者的壓迫，是最殘忍的壓迫，必然要遭到最大的反抗。」



今天我要透露我何以被迫離開淡江，也就是所謂的「六月事件」。當時在學校裡面，我們批評校長、教官、總教官還差點就給學生轟出去。在我被迫離開淡江後，校長張建邦告訴我說「有人要利用我，在學校我有點決定權，如果你只在校內搞，你怎麼搞都沒事，但你搞到校門外去了。」因為當時我和王曉波一樣，鼓勵學生走進社會，走到礦區，走到山上去關心我們山地同胞，鼓勵學生去參加民主運動。那時有很多學生去幫王拓助選，教官都記錄了下來，我和很多青年朋友也去給陳鼓應（國民黨不讓他在台灣待，現在在大陸北京大學教哲學）助選。當時在台大有個口號叫「砲轟台大司令部」。像這些事情對國民黨來說才是真正無可原諒的事，其實以那時的狀況，解聘不准教書已經算是很便宜了。

一切改革先從教育做起

我個人的轉變有個心路歷程。在我出國以前，我什麼都不懂，只感覺到為什麼我們社會這麼苦悶，讓大家這麼痛苦？在台灣時我參加了釣魚台運動，出國後，我感到這個國家怎麼爛到這個程度，黑暗到這個程度，故在美國唸書時我很認真研究我們的近代史，得出了一個結論，有了結論之後，回來教書，相信一切改革要先從教育改革做起，那時候有決心，也知道如果只教了一天書就沒得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很多朋友都被關在監牢裡面，我們有什麼資格在外頭享受我們的自由，所以在教書的時候，我就一天當做十天、一年、十年在用，所以一定會得罪當局，這是我完全了解的事情。但是當時我要離開學校，有很多教書的朋友決心要跟我同進退，他們去逼一些逼迫過我的國民黨的人說：「如果你們不跟王津平同進退，那麼我們就要給你們難看」，那時有很多學生，包括國民黨中央黨部要員的兒子，也不同意他父親的作法，他要在學校聯名請願，外國老師要求示威罷課聲勢都起來了，但是當時如果這麼做，對我個人可能有利，但是學生將來可能會被盯住，無法動彈，所以那時我忍下而離開，這些年中，我親眼目睹很多人不斷成長。當初在學校中似乎懂事但又不甚清楚的年青人，現在在社會中都可以做我的老師，比如街頭運動中林正杰的太太楊祖瑛就是個範例。我感到這個時代真正在進步，我個人學習老是跟不上。

敲開教育大牢的鎖

在此我對所有民主的老師、進步的學生、對在座關心教育人權、教育改革的朋友，說幾

句話。現在台灣的校園運動裡面提出「自由之愛」的訴求，我猜想這些朋友心裡真正想要講的是憤怒之愛而不是自由之愛，我個人覺得憤怒之愛是比較貼切的，因為教育的本質就是愛，教育的本質就是教我們每一個人要愛每一個人，就是教我們能夠知道今天我們活的空間是前人留給我們的，是我們要留給後人的，今天我們要自由後人也要自由，今天我們在教育崗位上所要做的也不過是這麼一點點事情而已，教育是國家最根本的命脈，教育是最純潔最純粹的事情，教育是不能夠讓任何人來污染的，但是今天我們台灣的教育界，被污染了四十年，既然教育的本質就是愛，那麼任何想要壓迫教育工作者的壓迫便是最殘忍的壓迫，這樣的壓迫所遭到的反抗必然也是最大的反抗，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不但有大學生站出來了，而且這一把大學校園裡的憤怒之愛的火花已經燃燒到中學校園了，我們在街頭運動時聽到楊祖瑛唱的一首歌「坐牢算什麼」我們如果套這一句話來講的話，解聘算什麼，開除記過算什麼，如果有一天學生不怕被記過、被開除，老師不怕被解聘，那我想大概就是這個社會有可能大改變的時候了。

最後我有幾句話想跟在座關心教育的朋友講當我的朋友王拓跟無數其他朋友在坐牢時，我覺得非常的悶，好像我也陪著他們坐牢一樣，就在那幾年之中我悟出了一個道理：這個社會這樣的黑暗，罪孽這樣的深重，這個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牢，我們沒有一個人是自由的，我們在這樣一個壓制我們思想、壓制我們人格的教育體制下成長，小學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加起來每個人十六年，事實上就是坐了十六年的教育牢，我認為所有牢房在解嚴的時候都要全部打開，而教育這個大

牢更是要把它一把一把的鎖都敲開，讓每一個門都打開。

林繼文

台大政治研究所一年級

「我們想藉〔五·一一〕學生日告訴同學，權利是靠爭取得來的。」



「五一一」後，當知道要受懲戒而深感不安。若無社會、輿論界的支持，我們九位學生可能承受不了這場政治風暴，這一次我沒有記過，大概是台大有史以來第一次經懲戒會議而未罰的。雖然在事件中我只是一個溝通者，依訓導處送到懲戒處的起訴書，在二年前我可能就被退學了。由於這一次使我們幾個單純的學生，體認到政治是什麼？為什麼很單純的事件要使它政治化？

權力是爭來的

剛才有師長說我們是學生運動，我自己身處其中，覺得這實在是過譽。我們在爭什麼？爭普選、言論自由，爭取一個人所應有的基本

權利，我們最激烈的方式不過是散步、演講、唱歌，但學校給我們按上的罪名卻是鼓動風潮、破壞校園安寧與社會秩序。我們要講這其實不是什麼學生運動。我們的校園太過安靜，安靜了三十多年，今天學生不過站起來提了一些謙卑的要求，卻被視為學生運動。這是所有教育長者應該檢討的問題，你們是否將學生當成會思考的人來看待？

為什麼會有「五一一」？簡單說，不過是為了要紀念五、六年來被記過、退學遭受精神上、肉體上各種壓力、污辱的同學，我們只是要紀念這樣的日子。我們要同學知道，如果以後他們有了普選、言論自由，那是許多人的血汗換來的，也要讓他們知道將來他們如果要爭取更多權利的話，他們也要付出血和汗的。也就是說，想藉著這樣一個紀念日，告訴學生權利是靠爭取得來的。中國學生的壞毛病是只要別人施捨你一些東西，就覺得是天大的施惠，沒有看到別人所付出的代價，更不曉得去爭取做一個人的權利。

請把學生看做會思考的人

我想從此可以反省一個問題，我們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是否將學生視為人，一個會思考的人？從立法院回來以後，我們曾提過很多有關於大學教育、學生角色的論文。「大學改革勿議」、「立法院請願書」是我寫的，我很失望的發覺，很多人一看到學生爭取普選，第一個反應就是，是誰在利用他？我想問：我們是否將學生看成是一個會思考的動物？有人將學生戴上各種帽子，例如左傾分子，喝洋酒、抽洋煙的小資產階級，但是否有人去了解這些學生提出的有關大學教育的改革主張以及對台灣社會的看法？是否有人想和學生對

話？當然學生要自我檢討，我感覺我們的用語非常艱澀，已失去與社會溝通的能力，或許這是 30 年來台灣的學生被鎖在校園的結果。

再來談我們現在要爭的是什麼？普選表示學生的事物要學生自己來管理。今天，學生已經是一個成人了，將來他要成為社會的中堅，他在大學時代卻不能為自己的事負責，我們如何期待他將來出社會後去領導別人，這樣一件小事卻鬧成這樣，教育當局實在該好好的檢討。很多人，把「自由之愛」的學生看得很可怕，他實在應該比較一下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我們只是很謙卑的要求一些學生權利，我們不希望「自由之愛」的成員造成內閣總辭。那天懲戒會之後，一位師長小聲的對我說，普選的事你們已打到三壘了，「五·一一」本來要跑回本壘，他們封殺沒成功，你們又回到三壘。我很難過，為了普選，學校和學生玩起棒球賽。

林志修

台大數學系三年級

「未來的學生應跨出校園，應該向更廣大的社會大眾學習，去探討更高層次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林志修：從上星期「五·一一」自由之愛的懲戒案開始，我們台大這九位同學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因為你們的關心，使得此懲戒案，使得校方在媒體的壓力下，終於作出比較輕微的處分。我代表其他沒來的八位同學向各位致意。

毋忘爭取校園民主的前鋒

有人問我說，因為這次懲戒案被記過你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雖然在「五一一」當天我站出來說了一點話，而喪失了競選代聯會主席的資格。但是如果那天我不夠誠實，不夠勇敢的話，我就失去做為一個人的資格。台大這幾年來，有所謂的學生運動，但是它被社會大眾注意也不過是這一兩年的事。在我們之前的三、四年，我們有很多的學長為了要爭取校園民主所付出的代價可能不是在座的人所能想像的。大家看一看，這邊海報寫著「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那邊海報寫著「一切改革從教育改革做起」。就在五年前，我的學長們頭一次在校園裏貼出要求普選的海報，他就必須抱著貼出海報之後要坐兩年牢的心情去貼這張海報。這一點，在我剛進台大聽到時，簡直是不可置信，可是它確實存在。在四、五年前，八〇年代的初期，台大當時還是在一片非常沈寂的氣氛當中。有一群「大學論壇」社的朋友，他們是校園民主的前鋒，他們發覺這個沈寂的校園需要一點活力，所以他們就出來要求普選。那時候他們所能做的，最原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半夜三更爬牆進入校園張貼海報。張貼一張隔天早上被同學看到後不到幾小時就會被撕去的海報，他們藉由他們所能想到的各種辦法去訴求，去抗爭。他們還甚至嘗試在校園的黑板上寫「早安，普選」他們藉由各種看來

愚笨却令人感動的方式去訴求校園民主的主張。因為他們這樣的努力才有校園近來波瀾壯闊的發展。今天「自由之愛」的懲戒案，只因爲有九位同學可能會受到學校嚴重的處分，社會大眾們對他們付予這樣的關心。四、五年前的學生只因爲要散一份傳單，貼一張海報，在受到處分之時，却很少有人會注意他們。據我所知，三年前的「輔大新聞」事件最少就有兩位同學遭到退學，還有好幾位同學留校察看。但是他們却没有得到這個社會所應該給予他們的注意，我覺得應予他們一個歷史的評價。

跨出校園，向社會大眾學習

近幾年來的校園民主運動，究竟對社會與校園裏的學生具備什麼樣的意義？如果說今日有學生運動，那不過是社會運動的末梢而已，而非前驅。因爲三、四十年來，被矮化成爲一個小孩子，缺乏足夠的社會地位與能力去向社

會發言，所以近幾年來的學生運動，他不是去找社會問題，而是反省校園裏缺乏什麼東西，於是他們提出普選、言論自由與廢除審稿制度等主張。如果十年後台大學生還在談這些問題，那麼這不但是台大的悲哀，也是國家的悲哀。如果台灣的大學生永遠跨不出校園，永遠不能進入社會，去向人民學習，去發掘社會的問題，促進這塊土地更大的發展，那麼這個社會就會缺乏活力，過去幾年來，普選、言論自由已經耗費太多年輕人的精力，未來的學生應在這議題之上，繼續跨出校園，他們應該向更廣大的社會大眾學習、發言，去探討更高層次的社會與政治問題。自立晚報昨天的廣告上說，「民主的老師+進步的學生=自由的校園」，最後我要說有進步的教授與進步的學生，還要加上進步的人民我們才會有一塊自由民主的土地。



◎專 輯◎

「台大教授聯誼會」

爲何難產？

■游賢達

今年六月，有台灣最高學府之稱的台灣大學成立了「教授聯誼會」，却頻生波折，飽受干擾。從這一事件可見在台灣，連大學教授也不能享有自由結社權。

六月五日下午，在充滿猜疑、爭議、斥罵的一片混亂中，九個多月以來飽受磨難的「台大教授聯誼會籌備處」終於在十分屈辱的情況下宣布「理監事選舉延後，台大教授聯誼會於焉成立」。

一張選票的流出，上千冒名輔選信函的寄發，造成這個「聯誼會」成立大會極度的混亂與難堪。而審視這個事件的背後，我們發現素有最高學府之稱的台灣大學在一個平常而單純的事上竟也不可思議地滿含政治動作。

這一年來，整個台灣社會騰發著要求改革開放的聲音與動作，大學門牆裡也頻傳改革之聲。最近，台灣大學的兩個改革契機——學生代聯會主席改選與教授聯誼會成立——發展的結果，一則堪喜，一則堪憂。

選票外流造成魚目混珠

以「自由之愛」爲主幹的改革派學生所推出的代聯會主席候選人陳志柔，五月底，居然以八十三比四十六票壓倒國民黨台大黨團全力輔選的保守派候選人，奪回失去四年的代聯會主席。

以透過情誼交流、科際整合來達到維護學

術的獨立與自由的終極目標，是「教聯會」成立的宗旨，它自發起以來一直在阻難中持續挺進。今年五月底已獲得四百零六位台大教授同仁的支持。十二位籌備委員們喜孜孜地召開成立大會，並按章程選舉理監事。不意，竟在大會召開前一日（六月四日）發現選票外流，上千教授接到包有選票樣張假冒籌備處名義寄出的輔選信函，暗示會員在選舉時應支持樣張上推荐的特定人選。由於籌備處自始便堅持超然角色，既不擬推荐理監事人選，也未曾進行輔選工作，得訊當然震驚，當天召開緊急會議，謀商補救對策而未果，只得決定將次日選舉延後。

六月五日，成立大會如期舉行，籌備處總召集人也是大會主席的賀德芬教授上台說明籌備處立場後，憤怒指控有人意圖魚目混珠，操縱選舉。爲表示負責態度，她當場請辭召集人與主席之職，流出選票的關鍵人丁一倪教授也引咎退出籌備工作。此時會場一片混亂，有些教授居然責罵賀德芬：「什麼玩意兒！」數十位教授見狀悻然離席。所賸百數十人在瀕於流會情況下，強渡關山，繼續大會章程與選舉辦法的討論。會後，籌備處仍宣告「教授聯誼會」成立，六月底以前擇期補辦理監事選舉。

一個以協助知識整合、改善教育環境為目的的聯誼會為何在成立過程中會枝節橫生、窒礙難行？從國民黨台大當局與教聯會籌備處二者的互動關係與六月五日後各方提出的批評中，可以窺見一些端倪。

複雜曲折的籌備過程

去年暑假後，黃武雄、賀德芬、陳師孟等九位台大教授便興致十足地醞釀組織「教聯會」，他們先組成了籌備會，邀請所有台大教授在十一月十五日校慶當天「一道來當共同發起人」。一時獲得熱烈的反應。反而學校當局疑懼莫名，透過種種管道，竭其影響力謀撲滅「發起人大會」。九人為了避免一開始即與校方尖銳對立，只好暫緩發起。

其後，籌備處仍馬不停蹄，舉行多項學術研討會，漸漸拉回怯步的同仁，並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半年下來由九人而兩百多人，他們便以「中華民國臺灣大學教授聯誼會」之名向內政部登記為民間團體，內政部以「台大位於台北市」為由，要「教聯會」向台北市政府登記，後者卻認為「教聯會只是一個〔校內社團〕應向台大登記為宜」。皮球踢來踢去，誰也不願負責。

即使要求一個單純而應有的權利，太低的姿態也未必是明智之舉，教聯會成立的一再受挫就是一個例子。在籌備處組成之前，原初幾個發起人便主動排除一些在台大校園中比較敏感的人物於籌備處之外，並且邀入明顯親官方的人物，希望換得當局的信任。而向內政部登記時又在「教聯會」上冠以「中華民國」四字，藉以表示承認現存體制。結果並未獲得起碼的善待，至此籌備處猛然醒悟到，既然學校與教授之間只是契約關係，為何同仁間的聯誼也要看學校臉色？從此，他們便暫時拋開對學校與政府的顧慮，大開步地謀籌六月五日的這個「成立大會」了。

學校當局見勢不可退，態度上也作了大轉變，非但數度主動接近籌備處，五月底且湧進大批行政人員。總召集人賀德芬為此感到憂慮

，擔心教聯會會落入保守派之手，變成配合官方政策的工具。

其實一開始，籌備處的主流派便有分歧的想法，一派認為教聯會的功能既然包含制約已過度膨脹的校方行政權，則在組織時要盡量純化成員，淨化選舉，以排除別有用心的勢力混入。另一派則著眼於將教聯會做為同仁們交換意見的場合，透過溝通，慢慢凝聚共識，以期對行政體系形成有效制約。即使有政治勢力滲入也應予包容。

想法雖異，理想則一，所以「一路上難免有許多爭吵」（黃武雄語）長久以來畢竟未曾離心離德，孜孜矻矻的籌備工作只待成立大會一聲鑼響便可功成身退。萬想不到另外一股勢力的一個小動作，又弄得這幾人幾乎潰不成軍，大會也岌岌不保。六月六日，擔任發起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對「教聯會」的波折頻生，頗為感慨。（編按：見訪問稿）

台大另一名教授吳文希：在事件之後，也被視為敏感人士了，對「教聯會」難產，他也「代表」部份同仁表示「遺憾」，他認為樣張流出沒有什麼關係，不應該為此「停會」，反而籌備會的組成委員是否有失代表性而且組織章程是否超出「聯誼」性質，才是要重新考慮之處。劉福增教授批評道：「選票流出怎麼不嚴重呢？這個做法不紳士，不光明磊落，在學校怎可搞這種事呢？這就是偷竊！籌備處也太過慮了，別怕教聯會變成政治舞台嘛，兩極化總比一極好，大家來比賽啊！你既是一個公開的社團，政治陰謀要進來是擋也擋不住，但是卡爾·帕柏不是說過：『陰謀也未必會得逞呀！』？在民主社會裡不要怕陰謀。」

六月十五日，籌備處發出通知，六月二十六日將舉行選舉。原先所擬的「限制連記法」已改為連記法。原先工作主任委員的產生係由大會會員直接選舉，於是又多了一個辦法，工作主任委員由理事會選舉產生，這兩個辦法將在選舉當天由大會表決決定使用。籌備至此，教聯會的精神與當初的原始理想已經有了相當的出入，而教聯會的暗流湧湧卻方興未艾。

◎專 輯◎

訪「台大教聯會」 籌備人黃武雄教授

問：這次六五流會，一般猜測與台大校黨部的介入有關，去年十月的「發起人大會」就曾聽到校方用各種方式阻止，那麼這次成立大會又如何干預呢？

答：應該說並沒有明顯的干預，反而在相當數量的教授登記加入後，比較傾向官方的教授也大批的湧入了，有些身分角色較特殊的也一反原先態度加入了。

問：這些人加入之後有沒有在籌備工作上發生影響？

答：我對進來的人的成份並不在意，因為這是一個開放性的社團，不能說什麼人可以什麼人不可以進來，但是對教聯會的性質與宗旨我卻很在乎。教聯會是要發生作用的，也就是它是要能工作的。你知道在台灣的民間社團，理事常只是掛名而不做事的，但是理事畢竟是會員選出來的。所以一

開始我就主張將理事分為兩種：十個一般理事與主管五個工作委員會的各主任委員，兩者都是理事，也都由大會選舉產生，所以我們設計的選票上一邊是一般理事候選人，另一邊就是工作理事候選人。工作理事向它的選民一大會會員負責而受一般理事監督。而在理事會中佔大多數的一般理事又可以在互選常務理事、理事長中得到優勢，因此能制衡工作理事所轄的工作委員會，卻又不能操縱它。這是台大教聯會的一個特點，為此我們也苦心孤詣設計出限制連記投票法，好讓真正願做事又孚人望的人能脫穎而出。但是等到有更多人加入時，就有人百般設法要將五個工作主任委員經由一般理事互推產生，而不是由大會直接選出。

問：這對工作推行上有什麼影響？

答：不想做事，不能做事的人會被抬出來，有心做事的人卻要經過兩

次競選，當選後還得對一般理事負責，工作處處掣肘，至少主動獨立的精神就談不上了。我不排除有人確實想把教聯會變成一個喝茶清談的空殼組織。

問：既然是個開放的組織，你的觀點理想就要得到大會成員的支持才行啊！如果有一種反對力量進來怎辦？

答：沒錯，聯誼會是一個提供知識、科際整合機會的場所，它既是公開的那麼必然有政治勢力進入的可能，但我希望把政治對立降到最低，先求它能在順利情況下成立，其它功能，今年做不到，明年再來，就是不能編急，所以對於有人企圖操縱選舉，以致選票外流之事，我認為賀德芬的對應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她是有點反應過度了，結果成立大會被不明就裡的人看成批鬥大會，誰會有興趣？照我的想法，把事情原委大致公告便可以了，也不會把大會弄得那麼糟。

問：六月四日發現選票外流，籌備處不是有開過緊急會議嗎？想不出一個辦法？

答：一方面時間急迫不容長考，另一方面有些人對這個組織要求太高，肚量狹隘得簡直揉不進一粒砂，這是不切實際的，結果商量不出什麼好對策。

問：交大已有教授聯誼組織了，清大實際上已幾乎是「教授治校」了，為什麼最具開明精神的台大在這方面卻一再難產？

答：清大、交大在傳統上對政治關心程度不如台大來得明顯，它們沒有法學院，而文學院人數又少，在這情況下教授組織是很可以讓當局放心的。我想這次的挫折會對其它學校的類似活動有很不好的影響，成大還派人到會場觀摩呢！唉！想不到是那麼難堪的結果。

問：除了會員中別有用心的人與籌備會內部想法上的一些分歧外，是不是還有什麼情況是始料未及的？

答：概括而言，在台灣這個奇怪的政治氛圍裡，似乎只有「哀兵」才能得勝，人家先出手了你才有反擊求勝的可能，但是台大教誼會卻是反其道而行，我們是主動出擊的啊，也許就是因這樣才會弄到這麼尷尬……。另外我們忽略了佔大多數的第三立場者，這方面我們經營得不夠好，只老想到校方的反應。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是教授級的對象，說來政治了解與政治熱情還是很低，一般市民可能要比較好些，是不是因為有太多顧慮呢？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單純的活動啊！哎！我感到身心交瘁，非常難過。

◎教育人權專輯◎

被壓迫者的 覺醒與怒吼

——專訪石文傑
談教師人權促進會的使命

■本刊整理

五月中旬，台中私立立人高中老師石文傑，發生「解聘事件」後，頓成新聞焦點，備受關注。他痛感教師人權之受壓制而與中山大學講師李勤岸、前明道中學老師盧思岳發起了「教師人權促進會」，本刊特予訪問。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問：請你談談何以想組織教師工會？

答：我個人所以發生解聘風波，其導火線是因散發中國時報副刊何懷碩「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給學生，並且計劃以相同題目做為下次學生作文題目，不料竟引起本校教物理的張致民導師的「過度反應」，逕行對學生進行搜索沒收，火速報至校長處，才引起校長的約談與阻止，以至發生嚴重爭議，甚至發生解聘風波，形成「政治迫害」又一實例。

五月十七日自立晚報首次大篇幅刊出消息。隔天（十八日）自立晚報駐台中特派員進行專訪。記者除了進一步深入了解個人遭遇的詳細背景外，還問及未來有何打算，當時靈光一閃，脫口歸納出三點抗爭目標，擬以個人不幸遭遇，喚起所有被壓迫、受不平待遇的「同志」奮起抗爭，放手

一搏，我說：「今日教育制度的僵化、師生關係的冷漠、教師人權的淪喪，以及莘莘學子們在這種不合理、反人性的教育方式之下所承受的各種壓力，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個人從事教育工作十多年的體會與遭遇，實無法再對這種現象保持緘默，願以三大願望和教育界的同仁們，共同努力：

一、推動全面教育改革，促使校園活潑化、合理化，以期培育身心健康的下一代。

二、促成「教師人權宣言」早日制

文傑：

天下本無事，很多事都是當官的搞出來的，可悲可嘆可怒可說！但是，如能藉此，索性開除學校也是一份契機，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

1987.5.21.

柏揚

定，有效維護教師尊嚴，尊重學術自由。

三籌組「教師工會」，具體保障教師權益，改變「老板、夥計」之不當心態。」

很幸運的這些主張竟得到熱烈的迴響，由同情個人遭遇，進而對個人寄以高度期許，極力支持教師表現風骨及道德勇氣，因此其蘊釀過程是十分偶然和意外的。

問：談談你的事情公開後，各界的反應如何？

答：自從自立晚報首次披露個人消息之後，以及翌日台灣時報的加入報導行列，家中電話即接連不斷，書信亦如雪片交相而至，除了島內各地識與不識朋友的關懷，還有十多年未曾謀面的高中同學，遠自美國紐澤西來函敘舊，及述說美國華文報紙（美國中報及美洲華僑日報）以醒目標題報導經過，當然也有些文字拙劣，態度惡毒的匿名信，及學校部份「保皇黨」同事匿名電話的辱罵，所幸這都只是小小泡沫，只有一笑置之。心想，這些是當前不當教育下的產物與證物，也是吾人努力推動教育改革，力求加以改造的主要對象。

其中有一個共同現象，數封辱罵的信函，全未署名，而且遣詞用字十分低級下流，如不稱「你們」，而稱「牠(們)」，也沒有地址、電話。

至於支持和打氣的信，有署名，亦有未署名，有老師、有學生，有社

石老師你好！

從報上得知，為校園民主、學術自由而奮鬥甚為感佩，想起前教育部政次阮大年先生接任交大之時曾說：「民主、科學、校園化」相得益彰，近日，台大學生為「自由之愛」以及五·一一所發生之事，吾人為之鼓舞，事實上今天台灣教育污染程度叫年輕一輩雄心萬丈無可奈何，唯有看不見的「第三隻手」摒除才能獲得真正校園民主、學術自由，並以「教育何輕鬆，豁然史為鑑」相勉之。

學生家長上

何校長：

一個能為民主政治努力、能以活的教材啟發學生、能重視學生獨立思想的老師，在今天的社會裏，求之難得，鼓勵都來不及，何忍節制壓抑！請您站在國家的立場，不要站在一黨一派的立場，辦教育吧！

祝
教安！

李筱峯敬上

民國76年5月18日

會人士，有識與不識，廣播界「名嘴」吳樂天亦從台北驅車趕來台中小敘，表示支持與聲援之意，這些關懷都令我銘感五內。

問：請你談談教師工會籌組情形。

答：除了信函外，亦有不少教育界「同病相憐」的朋友以電話表示支持「教師工會」的成立，保證率先加入，可見教師處境之堪憐與組織工會之迫切需要。但由於現行「工會法」排除教師組工會的權利，加以教師亦身負有言教、身教作用，盡管惡法辦

法，還是先以守法為前提，因此決定先組「教師人權促進會」，至於將來時空條件改變，再做打算，至於名稱可能叫「全國教師（團結）工會（聯）」或「全國教師聯盟」。目前已有二十位左右自由派教授、學者、作家接受擔任「學術顧問」，四位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其他還陸續接洽中，我們還希望得到李遠哲、龍應台的響應，擔任「顧問」。

由於教育改革，超越政治黨派及意識型態之上，因此我們不希望有太重的政治色彩及黨派歧異，凡是認同本會宗旨及體認教育改革的迫切性，無論任何一黨，任何一派，我們保證沒有排斥之意。我們由於缺乏言論工具及傳播媒體，因此只要任何團體集會或傳播工具，願意讓我們登台或借用，又不限制言論尺度，我們都不會拒絕。目前「教師人權促進會」的三位主要推動者：李勤岸老師（遭中山大學解聘）、盧思岳老師（遭明道中學解聘）和我，都不希望遭任何政治力量的抵制和排擠。

我們支持您：

1 發表教師宣言！

2 組織教師工會！

（教育會只是救國團附屬品）

一群教師

問：從所公佈「教師人權促進會

」成立宗旨及工作目標草案，這是一份十分具有理想色彩的教育改革方案，目前似尚欠充分的條件，不是嗎？

答：這份草案，是由我們三位共同研商起草，目前只是草案，仍需全體顧問及社會各界人士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共同修訂增補。將來我們還會正式公佈「教師人權宣言」徵求簽署。目前這份草案可能太粗糙、拙劣，我們的目的只在拋磚引玉，集思廣益。

至於推動工作，千頭萬緒，困難重重，因為教育問題沉痾太深，積弊太久，我們也深深體認到，但我們願知其不可而為，全力以赴，義無反顧。當然我們迫切需要社會上的有心人給予有形無形的支援和指導。萬事起頭難，如今我們感受到教育改革的時機已經迫在眉睫了，衆志成城，「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是我們的信念及傻勁。

問：任何運動都需要充足的經費，可是教師一向是清高的，大多兩袖清風，你們如何籌措足夠財源推動工作？

答：「教師人權促進會」將來可能仿「消費者基金會」的形態，對外接受捐贈。目前暫時以郵政劃撥〇〇二六九六八～一號石文傑帳戶接受捐款，我們保證帳目公開，涓滴歸公，取之於大眾，用之於大眾。

當然，大會正式成立後，通過組



• 石文傑

織章程，可能徵收會員會費及常年會費，及正式設定帳戶，公開接受各界關心人士的捐助。其實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不少人表示願在財力上支援，由於目前還在籌備中，所費不多，我們三人仍足以負荷，至於將來，再看情況決定，在短期內將可召開成立大會。

問：除了推動教育改革外，請問有何具體保障、維護教師權益的行動？

答：雖然目前仍屬籌備階段，但我們三人已分別接到求助的個案，目前都在進一步深入了解之中，我們不敢自不量力的說能給予有效支援，但一定竭盡所能，藉社會壓力，尋求是

石文傑先生：

有關您因推介何懷碩教授文章“另一個中國人的想法”給學生閱讀，以平衡校方散發丁邦新偏頗意見，致引起校方不滿，擬採取解聘方式迫害您一事，本會至表憤慨與關切，除於五月二十六日發表聲明外，並請本會會員廖祖堯先生和您連繫，本會相信經由您的努力，校園言論和教師人權再度受到各界關切，對台灣的社會改革提供更多的反省，本會繼續給您精神支持，深願崎嶇路過，一片光明。

台灣筆會

會長 楊青矗

副會長 李魁賢

秘書長 李敏勇

1987年5月28日

非與公道。至於以往教師受迫害的情事，我們打算將來出版「教師人權月刊」或會訊，或定期召開說明會，給那些已經或即將蒙受不平待遇的老師平反、聲援和有力救濟。

問：你們目前最需要何者支援？

答：我們希望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及公正人士，發揮道德勇氣，給我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援，讓「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情況不再發生，重視真誠的精神，大家講真話、做實事、擺事實、講道理，發揮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良心與使命感。我們希望結合更多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士共襄盛舉，為教育事業創造新生的契機。

◎教育人權專輯◎

還我教師人權

——六·一三辭職 抗議活動演講稿



• 李勤岸

我要說明一下我為何要辭職抗議！

事實上我的這個事件是分成兩個階段的，現在我就用慢鏡頭分解給你們看。第一個鏡頭是我遭受政治迫害不被續聘，第二個鏡頭才是我感到聘任不公憤而辭職。

遭受政治迫害，聘任不公

為什麼我是遭受政治迫害呢？

第一、我在台南家專任教時即是被政治迫害逼走的，原因是我寫了一系列總題為「一等國民三字經」為政治詩，學校安全單位就壓迫校方解聘我。

第二、去年七月中山大學外文系才因為政治因素解聘一位李姓女講師，這是外文系主任兩次當面向我承認的，不過她說「以前是，你這次真的不是」，這又是放羊的孩子那一套，喊「狼來了」喊久了，只有這次才是真的狼來了，誰還會相信呢？

第三、我有學生親自告訴我教官要他向校方報告我上課的言論。

第四、學校安全單位向自立晚報記者說：「李勤岸的安全資料無甚可議之處，更何況他這一、二年來鮮少詩作發表」，這句話當然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法，既然我的安全資料那麼安全，他又為什麼會那麼關心我關心到我這一兩年是否發表詩作都知道呢？（比我自己還瞭解我呢！）

第五、我曾公開在報上呼籲校方安全人員公開我的安全資料，這樣就能澄清一切，可是現在已經過去一個禮拜，校方並無立即反應，

並予澄清。現在即使想公開我的資料都已太晚，因為一個禮拜已足夠讓他們另做一份絕對安全的安全資料。

第六、從一開始到現在，不管系上、院方或校方所持的解聘理由都自我矛盾、互相矛盾、或是胡言亂語不合邏輯，為什麼會這樣呢？很顯然是因為真正的原因他們說不出口，因此就胡編理由。第一個給我的理由是說因為教育部想少聘兼任老師。既然想少聘兼任老師，而系主任也承認我教學努力學生反應很好，怎麼不改聘專任呢？（其實四月初系主任找我談話時我是帶着十分興奮的心情去敲她的門的，原以為是通知我準備提出申請專任呢！）第二個給我的理由是我的資歷不夠好，以前唸的大學和研究所不夠好，或說余光中的女兒比我優秀，這更是可笑之至，如果這種理由行得通，我有一個朋友剛拿到博士學位想回來台灣教書，也想早請來中山，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考慮換余幼珊走路？如果這種理由行得通，那其他還在系上任教的老師不是很沒保障嗎？只要資歷較優秀的人要進來就得走路？第三個給我的理由是校方對我的教學不滿意，這個已被我的105位學生打破了，我自己讓學生做過兩次評鑑，第一次五個評分點是3.95，第二次是4.2，也讓學生寫了「一年來英文課的感言」，105位學生裏僅五人表示不甚滿意。校方也曾公開說：「校方絕不緘默，學期結束後一定有合理交待。」，我們感到不解的是一一不續聘我是三月底就已決定的，為什麼一直都只能給我「



● 6月13日在高雄市遊行要求「還我教師人權」

「不合理」的交待，一定要等學期結束後才能有「合理」的交待？

這一切的一切，都充分暴露校方的手足無措和理虧詞窮，這一切的一切到底說明了什麼？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那個真正的理由他們說不出口！

以上是第一個鏡頭的慢動作——政治迫害而不續聘我。第二個鏡頭是我感到聘任不公，憤而揭發特權，憤而提出辭職。

辭職後，我將獻身教師人權運動，底下我朗讀我的「獻身教師人權運動聲明書」做為這個演講的結束：

獻身教師人權運動聲明

敝人從事教育工作七年來，歷經三個學校，從高中、專校到大學，深切體會到一個教育工作者其基本工作權和基本人權之蕩然無存。行政主管或可因政治因素、個人喜好，或甚至為節省開支等等不成理由的理由惡意解聘一位教師，從不考量該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和學生的反應。教師，早已不是被人尊重的「為人師

表」，而只不過是人才過剩的社會裏一疊排隊的履歷表之一罷了。而在這種惡意解聘的過程中，校園特務、教官、特權心態做崇的行政官僚往往扮演了主要角色。因此，我提出「一等校園六字經」的主張——特務退出校園！特權退出校園！教官退出校園！還我教師人權！還我學生人權！還我學術自由！此次本人再度遭受中山大學政治迫害，不被續聘，我已決意為教師人權運動獻身，直到教師評鑑制度確立，教師聘任制度公平化、合理化，教師工作權得到保障，教師工會得以組成為止。今天我之所以奮不顧身站出來抗爭，乃是希望以後不必再有人站出來犧牲。這是第一次由教師發起的校園運動，也希望是最後一次這樣的運動，但願今日我想力爭的，明日都能實現！

謹此向各界人士聲明。

聲明人：李勤岸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專 輯◎

教師人權促進會 成立宗旨及工作目標 (草案)

教育文化為培養國民現代意識之基石，然多年來由於政治權威的不當干預，不但學校已淪為背誦死知識、尊崇落伍教條的場所，社會也任由消費性低俗文化充斥流行，忽略高意境和本土性文化，一般國民因而普遍缺乏現代社會的思考方式及開放理性精神。

有鑑於今日教育問題的沉痾，教育制度的僵化，教師人權的淪喪，師生關係的冷漠，以及莘莘學子們長期受到不合理、反人性、反教育的摧殘，吾等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目睹及親歷了這種種不合理現象，深深感受到要促進全面性的教育改革，保障教師人權，維護教師權益，只有透過組織「教師工會」才能達成。然由於形格勢禁，吾等決定先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結合教育界同仁及各界熱心人士，共同努力，以達成下列工作目標：

一、修訂「工會法」，使「教師工會」組織合法化、制度化，以期真正發揮功能，並落實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

二、草擬「教師人權宣言」，爭取全國教師的簽署，進而促使「教師法」的制定，有效保障教師權益，維護教師尊嚴，尊重學術自由。

三、建立客觀超然的評鑑制度，公平合理的聘任制度以及教師免職、解聘的申訴制度，以保障教師生存權、工作權，提高教師地位及工作尊嚴，並建立優秀教師終身保障制度，提高教師水準和教學品質。

四、堅持校園自由化、教育中立化、研究活潑化，反對任何政治力量介入校園，進行思想控制及干預政校，廢止教官及安全秘書制度，尊重教師講學研究及學生思想創作的自由。

五、落實校園自治、教師治校之精神，校長

及各級主管之任命調派，教師應有建議權及行使同意權。學校人事任免、考核及經費應予公開，並保障師生有集會結社權及校園自治權。

六、廢除「一言堂」式的標準教科書及課程標準制度，更新課程、充實內容，培養自由思考精神、獨立判斷能力、創新研究潛力和自由民主意識。

七、充實教育經費、恪遵憲法規定之所佔比率（中央不得低於15%，省市不得低於25%，縣市不得低於35%），降低各級學校每班學生人數，充實師資及設備，提高教師待遇，保障教師生活，貫徹教師退休制度，設立研究獎助金及留職進修深造辦法，現行大專院校輪休年假制度應普及各級學校。

八、私立學校所肩負之責任及對國家的貢獻，與公立學校並無軒輊，應公平對待公、私立學校，政府補助私立學校之教育經費，以一視同仁之精神，使私校教師亦有「良好的教學環境、優厚的師資待遇以及穩定的工作保障」，以齊一教育水準。

教師人權促進會籌備處發起人

石文傑 盧思岳 李勤岸

公元一九八七年（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北部聯絡處：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
5弄7號4樓

電話：(02)701-2930 盧思岳
中部聯絡處：台中大里益民路一段190巷16-

電話：(04)281-4647 石文傑

南部聯絡處：台南市崇明二街73號

電話：(06)267-6448 李勤岸

◎專 輯◎

還我學生權！

■林佳龍

四十年來，台灣學生的人格未受尊重，基本人權受到嚴重的扭曲與剝奪。兩位台大「自由之愛」的主要成員剖析了國民黨控制校園的手段，並為爭回學生人權、實施大學自治而奮力疾呼。

學生，是人；學生權，也是人權。在民主法治國家，憲法是保障基本人權的最高位階的法律規範，學生既是國家的國民，當然保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這包括思想與人身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等消極人權，以及教育權、法益權與參政權等積極人權。但是，當我們粗略地檢視當前校園的實況，不難發現，在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的操弄與外在政治勢力的介入之下，學生做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國民所應擁有的基本人權已受到嚴重的扭曲、剝奪。

在思想自由方面，言論自由與講學自由一再受到校規的概括限制與校方行政人員的百般刁難，例如，活動人選與講題須先送交校方審核，場地與時間受到限制且須有校方人員在場監督，活動過程與結果須向校方書面報告，未經救國團同意不得進行跨校聯繫等等；另外，著作自由與出版自由也根本受到審稿辦法與刊物事先檢查制度的限制，不但戕害學生的表達自由與知的權利，更剝奪了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都是實質上違憲違法的不合理規定，但卻公然存在於號稱真理殿堂的大學校園中，讓人為中華民國的民主法治現狀感到難過。

在人身自由方面，校方的約談、懲戒程序，不但違背「不得強迫被告自證其罪」的程序保障原則，而學生不得出席懲戒會議，懲戒會議由校方人員組成，也簡直就是「被告缺席而原告身兼法官的審判」；另外，校規對學生的處罰條文採概括籠統的規定，也根本不合「罪

刑法定主義」的實體保障原則。

在集會自由與結社自由方面，不但不論室內或室外的集會，一律採取事先登記審核制度，而且其審核機關為校方單方人員，其審核標準也幾乎是校方單方人員的「自由心證」，完全不符合司法裁定與我國憲法第23條的要件規定；另外，學生不得自由成立社團、社團經費、人事與活動須受校方監督、禁止跨校性的結社等等，也都是違憲違法的不合理規定。

再就積極人權部分而言，我國選罷法禁止學生參選或助選，顯然違憲地剝奪了學生做為一個公民所應擁有的參政權；而校規規定學生不得請願，甚至訴願、訴訟，也變相地限制了學生的法益權；另外，教育經費佔全國總預算的圯倒不合憲法第164條的規定，就嚴格意義而言，也侵犯了學生的教育受益權。

經由上述說明，不難了解學生人權被限制、扭曲的實況，而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特別權力關係（即不對等的、上下從屬的、概括的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校園，以及大學的無法充分自治，若再加上政治勢力的介入與父權思想的作祟，又如何能使學生人權與學生權獲得充分的保障呢？所以，今天當務之急，必須確保學生在憲法上所擁有的基本人權，廢除特別權力關係在校園中的運作，實施大學自治，並確立學生與教授為大學主體的精神與制度！

◎專 輯◎

國民黨

如何控制校園？

■吳介民

台灣的大學在整個社會生產系統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大學在台灣是作為國家整合體系的一環。它們是維繫政治、文化霸權的意識型態國家機構。就這個方面而言，國家從大學甄補人員，且將大學改造為灌輸特定意識型態的媒介。

所以，大學也受制於國家機關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從這個觀念來看，統治者對於校園的控制既從來不會鬆手，將來也不可能主動減少控制的力量。

統治集團對大學校園的支配大體上可以分析為三個社會控制的層次。

(1)政治文化與態度、價值觀的層面：教育權威當局透過細密的教材、課程、活動設計，灌輸學生特定的偏向於既有利益集團的態度與價值。學生的思辨能力大減，反抗潛力便消散於無形，而不致危及現存的政治、社會秩序。舉個例子，眾所周知，一般習於救國團式的逸樂、營隊活動的學生，在所謂寓「教」於樂的活動設計下，較易產生「愛國主義」（實則為愛黨的保守傾向）的政治態度，他們往往把校

●台大先進學生要求校園改革



園中反對行政官僚作風的改革要求，看成破壞倫理秩序的搗亂陰謀行為，而避之唯恐不及。

(2)黨、軍訓、情治系統等構成的鎮制機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個大專院校都有大量的軍訓教官、國民黨團的組織、訓育委員會、獎懲委員會、人三室、學生線民等建制。這些控制網絡嚇阻、懲罰持異議的學生，乃至教師，對他們施加心理威脅，甚而剝奪、侵犯其憲法賦予的基本人權。我們都清楚學校行政當局常不採取合乎憲法原則的合法程序。而以約談、懲戒、耳語譏謗、通知家長等不當的手段侵犯校園人權。

(3)自圓其說的法律層面的控制。運用「特別權力關係」學說使成年的大學生淪為倫理權威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因此，校方踰越了法治國家「法律保留」的原則，未經過法律的授權逕對學生行使懲戒、約談、退學等處分，但是一般學生難以體認到這一層控制的嚴重性，容易接受「特別權力關係」的正當性。這是深藏於校園支配構造最底層的法律主軸。

這三個層面的控制互相補足，將大學生（雖已是成年的公民）的權利義務關係整個改組。大學生的人格、權利沒有受到尊重、發展潛能因而大受壓抑。我個人以為這是今天憲法所賦與人民的基本人權，在大學裏被侵害得支離破碎的根本癥結。

因此，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要求回歸憲法體制，實現學生人權，改造校園現有的不合法、不合理的支配關係。

◎海峽論壇◎

不容公權力淪為 政客謀利的工具！

——王義雄立委質詢稿

■王義雄

「六·一二」事件中，民進黨的群眾與「反共愛國陣綫」發生了流血衝突，在這事件中，警方明顯左袒「反愛」人員，使公權力淪為政爭的工具，王義雄立委列舉實證對此提出了嚴正的質詢。

本院王委員義雄為「六·一二」事件中警方及各單位政府執法人員未能嚴守中立，秉公處理。甚至特意袒護「反共愛國陣綫」的暴力行為，致使國家公權力淪為政客達到個人利益的工具，破壞社會的安寧莫此為甚，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六月十二日民進黨為反對國安法的制定，在立法院前發動民衆和平抗議。這是我國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但是在警方處理不當的情況下，發生流血打鬥的事件，使得單純的人民抗議行動蒙上一層「官逼民反」的陰影，埋下社會動亂的種子。警方尤其在處理所謂「愛國陣綫」團體的措施上，更令人覺得警方高階層首長的心態有明顯的袒護行為，我們可以從下列本席歸納的幾點疑點加以證明：

1. 警方早就知道本黨要在六月十二日下午1點至立法院前和平抗議，也知道「愛國陣綫」人員在早上將到同地點示威，何以未能在民進黨到達之前疏散愛國陣綫人員，致使兩個不同意見的團體，在同時同地舉行示威活動，衝突自然再所難免，警方是否故意想要製造雙方衝

突？
「儘量給愛國陣綫人員方便」

2. 台北市警察局長也是此次實際指揮「六·一二」警方的負責人，却在當日早上，交待立法院警衛「儘量給愛國陣綫人員方便」等話，在場多位立法院職員及國會助理均親耳聽到，廖局長又是何等居心，莫非廖局長也是愛國陣綫的人員嗎？

3. 以警方的警力若要避免雙方衝突絕對可以將四十名左右的「愛陣」人員強行趕走，但警方却遲遲不願採取行動，任由雙方引發衝突，然後在十二小時後，才強行將「愛陣」人員送走，警方對此種做法又要如何解釋。

4. 「愛陣」人員在警方層層的保護下，可以隨意進出立法院，甚至讓「愛陣」人員在立法院內公然辱罵本黨立法同志，這特別禮遇「愛陣」人員和對待抗議國安法的民衆形成強烈對比，這難道是警方的所謂「中立」立場嗎？

5. 「愛陣」人員每人來立法院均人手一支白色棍棒，並且屢次衝出鎮暴警察的防衛綫，打

擊在場外的群眾，製造事端，何以警方容許「愛陣」人員持有武器而不加制止，何以警方對於當時肇事人員未能加以逮捕，而任其進出立法院？

6. 在最後的時刻，也就是十二日凌晨一時卅分警方用大巴士將「愛陣」人員送到忠孝東路四段雅齋餐廳吃消夜，却用警棍將抗議的民眾趕走。這又是差別待遇。

7. 當日某報社對著「愛陣」人員多人在本院外草坪睡覺的情形，該團體衝出一名男子欲加阻止，並出示證件為情報局人員。這又該如何

解釋？本席據民眾傳來情報指出所謂愛國陣綫的組織根本不是民間自發性的團體，而是某情治單位的外圍團體，是否屬實，依我國調查局的能力應可以查明清楚。

警方是代表國家公權力，立場應是超然無私的。尤其在政治性的活動中，更應嚴明的執行法律所給予的責任，而不能淪為私人政客的工具。綜觀此次「六·一二」事件中，警察是否中立超然，民眾都有深深的疑慮，為了避免日後社會更大的不安，各治單位的首長應再加以檢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前方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社址 / 台北市臥龍街195巷38號 5樓
 電話 / (02) 7328478
 零售80元 全省各大書局有售
 全年訂閱800元
 郵撥帳號 / 1025072-0林華洲

7月號要目

抗日40周年·日本批判專輯

林直道：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經濟基礎

程達學：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底流

——從靖國神社談起

王墨林：戰爭真的結束了嗎？

——戰後的「日本反省」

林默：石塚友子訪問記

片岡利明：我的天皇觀

大槻耕太郎：台灣土產

——一個日本遊客的台灣觀感

林歲德：我的反日鬥爭證言

「民間哲學」系列批判之五

汪立峽：形左實右的「民間學者」

——「民間哲學」根源的大體揭批

歷史與人物

林 涯：范本梁與「新台灣安社」

——日據下台灣無政府主義風潮之一

官鴻志：「吳鳳神話」的系譜

南方世界的現實

辛一鳴：人口問題的南北差距

◎海峽論壇◎

審慎記取歷史教訓

——我對「六·一二」的看法與呼籲

■王拓

八年前的「美麗島時代」也發生過類似「六·一二」的衝突事件，雷同之處甚多。而台灣的議會結構不改變，中央民代不全面改選，群眾的抗議事件會愈益洶湧。

近幾個月來，台灣各地的街頭運動與黨內外大型演講會，均動輒吸引數千乃至萬人的民衆參加，比八年前黨外「美麗島時代」所舉辦的活動更具規模，更有組織，這對關心台灣民主運動的人來說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對於台灣未來前途的發展應該是一件好事，其中尤以民進黨所主導的「五一九」與「六一二」事件最引起社會普遍的關注。

「五一九」的活動雖然國民黨當局動員了大量的軍警封鎖現場，使台北市東區的交通陷於癱瘓達十數小時之久，而招致民衆強烈的不滿，認為執政當局未免過份小題大作。但是，在兩黨協商下，終於沒有發生太大的混亂，也沒有像以往那樣大肆捕人。

不過，「五一九」之後的「六一二」事件，卻發生「反共愛國陣線」人士與支持民進黨的民衆互相鬥毆的現象。更不幸的是，司法單位竟因此而準備將「反愛」人士與民進黨當天在場的主要人物謝長廷、洪奇昌等三人訴之於法。表面上看來，將雙方當天在場的主要人物都送交法院，似乎是一件公平的事，然而，若稍加研析，卻不免令人懷疑，這恐怕又是一些極少數極右派的法西斯暴徒所預佈的陷阱吧？

歷史又一次重演

爲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不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應該不會忘記八年前的「美麗島時代」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件，每逢「美麗島」人士所舉辦的活動，一定有「疾風集團」的人假借「愛國」之名，對「美麗島」進行各種不擇手段的騷擾、侮辱、謾罵、恐嚇，甚至在「美麗島」的後期，還有「不明身份」的人士攜帶兇器到「美麗島」主要領導人的家中或辦事處，公然行兇，至今這些傷人殺人的兇手卻仍然逍遙法外。當時，執政當局却公然聲稱，這是民衆自發性的「愛國行爲」，並非國民黨所教唆。但是，觀諸「江南事件」發生時，美國情報單位發現江南的被殺與國防部的情報局長汪希苓有關，在國際輿論的重大壓力下，國民黨終於不得不承認，情報局長汪希苓確實曾經教唆竹聯幫黑道人物謀殺江南，雖然又辯稱係「其個人行爲」。而美麗島「高雄事件」發生時，那許多受傷的軍警到底是被誰所傷？那些兇器到底是誰準備的？現在，社會上已普遍有了定論，大家心知肚明。我是當天演講會的參與者與目擊者，親眼看到那些打人的暴徒，沒有一位是我所認識的黨外人士，而結果被捕坐牢的，卻都是全省各地熱心民主運動的黨外人士。

如今，在「六一二」現場挑釁民進黨和平



• 民進黨的群眾與「反共愛國陣綫」大打出手。

示威群眾的「反愛」人士，與當年「疾風集團」的作為，以及與「高雄事件」發生時持兇器傷人的暴徒，實在有太多類似之處，他們甚至公開在記者會上揚言，要殺死民進黨的主要人物如康寧祥、尤清等人；而他們與官方的關係，即使只從報紙上的報導，以及從本刊所發表的王義雄立委在立法院緊急質詢的內容來看，說他們對民進黨的反制是出於自發的「愛國」行爲，恐怕是任誰也不會相信的吧？

其次，我們應該追究，爲什麼會有「六一二」事件？

「六一二」是民進黨的必要行動

基本上，「六一二」是民進黨爲了反對「國安法」而不得不採取的必要行動。爲什麼說是必要的呢？因爲「國安法」的制定必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而立法院的委員卻以四十年從未改選的老立委居絕對多數，他們絕大多數只是國民黨的投票部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根本缺乏民意基礎，卻可以在立法院舉手表決與台灣人民禍福攸關的任何法案與政策。

所謂「議會政治」的基本精神應該是，在議會中以表決的方式就可以改變政策、撤換內閣，也就是說，透過民意的選擇，可以和平轉移政權，改變國策。

然而，台灣四十年來的國會，因爲「老法統」的長期不改選，而使國民黨得以永遠掌握國會的絕大多數，這樣的「議會政治」對人民



• 民進黨的群眾要求國會全面改選。

來說，根本就是一種欺騙，再加上絕大多數的大眾傳播工具與教育文化機構又幾乎全在國民黨直接與間接的控制之下，民進黨當然只有發動群眾到立法院進行和平示威，以民衆的力量來抗議這些沒有民意基礎的「老法統」。

這也正是我長期以來一直都主張，台灣的民主運動必須以「群眾路線」為主，「議會路線」為輔的主要原因。我們可以斷言，如果議會的結構不改變，中央民意代表不全面改選，群眾性的街頭運動一定會愈來愈多，並且會愈來愈洶湧。

國安法條文本身有爭議

國家的安全與社會的安寧是我們所共同關心的，因為這關係每一個人的幸福。但是，現在所要制定的「國安法」是否真能有助於國家的安全與社會的安寧呢？是否能保障我們每一個人的幸福呢？是否真的非制定不可呢？

「國安法」前後共十條，最引起爭議的是第二條的不得主張分裂國土與共產主義，與第九條的解除戒嚴令後依軍法所判刑的人不得提出上訴。

其實若根據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則「國安法」第二條所規定的「不得主張分裂國土與共產主義」根本是違憲的，因為「主張」只是一種言論，如果不真正著手實施

也不能判人以罪。即使真正實施，則刑法已有內亂與外患罪的規定，何需再制定「國安法」？至於第九條第二款說戒嚴時期非現役軍人被以軍法判刑者，於解嚴後，「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則明顯違反原戒嚴法的規定，除非修改已有的戒嚴法，否則「國安法」中的第九條是違法的。至於「國安法」中的其餘八條，在憲法與其他法律中也都已有明文規定，因此，「國安法」的制定實無必要，因為現有的法律已足以保障國家的安全與社會的安寧。因此，國民黨為何非要制定「國安法」不可呢？其真正的動機就難怪要引起人們的懷疑了。

基於以上所述，發動人民採取和平示威來反對制定「國安法」實有充份的道理。而「反愛」人士假借「愛國」之名對示威民衆加以反制，是否真能達到愛國的目的？是否真正是一種愛國的行爲？都是很值得再加檢討的。至於利用「反愛」人士與民進黨的支持者之間所發生的不幸事件，而把雙方的主要人物都移送法辦，所可能帶來的後果，根據美麗島「高雄事件」與林正杰被捕坐牢的殷鑑來看，恐怕不但不能制止民衆的反對聲浪，反而還會引起往後更大的衝突，這是可以斷言的。

因此，為了政治的和諧、社會的團結與民主的進步，我們懇切呼籲，執政黨要審慎記取歷史的教訓，盡量以開放的胸襟，容許不同的意見與聲音，不要再為一小撮極右的法西斯暴徒措政治的黑鍋，治安機關要真正做到客觀公正，超越於任何黨派之外，為國家和人民的幸福，盡其公僕的責任，而不要淪為政爭與黨爭的工具；而民進黨的領導人物也要以更高的智慧，在步步陷阱中，小心翼翼地踏步前進，才能為台灣的民主化做出更大的貢獻！

◎海峽論壇◎

從「國安法」 看國民黨的統治哲學

■張大林

「國安法」通過了，但予人舊酒裝新瓶，愈解愈嚴的印象，這是一部沒有民意基礎而又充滿牧民心態的法律。

國家安全法已於6月19日在立法院進行二讀程序，按照國民黨既定的政策，應能於6月底完成三讀之立法手續。

從國安法的內容來看，以之替代戒嚴令，不但混亂了正常的法制體系，而且予人以舊酒裝新瓶，愈解愈嚴的印象。關於其中條文的弊病，代表二百多萬選民的民進黨十三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痛切指陳，可圈可點，茲不再重複析述，本文僅就國安法之制定所反映的國民黨統治哲學，試作分析。

限制人權國家就安全？

國家安全法雖冠以「國家安全」，其內容實則主要針對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自由權利予以限制。這等於把「國家安全」與「人民行使基本權利」兩種概念加以對立而視為互相衝突。

行政院在函立法院審議國家安全法草案的總說明中，就充分表現了這個思維模式。該說明稱，「中共謀我日亟，其從未放棄武力犯台之意圖，復興基地仍處於動員勦亂時期」，因此「為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貫徹反共國策，摒除分離意識」，才要制定國安法以爲因應。

這項說明無一字提及解嚴之後，如何恢復因戒嚴體制而遭剝奪、限制之人民基本自由權利如何恢復與保障。而在該法十個條文中，除第一條宣示立法目的，第六、第七條訂定罰則及第十條規定施程序之外，其他條文皆爲對人身自由權的限制。其中：

第二條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權利，規定人民行使這項權利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

第三條限制人民之旅行自由，出入境均須獲准，才可進出國境。

第四條及第五條爲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規定警察機關得對入出境之旅客、交通工具等實施檢察，內政部及國防部得劃定某區爲軍事管制區，實施限建或禁建。

第八條原則規定現役軍人由軍法機關追訴，僅其所犯罪行屬刑法第六十一條所列各罪除外。

第九條剝奪平民在解嚴前受到軍法機關審判得於解嚴之後依戒嚴法第十條向司法機關提出上訴的權利。

依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前項自由權除外有

• 「五一九」反「國安法」的示威群眾



憲法第廿三條所規定的條件，而且還必須以法律的形式才得加以限制。

行政裁量權過度膨脹

國安法固然是法律的形式，但是它並沒有具體規定上述自由權應予限制的範圍，僅授權行政機關，包括入出境管理局、警察機關及軍

法機關等國防及內政機關，並給予廣泛的裁量權，譬如它可權衡人民集會、結社是否合乎第二條的規定，人民入出境是否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它可劃定某區是否為軍事需要，而逕行予以限建或禁建。

憲法第廿三條規定人民基本自由權若合乎四項要件，可以法律定之，法務部長施啟揚認為國安法可以以這一條規定為立法根據。但是，憲法僅規定得以法律限制，並未規定得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予以限制。國安法就是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限制人民行使基本權利的惡例，此例一開，則只要誰掌握立法院的多數，誰就實質上以制定法律的方式架空憲法對人民利益的保障，紊亂法制秩序，莫此為甚。

然而，即使國安法之限制人身自由權根據憲法精神解釋得道，把這些限制綜合稱為國家安全，顯然與濫觴於十八世紀西方國家，至今普遍為大多數世界人民接受的民主憲政潮流背道而馳。

違反三民主義精神

要而言之，經過三、四百年演化而來的民主憲政概念，其基本精神即在於政府權力有限，只有得到人民的允許才得行使，而為了避免政府權力不被濫用而侵犯了人民行使基本權利，因而有所謂三權分立的安排，把統治權劃分為行政、立法、司法三類，相互制衡及監督。

即使國民黨奉為規臬的三民主義，亦接受三權分立的概念，並進一步衍化為五權分立，其目的亦在使政府有「能」，人民有「權」，而政府之「能」必須受人民之「權」的節制，三民主義講得很清楚，只要是高中生，皆耳熟能詳。內政部長吳伯雄在立法院為國安法作辯



護時，也表示「三民主義為吾人立國之根本」，他只是順口說說而已，如此以政府之「能」限制人民之「權」，豈是三民主義的精神？

事實上，只有人民能夠行使其基本自由權，國家安全才有保障。從近代民主國家功能演變來看，維護人民自由權的行使是民主國家應有的功能之一。國民黨訂定這樣內容的國家安全法，其實是以法律大開民主的倒車。

法律固然不能做為違逆民主憲政潮流的工具，也不能脫離客觀環境或虛構一項不存在的狀態，也不能像內政部長吳伯雄所說，國安法草案第二條關於人民集會三原則之規定，目的「在建立共識」。因為法律是主持社會公道的工具，如變成一種道德規範，法的權威性就蕩然無存，法就不成其為法。

只許州官放火

即使如國民黨官員所說，國安法草案第二條為訓示性的規定，可作為建立共識的基礎。但稍稍檢討國民黨近四十年在臺灣執行的政策，就可瞭解國民黨其實是這三項禁止原則的始作俑者。

就以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來說，國民黨應算是人民結社之一，在它主政四十年期間，違反憲法的事例至少有：

一、憲法四十七條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但是第一任總統卻連任了三次才罷休。

二、憲法規定國大代表六年一任，立法委員三年一任，監察委員六年一任，但國民黨卻動用大法官只以解釋憲法的方式修改憲法，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連任了四十年，迄今仍然是第一屆。

三、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教育科學、文化經費不得少於百分

之十五，但行憲以來，那一年的中央政府預算達到這個標準？

國民黨早有分離運動

再以分裂國土來說，國民黨早在進行逐步的分離行動。先是在當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國民黨政府放棄了對大陸軍事行動的主動權，同意在對大陸採取行動之前必須徵求美國政府的同意。國民黨宣稱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大陸，中共是叛亂團體，但要對叛亂團體行使軍事戡亂行動卻必須受美國的拘束，這不是暗示已放棄對中國大陸主權的要求嗎？

接著是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蔣經國先生向美國提出與美國關係五原則，其中一項即要求美方承認台灣為一政治實體。美方做到了這一點，但是卻以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不是以與台灣締約的方式。當國民黨要求美國承認台灣為一政治實體時，實際上又一項暗示放棄對中國大陸主權的要求。

然後，懲治走私條例的修改，明示從大陸運貨到台灣，或從台灣運貨到大陸皆視同與外國的走私行為。至此，國民黨政府已完全把台



●鎮暴隊伍如臨大敵

？

民進黨立委邱連輝在立法院說：「現在並無戰事，也非戰時」，而國防部長汪道淵卻說：「台灣地區在事實上也是戰時」，兩者各說各話，但無論「動員戡亂」也好，「戰時」也好，其認定標準應根據客觀事實，而不是主觀立法意願，立法並不能改變客觀事實，正如另一位民進黨主委余政憲在立法院所說，若訂定一項「中共政權垮台法」並不表示該法通過之後，中共會立即垮台。同理，以立法的方式，把台灣現實稱為「動員戡亂時期」，並不就表示就存在著動員戡亂狀態。

灣分割於中國之外，現在居然在國安法要求人民集會結社不得分裂國土，豈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帝國統治心態？

既無動員也無戡亂

當然國安法最大荒謬之處即在於建立在一個完全虛構，現實已不存在的基礎上。國安法及其他很多法律在正名之前皆冠以「動員戡亂時期」。

然而從客觀情勢分析，這是不存在的。所謂「動員」，應指國家遇到戰爭，動用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將平時編制變成戰時編制所謂「戡亂」，應指釐平叛亂而言。

放眼近四十年台灣內外情勢，並未有動員的事實，雖有各種動員機構，但只是準備而已，並沒有實際在動員。按照國民黨的說法，戡亂係指戡平中共之叛亂而言，然而四十年來，如前所述，國民黨早已劃定台灣為中華民國的國界，口頭上雖仍稱中共為叛亂團體，但國民黨已在當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放棄對大陸的戡亂權力，且近卅年來，更沒有具體的戡亂行動，國共只有和平對峙，戡亂之說從何而來

充滿牧民心態

國民黨從1949年5月19日起在台灣實施戒嚴統治將近四十年，台灣久已無戰事，失去了戒嚴法第一條所規定的戒嚴理由，國民黨猶不知改弦更張，一直到去年10月，民進黨宣佈成立後，才猛然驚醒，宣佈解嚴的意願。但又覺得突然失去龐大的戒嚴特權，心理上適應不過來，遂又再制定國安，並以之為解嚴的條件，事實上這是違反憲法及戒嚴法有關戒嚴的規定。

在這個錯誤背景下訂出來的國安法，並不使人感到解嚴後如釋重負的喜悅，反而令人有一種好不容易去了一個戒嚴，又來一個惡法的無奈感覺。為什麼？因為：

第一，國安法只限制人民，不限制政府，充滿著古代帝王的牧民心態。

第二，它是由一個四十年未全面改選，沒有民意基礎的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與中國歷代王朝所訂的御用法律無甚大差異。我們要的是有民主基礎的法律，是民主的法治，不是帝王的法治。

◎圖片特集◎

「六·一二」事件寫真

■本刊

·「反共愛國陣線」在立法院門口張貼支持「國安法」的標語，立法院方有包庇之嫌。





• 「反共愛國陣線」人員持國旗桿為武器。



• 民進黨的糾察隊與警察對峙。



• 「反共愛國陣線」成員。



• 該員被打得頭破血流。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



• 費布平、尤清出面協調。



• 「反共愛國陣線」成員與民進黨的群眾發生衝突。

• 「反共愛國陣線」與民進黨的群眾以旗桿互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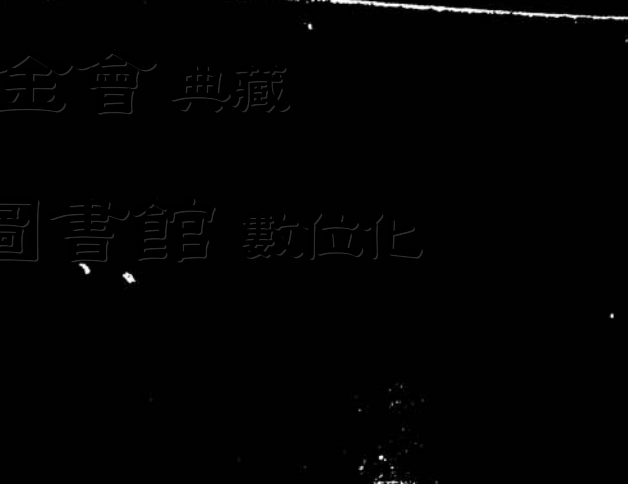
· 無辜路人遭擲傷。



育基金會 典藏



引起群眾不滿，險肇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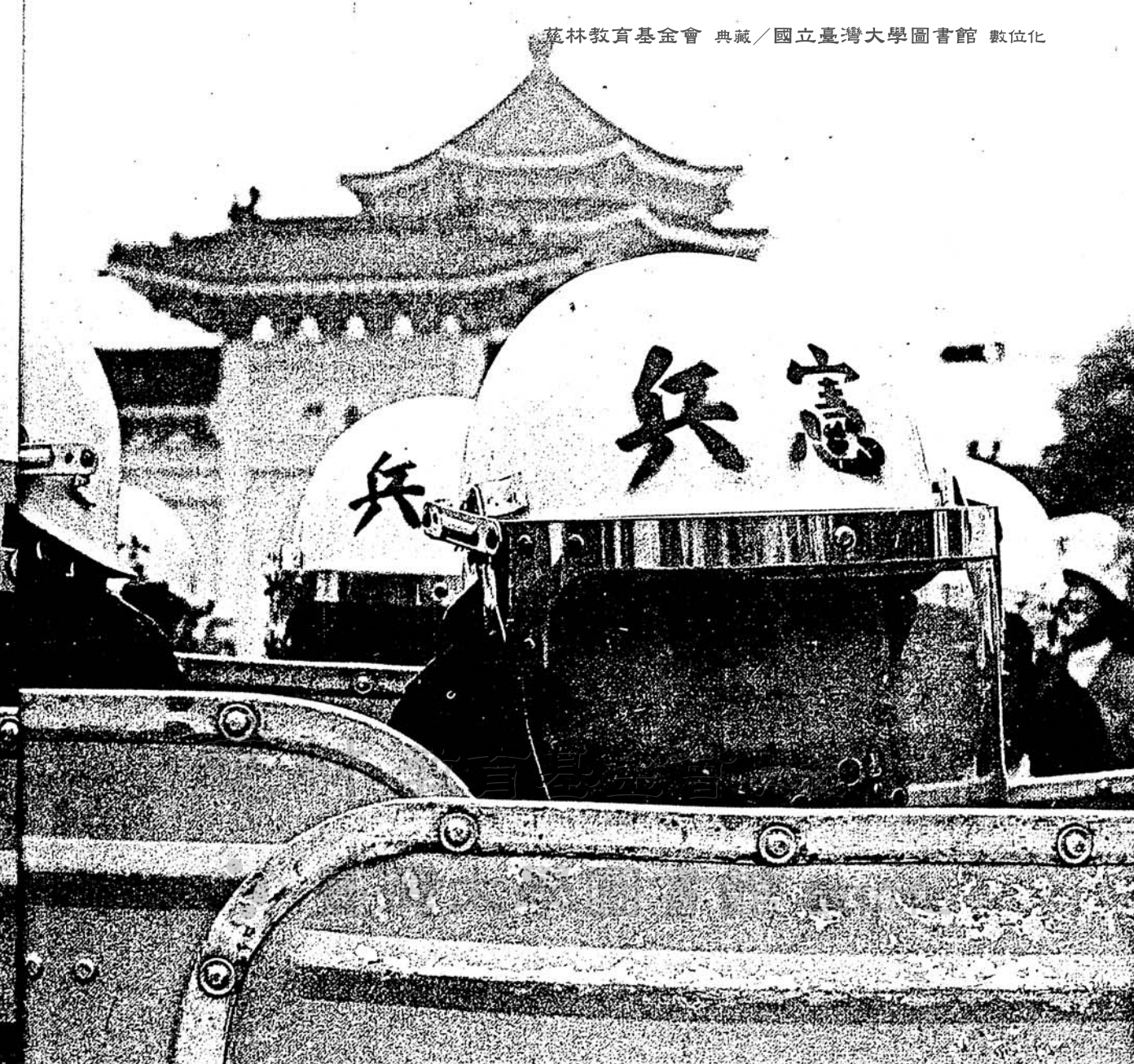


· 中正紀念堂前的憲兵。



· 至晚上十點多，群眾仍聚集不散。





• 6月13日凌晨，其他民進黨要員不願出面要求群眾解散，而由康寧祥協調未果。

• 6月13日凌晨1點多鎮暴部隊開始驅散群眾。

◎世界之窗◎

七千萬台幣的幫兇費

■邱平妹

政府當局在美國的壓力下捐給尼加拉瓜叛軍七千萬台幣，駐美代表錢復聲稱這是人道的援助。援助一群喝人民的血的惡虎，可謂「人道」乎？

今年年初，島內盛傳國民黨當局經援尼加拉瓜叛軍的消息，三月廿五日前外交部長朱撫松在立法院答覆簡又新的質詢時，曾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從來沒有對尼加拉瓜叛軍提供任何捐款。」

五月十五日，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席格爾，在美國國會「伊朗——尼游」特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透露，他曾促使台灣「被稱爲『三號國家』援助尼國叛軍兩百萬美元（約抵新台幣七千萬元）。次日，外交部發言人邱進益發表聲明，承認台灣工商界人士曾前後捐助尼國叛軍兩百萬美元，但堅持政府並未介入。

對於外交部這種否認在先，承認在後的矛盾行爲，民進黨及國民黨十幾位立法委員紛紛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要求外交部負法律政治責任，並公佈民間捐款者名單；外交部辯稱兩百萬美元資助，純屬民間工商界人士捐款，與政府無關，這種說法實難取信於民，因爲這筆經援是由「北美事務協調會」代表提出，呈報行政院核准；更何況台灣外匯一向管制嚴格，一切外匯均需通過中央銀行，沒有當局的批准，外匯是出不了關的。

尼國叛軍殘暴不仁

●尼國叛軍經常凌虐無辜的農民。



外交部的欺瞞行為固然需要追究，兩百萬美元支持的尼國叛軍是怎樣的一種軍隊，也需了解。雷根總統頌揚尼國叛軍是「自由鬥士」，並推崇它在道德上等同於美國立國之父；然而根據世界各地的獨立新聞報導，以及「國際特赦協會」和「美國觀察」等人權組織的調查，却得出相反的結論。一九八五年「美國觀察」發表一份比較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尼國雙方違反戰爭協定的報告，做出如下的結論：

「桑定政權在革命之後頭幾年，對沿海的印地安人處置嚴重不當，一九八二年以後，尼國政府已顯著地減少這類違法行為。……尼國叛軍一直違反戰爭協定，經常攻擊老百姓、拷打囚犯以致殘廢，並提拿人質、謀殺囚犯、嚴重傷害人的尊嚴。」

「拉美華府辦事處」及「國際人權法律團體」派遣律師到尼國做長達半年的調查研究，一九八五年發表了一份尼國叛軍暴行報告，這裏選出兩個例子：

例一：一個合作農場遭到尼國叛軍襲擊，事後牧師前往尋屍，在山上發現一具農民屍體，他描述道：「他們將他雙手反綁，吊在鐵絲網上，切開他的喉嚨、割掉他的舌頭、一把刺刀從前胃穿出後背，並割掉他的睪丸，殘不忍睹。」

例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位印地安老師被尼國叛軍綁架，關在宏都拉斯，在那和另外八個人一起遭到刑求，他說：「從晚上七點到清晨一點，他們把我綁在水裏，早上七點，他們讓我僅著內褲到冰冷的溪水中去撿垃圾，長達四小時……，然後他們把我綁起來，胸口壓在螞蟻堆上，任由紅螞蟻啃噬，我扭動著軀體想摔掉螞蟻，但是螞蟻太多了，每天我在螞

蟻堆上十分鐘。我從頭到腳都被螞蟻咬爛，爲了使我安靜下來，他們給我打一針，然後又開始毒打我。」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尼國叛軍獨特的受訓方式，訓練者大聲問道：「你是誰？」

「老虎！」叛軍齊聲吼道。

「老虎吃什麼？」

「血！」

「誰的血？」

「人民的！」

知道尼國叛軍的組成份子，就不奇怪它的殘暴，在叛軍四十八個軍事領導人中，四十六人出身蘇慕薩軍隊，蘇慕薩軍隊素以殘暴著稱，一九七九年被桑定政權推翻，結束其半個世紀的暴政統治。就在桑定政權革命成功，極待重整破碎家園，實行嶄新的社會主義時，美國向桑定政權發動了「低強度戰爭」，採取長期經濟封鎖、精神恐嚇、政治顛覆，再配合游擊戰爭，企圖從經濟社會角度來拖垮桑定政權。這場戰爭由美國出資，由尼國叛軍代理執行。就在這個背景下，做爲以美國爲首的國際反共聯合陣綫的一員，台灣也盡了一份力量，捐贈七千萬台幣給尼國叛軍，能說這不是一筆幫凶費嗎？

後記：有關尼國叛軍對尼國民衆的軍事恐怖行爲，可參考此書「Blood of the Innocent — Victims of the Contmas' War in Nicaragua」，Teófilo Cabestrero 著，一九八五年初版，Robert R. Barr 英譯，Orbis Books, NY, 英國倫敦「Cathol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出版。

◎世界之窗◎

林德之死

■何昀

美國的青年工程師林德為了貢獻一己之長給最需要幫助的地方，他選擇了尼加拉瓜，但是他的選擇，使他遇害……。

班杰明·林德（ Ben Linder ），土木工程師，美國華盛頓州人，生於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三年畢業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為了貢獻一己之長給當前最需要幫助的地方，林德選擇了尼加拉瓜。

來自世界各國的志願工作人員，在尼加拉瓜組成各種服務隊，協助當地人民農耕、水利、醫療、建築和教育等社會建設工作；長期駐尼國服務者總共三千餘人，短期服務者每月亦以千計，他們就是人們尊稱的「國際志願工作者」（ International ），林德是其中的一員，他的願望是興建水電廠，為尼國民眾帶來「光明」。

林德住在谷化「 El Cuá 」郊外，谷化是一個擁有革命傳統之城，在桑定政權革命時期，當地人民曾秘密資助桑定游擊隊，因此慘遭蘇慕薩的軍隊殺戮。谷化座落在尼國北方邊境，桑定政權成立後，尼國叛軍經常跨過宏都拉斯邊境，南下攻擊谷化等邊界城市，叛軍為了達成恐慌人心、破壞經濟之效，大肆破壞合作農場、學校、醫療站及水電廠，普通老百姓也經常慘遭殺害。

去年七月廿八號在谷化附近，三位來自歐洲的長期志願工作者和兩位當地居民，在汽車裏遭叛軍機槍掃射斃命。這三位遇害的歐洲人，一位是西德水利專家，另一位是法國通訊專家，第三位是瑞士志願建築隊的組織者；林德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說：「現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繼續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說既然你

不能直接對付那些殺人的混蛋，你就間接地做——繼續工作下去！」

林德在谷化完成了一座水電廠，使得當地一千五百個居民有生第一次看到電燈。今年四月廿八日早晨七點多鐘，林德和六位村民圍坐在儀表之旁觀測水速，計畫建立另一座水電廠，尼國叛軍悄悄地包圍他們，一顆手榴彈扔去，在林德身旁不遠處爆炸，彈片炸傷了林德……

●為尼加拉瓜而死的林德



...。

林德之父指控美國政府與尼國叛軍有罪

林德之死的消息傳來美國，美國各大報儘管在尼國首都馬拉瓜有長駐記者，却並未派記者前往現場採訪，反而推卸責任給桑定政權，稱它限制記者採訪，事後更假定林德身懷武器，影射林德是在與尼國叛軍作戰中傷亡的。

相形之下，林德母校華盛頓大學的校報「每日新聞」，在林德遇害後第三天（四月卅日）即刊出詳細的報導，證人的採訪以及出事現場的簡圖；鑑於大報對林德之死的冷漠甚至歪曲，該報編輯憤怒地罵道：「如果他媽的西雅圖大學報紙能夠找到證人採訪，為什麼紐約時報不能？」

據「每日新聞」報導，林德死於手榴彈，驗屍的結果才發現，林德先是腳部受傷，然後遭人在離頭部不到兩尺處向頭部開槍斃命，是一種處決執刑方式，由於開槍距離太近，林德臉部還遭彈藥粉末灼傷。

最近林德父母，應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之

邀出席作證，會上林德父親指控道：「當他受傷倒地時，他們開槍炸開他的頭，這是謀殺，我認為美國政府和尼國叛軍有罪。」

佛羅里達州眾議員馬克答道：「我不明白你怎麼能用自己的悲傷來政治化目前的情勢？我並不是要為難你，但是我真正覺得你們是自找的……。」

「自找的？」林德母親不可置信地重覆，「這是你能講的最殘酷的話。」

馬克辯道：「我不認為我的話殘酷，我只不過就事論事。」

廿七歲的林德死了，他死於美國中美洲政策，死於美國一手製造導演的尼加拉瓜之戰，林德父母的指控一針見血。林德死前，已有無以數計的尼國老百姓死於叛軍槍下，林德死後，尼國叛軍的殺戮行為仍在繼續，林德一位在尼國志願工作的瑞士朋友飛利浦這樣說：

「我們不該只注意他們（指『國際志願工作者』），雖然已有八位『國際志願工作者』遇害，但是尼國遇害民衆數以千計，他們生活在恐懼中，對他們，這種事天天發生。」

雷根政府“強暴” 美國保護民權的準則

■白波

一九七六年美國曾立法禁止情治單位對和平的政治社團進行偵察工作，但是這項法案已經因為 CIA、FBI 的違法亂行，而被踐踏得不成樣子……。

由於七〇年代中期有大量證據揭露美國聯邦調查局非法地對黑人民權運動，及各反越戰運動團體做政治性的滲透、分化等「思想控制」活動。司法部於一九七六年確立了一套「準則」——禁止聯調局對和平的政治社

團做偵察工作，除非有實際證據顯示該社團牽涉違法犯罪活動。該準則立意在保護人民的憲政權利。但是自從一九八〇年雷根入主白宮後，這套保護民權的「準則」已被踐踏得不成樣子。

- 美國軍援惡名昭彰的尼加拉瓜叛軍，圖為美軍代訓叛軍的士兵。



◎世界之窗◎

右派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強烈的雷根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施行「鐵腕硬漢」作風。它一方面大力支持在其勢力範圍內的「鐵腕政權」，支持這些政權鎮壓反抗運動的能力，焦點尤其放在中南美洲。據人權團體的資料，在雷根第一任內，包括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智利、烏拉圭等各國政治不滿人士、學生被暗殺、失蹤、刑求的報告大幅增加。它另一方面既明又暗地企圖推翻尼加拉瓜社會主義桑第諾政府，並全力整編、武裝以當年惡名昭彰的尼加拉瓜「國民軍」(National Guard)為主的叛軍，而成為今日有名的「反抗軍」(Contra)。由於美國民衆對於殘暴的蘇慕薩政權及其「國民軍」留有深刻的惡劣印象，雖然雷根一再親自出馬為「反抗軍」做公關並大彈反共的調調，民意調查仍顯示民衆反對其對桑第諾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令雷根政府感到頭痛的是，一些人權組織、教會、學術單位等團體對中南美洲所做的報告，否定了雷根政府對這些國家實況的陳述，動搖了雷根政權外交策略的基礎，這些團體完全未牽涉任何違法犯罪活動。依照司法部的「準則」，聯調局不能對他

們滲透、分化或調查。然而，雷根政府為了推行其保守主義的外交策略，司法部這套保障民權的「準則」已被強暴了。

美國軍火工業政經複合體主宰著雷根

今年二、三月間在眾議院民權及憲法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許多參與庇護政治難民運動的教會組織及反對干預中美洲政策的民間組織均指出其辦公室曾被破門而入，被盜走各類的資料、名單及電腦磁片。至於有價值的電腦設備反而不受青睞，充份顯示此類行動的政治意圖。會中，一位奉命對某組織做滲透工作的前聯調局探員作證指出，他的任務是對該組織做分化工作。作證時他指出由於一直搜集不到該組織的違法證據，他

- 雷根召開國家安全會議，商討軍售伊朗及經援尼國叛軍醜聞案的對策。



才明瞭此項任務是政治性的。他亦提及曾有探員拿給他看從各類組織裏盜來的資料，證明了聯邦調查局和各組織所發生的盜案間的關連。令人心驚的是，該前探員指稱他原先的任務是向薩爾瓦多國民軍提供美國移民局將遞解出境的難民名單及抵薩的時間，並向其提供在美從事反對薩國國民軍運動的各類黑名單。衆所周知，薩國國民軍和臭名昭彰的「死亡執行隊」(Death Squad)關係密切。這暴露出聯調局和專事暗殺的「死亡執行隊」的直接關係。更荒唐的是該前探員竟將兩位民主黨參議員及一位神父列入「恐怖份子資料冊」中，充分地打破了司法部所訂的所謂「準則」。

據一位人權組織負責人表示，在雷根政府所謂的「外交情報工作」及「反恐怖主義」藉口下，聯調局及中央情報局恣意

滲透調查所有不滿雷根外交政策的社團和人士，目的不僅在於收集政治情報，更是為了做有效的政治和思想的控制。白宮在此行動中亦有極不尋常的角色，該前探員稱，在他離開聯調局工作後，中央情報局曾接觸過他，意圖網羅他進入一個直接向白宮做報告的「愛國會」(Patriotic Agents)組織，他們是這樣地說：如果你真的信仰保守主義，就不要管政府的正常管道——直接為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NSC)工作。這個國安會正是目前鬧得滿國風雨的「軍售伊朗」及「經援尼國叛軍」醜聞的主角。一直躲在國安會後面的雷根，可能才是真正這一整套「意識形態外交政策」及「思想控制」操作的主宰。而主宰著雷根的，相信正是代表美國軍火工業政經複合體的一保守主義。

柯拉蓉與菲共又要攤牌？ ■李健

菲律賓的人民正在望著：到底艾奎諾政府和新人民軍誰才是真正的土地改革者？

菲律賓的地主也 在望著：

到底艾奎諾政府和新人民軍誰敢做真正的土地改革者？

菲律賓的艾奎諾夫人靠著人民的力量，擊垮了馬可仕政權。但自從她上任後，這位女總統又一直忙著應付另一種「人民的力量」了：菲共的武裝組織——新人民軍。

新人民軍與菲律賓政府武力對抗已有十八年之久。馬可仕政府垮台後，他們繼續武裝鬥爭，同時認為與新政府有談判的餘地，終於在八六年十一月，在艾奎諾夫人免除她極右國防部長恩瑞爾後，雙方開

始談判，而且互訂自十二月十日起，停火六十日。

但是，一旦停火協定到期後，雙方又回到原先對立狀態，而且新人民軍人數也顯著增加。令人不得不問：菲律賓人民，為什麼仍然會繼續向那個打垮過獨裁血腥的政府作戰？

許多人都認為菲律賓人民長期的貧困，政府官員的腐化，社會財富分配懸殊，是培養菲共叛亂的最佳溫床。因此有人提

◎世界之窗◎

議，菲律賓政府得軍事力量與社會改革雙管齊下，方能打敗共黨叛亂；問題是，菲國政府目前沒有這種能力。

另外一位前政治犯陶瑞神父則認為：新人民軍能一直維持而且發展，主要是受到人民的支持；菲律賓人民希望由新人民軍來對抗艾奎諾政府，他們也擔心談判會造成新人民軍解體，這樣一來，他們就毫無任何依賴了。陶瑞神父另外也呼籲艾奎諾夫人要繼其先夫遺志，要與左派結盟，而不是與軍人掛鈎。

許多菲律賓人，特別是農民，他們不相信艾奎諾政權能徹底實施土地改革，能脫離美國的經濟、軍事力量干預。相反的，倒是有些菲共人士蠻同情艾奎諾夫人的：他們讚揚艾奎諾夫人努力整頓內閣、盡力的推行土地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但他們也指出艾奎諾夫人遲早會與她的「影子政府」結成一氣：其中包括她娘家的親戚沈樞樞主教及一些以前與馬可仕親近的財團。

美國仍舊操縱著艾奎諾政府

菲律賓人民不會看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才會一直支持新人民軍。據美國國防部估計，新人民軍的人數已由一年前的二萬二千人到目前的二萬三千五百人左右；而且在全菲律賓四萬一千個小村落中，新人民軍控制、影響了其中的五分之一。

當然，有不少人也十分嚴厲的批評新人民軍。像在澳洲有位學者就指出：新人民軍及菲共的領導，抱著極強的毛派教條；他們利用土改口號來欺騙農民；而且他們把農民當成砲灰，用武力來迫使農民加入。另外，有一位時代雜誌的記者也持類似的論調，他也更進一步

的指出，菲共也吸收不少教士、修女，來支助新人民軍。

但菲律賓的鮮花革命，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好像並未為絕大多數的菲律賓人民帶來「鮮花」或「革命」，政權換了批人，面目看起來比較「溫和」，但往深處一看，美國的那隻看得見的手仍然還在那兒，社會貧富懸殊的結構仍然維持在那兒，舊有的經濟形態、困境也仍在那兒，而且新人民軍也還是在那兒。

當然，在雙方真正攤牌的時候，艾奎諾夫人的牌點比較高；雷根政府今年支援菲律賓的項目包括：三億二千三百七十萬美元的外援，五千二百六十萬元的軍援；另外他又追加五千萬元援助。但就新人民軍方面而言，他們也不是繡花枕頭，他們的士氣高昂，他們受農民支持，而且他們經過千錘百鍊給磨出來的游擊戰技，遠遠勝於政府軍的青嫩。



• 菲律賓的新人民軍。

美國給瓜地馬拉 留下爛攤子

■林仁傑

美國扶植瓜地馬拉的軍人極權政府，殘殺民衆，造成難民大量流入美國，現在又要把自己製造的難民送回瓜地馬拉，令瓜國新政府頭痛不已。

對數十萬流落在美國各都市角落中的中美洲非法政治難民而言，五月中發生的兩件小事，在他們充滿酸甜苦辣的艱辛人生中又添上兩天緊湊的喜怒哀樂之情。

頭一件事乃瓜地馬拉八六年新上任的具有文人形象的總統塞瑞卓，在他首度訪美前，向美國要求其新移民法能對在美國的中美洲非法移民網開一面，讓他們能在美國即使給抓到後，至少兩年以後才給遣送回國。他的理由是：如果廿五萬到卅萬瓜地馬拉的非法移民全給美國遣送回國的話，這會給瓜地馬拉造成極大的社會衝擊，而且對當地民主的發展有不良的影響。另外薩爾瓦多總統杜阿德前陣子也對美國做類似的要求。

第二件事乃美國的反應也快，她的一位高級行政官員立即發表聲明，說雷根總統將會回絕這位總統的要求。他也說，新移民法如有太多例外的話，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美國的新移民法自五月初即開始正式執行，其中規定：任何雇主僱用非法移民一旦被發現，即會遭到處罰；另一方面它也大赦那些自八二年一月一日起即住在美國

的非法移民。據估計如移民局真正嚴格執行的話，仍會有近百萬的中美洲非法移民給遣送回去。

美國的一些政策，弄得中美洲一些總統十分頭痛。以瓜地馬拉為例：美國中情局自一九五四年搞垮瓜地馬拉具有民族主義、進步思想的阿本茲總統後，即扶植其軍人政權長達卅一年（直到一九八五年末），此軍人政權的極權高壓、殘殺無數民衆、血腥鎮壓原住民的暴行，已引起無數次國際公憤。在八〇年初開始，即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原住民往四處逃難。世界上也只有少數國家與其維持友好關係、密切合作；台灣即是其中的一員。這個軍人政權殘酷的暴行，導致美國國會近幾年都看不過去了，決定要制裁。這也才導致雷根政府趕緊幫忙改其「形象」，借用「選舉」，換成文人政府於八六年一月上台，好向瓜國人民、國際輿論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也方便雷根向國會要求支助瓜地馬拉。

難民是美國幫忙製造出來的，現在美國又要把難民送回去。問題由你製造，由我來解決，怎麼不頭痛。



◎人 物◎

新馬克思主義大師 盧卡契訪問記

■王度譯

盧卡契 (Georg Lukács 1885-1971) 是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宗師，對西方思想界有深遠的影響，其人雖往，仍不減魅力。這篇訪問作於盧卡契臨終前不久，在談話中，盧卡契回顧一生，對自己的著作與政治生涯作了頗多自我批評，可謂盧卡契對自己的思想所作的晚年定論。原刊於1971年7~8月份的英國新左評論 (New Left Review)，特予譯出。——編者



• 盧卡契與訪客談話

歐洲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再度呈現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這個難題。在你看來，資產階級民主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根本上的差異是甚麼？

社會主義民主須有物質基礎

資產階級民主始於1793年的法國憲法，這憲法是資產階級最高度的、也最激進的表現

。它的界定原則是將人區分成公眾生活裡的市民 (cittoyen) 和私人生活裡的布爾喬亞——前者賦與普遍的政治權利，後者則是特有而不平等的經濟利益的表現。就資產階級民主做為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現象而言，這種區分是基本性的。這一點在哲學上的反映，可以在德·沙德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 法國作家，當代哲學視為尼采之先驅) 的作品

裡找到。有趣的是，像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 — 69，法蘭克福學派，在 50 年代曾和盧卡奇有過現代主義論戰）這類的作家居然對德·沙德如此地著迷，因為他是 1793 年憲法在哲學上的等同物。兩者的主要觀念都是：人是人的目的——理性的自我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本質。這樣一來也就很清楚了，在社會主義下，想要重新創造一個在歷史階段上已經過去的民主形式，這些企圖是一種退化，也是一種時代錯置（**anachronism**）。但這並不表示這些傾向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想法就必須用行政的手法來處理。社會主義民主是一個十分實在的難題，而且迄今尚未解決。因為這必須是唯物主義的民主，而不是唯心的。舉個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吧。像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 — 67，阿根廷革命家，協助卡斯楚革命及中南美洲游擊戰）這個人就是雅各賓理想的一個英雄代表人物——他的信念灌注了他的生命，也全然塑造了他的一生。他並不是第一個在革命運動裡這樣做的人。像德國的勒弗內（**Eugen Levine**, 1883 — 1919，德共產黨人，巴伐利亞蘇維埃失敗後遭處決）或是匈牙利這裡的科爾文（**Ottó Korvin**, 1894 — 1920, 1918 年革命社會主義者領導人，也是匈共創立人兼委員之一，匈牙利公社失敗後仍留在布達佩斯重組共黨而遭捕遇害），都是相同的。我們對這類高貴的志節必須深致崇敬之意。但是，他們的理想主義並不是日常生活的社會主義所要的，日常生活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建立在新的經濟結構，具有物質基礎的東西。但我必須馬上再補充一句話：經濟本身的發展絕不會產生社會主義。赫魯雪夫認為當蘇俄生活水平超過美國時，社會主義將在全世界獲得勝利；這說法絕對是錯誤的。這個問

題要用全然不同的方式提出：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說明。社會主義沒有自發地產生出適應於其經濟組織的「經濟人」，這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因為它是過渡的經濟組織，當然，是從資本主義邁向共產主義途中的中間階段。如今，因為社會主義經濟，不像古典資本主義社會那樣自然延生出它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由 1793 年憲法區分開來的市民／布爾喬亞，以及德·沙德；它未能自發地生產以及再生產出適於社會主義的人，所以，社會主義民主的功能正是教育它的成員朝向社會主義。這樣的功能是史無前例的，與資產階級民主也毫無相類之處。一切都很清楚，今天需要的是蘇維埃的重生——勞工階級的民主制度，這是每次發生時都會有一場普羅革命的，像 1871 年的巴黎公社，1905 年的俄國革命，以及十月革命本身。但這不是一夕之間就會出現的。問題是工人對此漠不關心，他們不會先相信任何事物。

歷史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

這方面的一個問題涉及到必要的變遷在歷史上是如何呈現的。最近這裡的哲學辯論中，對於歷史是連續性或不連續性的這個問題有著相當多的爭議。我是堅決主張不連續性的。你是知道的，像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法國哲學家，著有「美國的民主」，為經典名著，）和泰涅（**Elippolyte A. Taine**，1828 — 93，法國文學史家暨美學家，巴黎公社失敗後，著有《現代法蘭西的起源》來反對革命）他們古典的保守論題認為，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歷史上一點也沒有造成根本的變革，因為它只是延續法蘭西國家的集權傳統，而這在路易十四的舊政權（**ancien régime**）就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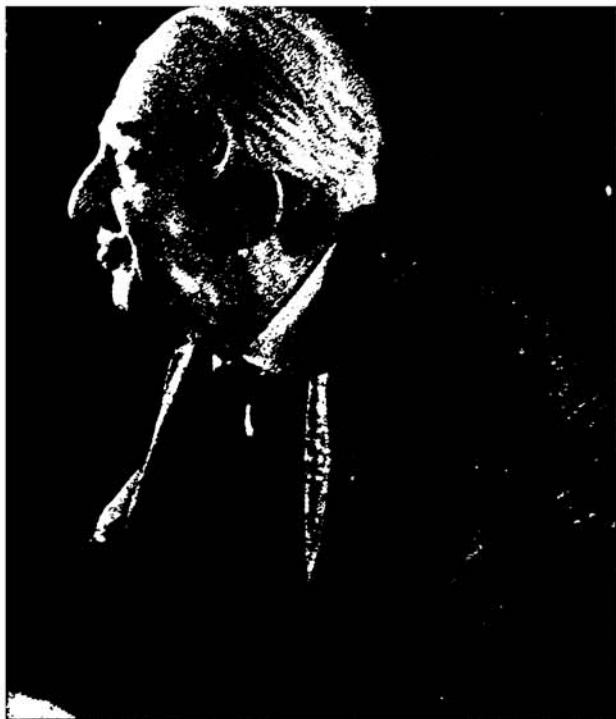
經很強大，到了拿破侖以及隨後的第二帝國更見增強。列寧在革命運動毅然決然地拒斥了這個觀點。他從不把基礎的改變和新的方針表現成只是過去趨勢的延續和改進而已。舉例來說，當在宣佈新經濟政策時，他從沒一刻表示過這是軍事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的一個「發展」或「完成」。他十分坦然地表示，軍事共產主義是個錯誤，而這在當時環境下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新經濟政策則是這個錯誤的糾正，是路線的全然改變。列寧主義的這個方法被史達林主義捨棄了，史達林主義想把政策的改變——即使是巨大的改變——當作以往路線的邏輯結果和改進。史達林主義將整個社會主義史當作一個連續而正確的發展；它從不承認不連續性，如今，這問題比以往都來得更重要，特別是在處理史達林主義的殘遺物上。應該是要從改良的觀點來強調與過去的連續性呢，還是與史達林主義斷然決裂？我相信全面的決裂是必要的。這也是歷史上的不連續性何以對我們這樣重要的緣故。

「科西、葛蘭姆西和我都錯了」

你願意將這觀點也應用在你自己的哲學發展上嗎？今天，你如何評估你在20年代的作品呢？而這些作品與你目前的作品有什麼關聯？

2. 在20年代，科西（Karl Korsch，1886—1961，請參閱陳漳津《科西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森大版），葛蘭姆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共黨理論暨實踐家，著有《獄中札記》等）和我都試著從不同方法來揪住有關社會的必然性（Socialnecessity）及其機械論式之詮釋的難題，而這正是第二國際的遺產。我們都繼承了這個難題，但沒人能解決

——即使是葛蘭姆西，他可能是三個人之中做得最好的。我們全搞錯了；今天如果誤以為那時的作品到現在還妥當從而想使其再度盛行，那就大錯特錯了。在西方，有一股想要將這些作品樹立成「異端的經典」的趨勢；但是對我們來說，今天這些已經沒有必要了。20年代是一個過去的時代，和我們有關的是60年代的哲學問題。目前我在做的是關於社會存有的本體論（ontology of social being），希望能藉此解決我早期作品所提出的一些極錯誤的問題，特別是《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我新作品的中心點擺在必然性和自由之關係的這個問題上，用我的話來說，就是目的論和因果律（causality）的關係。傳統上的哲學家總是以這兩極的其中一個為基礎來建立系統；他們不是否認必然性，就是否認人的自由（human freedom）。我的目的是指出這兩者在本體上的內在關連，並且排拒傳統哲學呈現給人的這種「不是/就是」的立場。「勞動」的觀念是我分析的樞紐。因為勞動並不是從生物性來決定的。如果有一頭獅子攻擊羚羊，那麼它的行為是由生物性的需要所決定，而且也僅由這點決定。但是，如果原始人面對的是一堆石頭，他必需從中選擇，只能靠自己判斷那一個會是最適合拿來做工具的；他從許多「可替換物」



• 盧卡契在書房中

化史上重要的一頁，也就是史格得的作品(Sir. Walter Scott, 1771 — 1832, 蘇格蘭的詩人兼小說家，以《華委萊小說》系列聞名；這裡是指盧卡契《小說的理論》第一章)，曾經論述頗詳；但是對於更廣闊的英國政治史與思想史的發展，以及英國和啓蒙運動以來之歐洲文化的關係，你的看法如何呢？

英國是不平等發展律下的受害者

英國史是馬克思所說的不平等發展律下的受害者。克倫威爾革命和隨後的 1688 年革命，這兩者的極端激進主義，以及它們得以確立城鄉之間的資本主義關係，這幾項因素造成了英國日後的落後。你們力言英國資本主義的農業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對英國日後的發展所產生的似有利實有害的結果，是相當正確的。這一點可以從英國的文化發展裡很清楚地看出來。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經驗主義是在 1688 年以後才佔優勢的，但從此以後掌握了驚人的力量，完全扭曲了整個英國過去在哲學及藝術方面的歷史。拿培根來說吧！他是個非常偉大的思想家，遠勝於洛克；但後者對日後的布爾喬亞卻有著深遠的影響。然而培根的重要性卻完全被英國的經驗主義掩蓋了，今天你如果要研究培根思想裡的經驗主義成份，就必須先瞭解經驗主義裡的培根思想，這兩種情況有極大的差異。你是知道的，馬克思對培根極為推崇。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另一位英國重要思想家身上——曼德維爾 (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 — 1733, 著有《蜜蜂的寓言——私惡即公益》，影響亞當史密斯甚深)。他頗得霍布斯的真傳，但英國的資產階級也把他給忘了。然而，你讀《剩餘價值論》就可以看到馬克思引用過他的話。英國過去的這種

(alternatives) 中選擇。可替換物這觀點是人類勞動之意義的基礎，因此這總是有目的——它設定一個目標，而這正是選擇的結果。如此一來也表現了人的自由。但這自由只表現在推動客觀的物質力量，這客觀的物質力量是遵從物質世界的因果律的。勞動目的論因此而總是和物質的因果律統合在一起的；而實際上，任何其他個體勞動的結果對任何其他個體的目的取向而言也是個物質因果律的要素。相信自然的目的論謂之神學，而相信歷史涵有目的，則是無稽的。但所有的人類勞動皆有目的，且無可避免的插入了物質世界的因果律。這是我論述目前作品的核心點，這個觀點克服了傳統哲學中必然性與自由的矛盾。但我必須強調，我並不是要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系統。我作品的標題——雖然目前在重寫前幾章，但已完成了——是《朝向社會存有的本體論》，而不是《社會存有的本體論》。我想你可以瞭解到兩者的差異。為了使我的這本著作論證精密，我得綜觀各家之言。但我希望這本書可以為我所提及的日常生活的社會主義指出其本體論的基礎。

在歐洲的主要國家中，英國是唯一沒有本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國家。你對英國文



● 布哈林 (Nikolaj Bucharin)

激進文化，已經被掩蓋且棄之不顧了。而它應有的地位，反而因為艾略特等人過份誇大了約翰頓 (John Donne, 1572 — 1631) 等玄學詩人的重要性而遭取代了；這些詩人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歷史上的意義，實在是小得多。史格得的命運，也顯露了同樣的端倪。我在《歷史小說》中論述了史格得的重要性——他是小說家之中，首先看出人是因為歷史而改變的。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不久以後，歐洲的一些重要的小說家，像俄國的普希金、法國的巴爾札克、以及意大利的曼莎尼 (A. Manzoni 1785 — 1873, 浪漫主義作家，代表作《已訂婚者》)，他們也都認知了這一點。這些人都瞭解史格得的重要性，也從他那兒學到許多。奇怪的是，史格得在英國本地反而後繼無人。他同樣地遭人誤解和遺忘。於是整個英國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斷層；這一點在蕭伯納這些後來的激進作家身上，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蕭伯納並沒有從過去的英國文化裡承襲到激進的精神，因為英國文化中原有的激進精神到了19世紀時，已被斬截淨盡了。顯然地，這是蕭伯納一個深重的弱點。

今天，英國的知識份子不應只是從外界輸入馬克思主義；他們必須從自己的文化裡，重建新的歷史；對他們而言，這是責無旁貸的任務；也唯有他們才能完成。我已經論述過史格得了，而海勒 (Agnes Heller, 1929 年生，盧布卡契的弟子兼助手；她著有《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編有《Lukacs Revalued》) 也寫過莎士比亞，但是，英國的重新發現，基本上還是要由英國人來完成。所謂的「民族性格」，我們匈牙利跟你們英國一樣有許多迷惑人心的說法。一部真實的文化史，會摧毀這些惑世之論。這是因為，英國陷

於政治經濟危機，可能對你們有所幫助；而這危機正是前面提到的不平等發展律的產物。威爾森 (H. Wilson, 英工黨前首相，1964 — 70 及 1974 - 76) 無疑是當前的既狡猾又投機的資產階級政客的翹楚——然而，在他主持下的政府，政績一塌糊塗，為害甚烈。由此可見英國危機的嚴重和棘手。

「小說的理論」的歷史意義

如今，你對你早期的文學批評作品抱著怎樣的看法呢，特別是《小說的理論》？這本書的歷史意義是什麼？

《小說的理論》正表現出了我在一次大戰時的絕望情緒。大戰開始時，我認為德國和奧匈帝國可能會擊敗帝俄，摧毀沙皇制度；這一點是蠻好的，英法兩國可能會擊敗德國和奧匈帝國，摧毀霍漢李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這也不壞。但這樣一來，誰又來防止英法文化的入侵呢？對這個問題我深感絕望，百思不得其解；這正是《小說的理論》的寫作背景。當然，爾後的十月革命給了解答。俄國大革命從世界的與歷史的角度，給了我這進退維谷的難局一個解答；我本深深憂懼英法的資產階級會得勝，俄國革命一成功，此事就不足慮了。但是，儘管《小說的理論》有種種的錯誤，我還是認為，這本書確實號召大家起來推翻書中分析的文化所從出的世界，此書十分瞭解，一場革命性的改變是需要的。

當時，你是韋伯的朋友。如今，你對他的評價如何？他的同事宋巴特 (Werner Sombart, 1863 — 1941, 經濟學家，著有《近代資本主義》，以解放說為資本主義的起源) 最



• 韋伯

後成為納粹份子——你想，如果韋伯當時還活著，他會俯首於國家社會主義嗎？

論韋伯

不，永遠不會。你必須瞭解，韋伯是一個絕對誠實的人。舉例來說，他對皇帝就相當不屑。他常私下對我們說，大日耳曼民族的不幸，就是因為霍漢李倫王室沒有人像英國斯圖亞特王朝或法國波旁王朝那樣，遭到砍頭的命運。你可以想像，在 1912 年敢講這種話的，絕不是普通的德國教授。韋伯和宋巴特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從沒對反猶太主義稍作讓步。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正可以點出他的性格。某個德國大學要新聘一位講座教授，請他推薦人選。韋伯回信提了三個名字，以供定奪。然後附上一筆：這三個人當中的任一人都是絕對合適的人選——他們都很傑出；但你們絕不會錄用其中任何一人，因為他們全是猶太人。所以我又附加了另外三個人的名單，他們都不如前面推荐的那三個人，而你們必然會從中挑選一個，因為他們全不是猶太人。儘管他有這一切優點，但你必須記住，韋伯是個有極深信念的帝國主義者。他之支持自由主義主張，只是因為他相信必須要有個有效率的帝國主義，而只有自由主義能夠確保帝國所要的效率。他是一位與十月革命（俄國 1917 年）和十一月革命（德國 1918 年）不共戴天的敵人。他既是傑出的學者，也是根深蒂固的反動派。從謝林和叔本華所開啓的非理性主義，在他身上有了極重大的影響。

對於你轉向十月革命，他作何反應？

據說他曾經提過，盧卡契的轉變必然是在信念和理念上有了深刻的改變，至於托勒（E. Toller, 1893-1939）的轉變，只是一場情緒上的混亂而已。不過，從那以後，我和他就沒交往了。

對俄共領導人的評價

一次大戰後，你加入匈牙利公社，擔任教育事務的委員。五十年後的現在，對公社的經驗作何評價呢？

公社成立的主要因素是維克斯備忘錄（VIX NOTE）和協約國對匈牙利的政策。在這方面，匈牙利公社是可以和俄國大革命相提並論的；是否停止參與大戰的這個問題，是促成十月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維克思備忘錄一發佈，就促成了公社。後來社會民主黨攻擊我們不應該創立公社，但在大戰剛結束的那個時期，已不可能停滯在資產階級的政治架構的範圍裡，推翻它變成是必要的了。

公社失敗以後，你被選為代表，參加了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在那裡，你是否會晤了布爾雪維克的領導人？你對他們有何印象？

你要知道，當時我只是小代表團裡一個小角色——再怎麼說也稱不上重要人物，當然，也就沒有和俄國的黨領導人有過長談。但盧納察爾斯基（Anatoly V. Lunacharsky, 1875—1933，布爾雪維克宣傳家，1917—29 擔任教育藝術委員）引介我會見列寧。他令我傾服之至。當然，我也得以觀察他在大會委員會的工作情形。至於另外一位布爾雪維克領導人



• 演講中的列寧

為“文章‘左’得很，壞得很。這篇文章中的馬克思主義純粹是口頭上的……”）

我的文章全然被誤導了，我也毫不猶豫的放棄了其中的論題。但必須補充一點，在列寧批判我的文章以前，我已經讀過他的〈共產主義的左傾幼稚病〉了；有關參與議會的這個問題，我對他的主張是完全信服的：所以他對我文章的批評，對我並沒有甚麼大改變。我早已知道那是錯的。你應該記得列寧在〈共產主義的左傾幼稚病〉裡是這麼說的：從世界歷史的意義來看，無產階級力量的機關——蘇維埃建立以後，資產階級的議會在世界的、歷史的觀點下，是被取代了；但這絕不是說，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議會馬上就會被取代——特別是西方的群眾，他們是不相信議會的。因此，共產黨員必須在議會裡從事工作，一如在議會外工作。

在 1928-29 年間，你在匈牙利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勃魯姆綱領〉，提出以工農民主專政做為匈共黨時之戰略目標的觀念。這些綱領被視為機會主義而遭否決了，你因而被逐出中央委員會。今天，你對這些綱領有何看法？

〈勃魯姆綱領〉是我反擊「第三階段」的宗派主義傾向而採取的後衛行動；因第三階段堅稱社會民主和法西斯主義是雙胞胎。如你所知，這條為害深重的路綫，同時還挾帶階級鬥爭的口號和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呼籲。我重提列寧 1905 年的口號「工農民主專政」，試著藉此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所提出的路綫中找出漏洞，從而說服匈牙利共黨採取比較實際的政策。我並沒有成功。〈勃魯姆綱領〉遭到黨的譴責，而貝拉庫恩（Béla Kun, 1886 —

，我必須說我是對他感到嫌惡。托洛斯基我遇見後立刻不喜歡：我認為他是個裝腔作勢的人。你知道，在高爾基的回憶錄裡，有一段提到了列寧，那是在革命後，列寧雖然承認托洛斯基內戰時在組織方面的功勞，却認為他有點拉薩爾傾向（Ferdinand Lassale, 1825 — 64, 社會主義者，是馬克思在德國時的對手之一）。至於季諾維也夫，我是後來才清楚他在委員會裡所擔任的角色，他只是一個精於政治權術的人而已。我對布哈林的評價，可以從 1925 年我批判他的馬克思主義的那篇文章裡清楚地看出來——那時，他是次於史達林的蘇俄的理論權威。而史達林本人，我在那次大會則毫無印象——如許多他國的共產黨員，我對史達林在蘇俄共黨裡有何重要性是一無所知的。我和拉迪克（Karc B. Radek, 1885 — 1939？波蘭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1937 年因托派遭捕）則談了些話。他告訴我，所有有關德國三月行動的評文裡，他認為我的評論是最好的，而且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當然，後來黨方面開始譴責三月事件時，他也就改變了看法，公開抨擊這件事。相對於這許多人，列寧留給我極深刻的印象。

政治上的自我批評

當列寧抨擊你有關議會制問題的文章時，你有何反應？（1920 年，列寧批評盧卡奇〈論議會制問題〉一文中反議會的立場過於偏激，認

1937，匈共領導人，第三國際執行委員）和他的黨羽將我逐出中央委員會。當時我在黨裡面是全然孤立的；你必然能夠理解，甚至連同意我反對貝拉庫恩在黨內進行宗派主義的那些人，我都無法說服他們。所以我對這些綱領作了自我批判。這真是絕然的諷刺：是當時的環境所造成的。事實上我並沒有改變看法，我仍然深信當時我是對的。事實上，日後的歷史發展全然證實了〈勃魯姆綱領〉的主張。因為到了1945—48年間，匈牙利具體地實現了1929年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當然，1948年以後，史達林主義所搞的是全然不同的一套——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論布萊希特與班傑明

在三〇年代，以及在戰後，你和布萊希特的關係如何？你對他的評價又是如何？

布萊希特是很優秀的詩人，他後來寫的戲劇〈勇氣媽媽〉、〈四川好女人〉和其它作品，也都相當出色。但是，他的戲劇理論和美學理論卻極為混亂和錯誤。這點我已經在〈當代現實主義的意義〉中說明過了。但這些理論並未改變他後來作品的品質。1931—33年間，我在柏林的作家協會做事。差不多這個時候，更準確地說，是在三〇年代中期，布萊希特寫了一篇文章替表現主義辯護而反對我的看法。但是不久以後，我到了莫斯科，布萊希特在他從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前往美國途中前來看我——他在那次旅程裡走遍了蘇俄——他告訴我：「有些人試圖影響我來反對你，同樣的，有些人試著影響你來反對我。我們來個協議，彼此不要受到挑撥而反目成仇吧。」就這樣子，我們的關係始終很好；戰後，我經常去柏林，只要



● 貝拉庫恩 (Bela Kun)
● 布列希特 (Brecht)



一到就去探望布萊希特，一起進行漫長的談論。到最後，我們的觀點變得非常接近。你知道，在他的喪禮時，他的妻子邀請我做為演講者之一。有件事我感到特別遺憾的是，在四〇年代，我從沒寫過有關布萊希特的評論：這是我的錯誤，那時我全專注在其它著作上。我始終非常敬重布萊希特的，他很聰明，對現實有著很好的感受力。在這方面他和科西截然不同；當然，他和科西也很熟。當科西退出德國共產黨時，也和社會主義斬斷了關係。這一點我能理解，因他不可能一起從事當時作家協會在柏林的反法西斯抗爭——黨方面不許他這樣做。布萊希特就全然不同了，他知道反蘇聯是毫無助益的；終其一生，他都忠於蘇聯。



你認識班傑明 (Walter Benjamin) 嗎？如果他活著，你認為他會發展到堅信馬克思主義而參與革命嗎？

不認識，基於某些原因我從未遇到班傑明；雖然在 1930 年，我動身前往蘇聯時，路經在法蘭克福市遇見阿多諾。班傑明天賦異稟，對許多全新的事物都能有深入的理解。他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探索這一切，却從未找到一條出路。我想，如果他還活著，儘管他和布萊希特有著深厚的友誼，他的發展還是不能確定的。你應該曉得，那個時代過得有多艱難——先是三〇年代的清算，然後是五〇年代的冷戰。阿多諾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下，成為「非信奉的信奉」(non-Conformist Conformity) 的代表人物。

校訂馬克思的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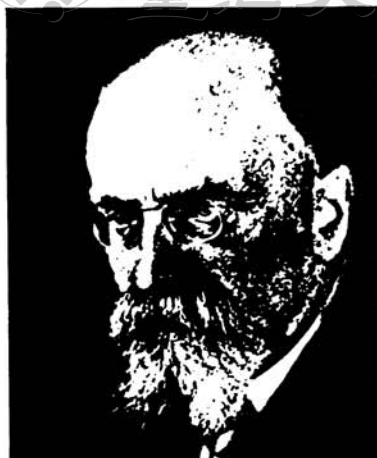


● 班傑明 (Walter Benjamin)

當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得勢以後，你和梁贊諾夫 (Zynzanov) 在俄國的馬列學院一起工作。在那裡，你研究些甚麼？



• 1919年7月12日盧卡契與部隊合影
(第二排，左起第九人)，時任第五師的政治委員。



• 梁贊諾夫 (David Rjazanov)

1930年我到了莫斯科，梁贊諾夫拿出馬克思1844年在巴黎寫的手稿給我看，你可以想像我的興奮：讀了這些手稿後，全盤地改變了我

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也轉變了我的哲學觀。一位蘇俄的德文專家正在研究手稿，準備付梓印行。手稿有些地方被老鼠咬過了，許多地方的字母，甚至整個單字都不見了。因為我對哲學知識的認識，我和他一起做拾遺補闕的工作：經常有很多字，開頭也許剩下一個“g”，結尾也許有個“s”，然後要猜猜中間漏掉的是甚麼。我相信，最後整理出來的是個非常好的版本——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參加了校訂的工作。梁贊諾夫負責這件工作，他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語言學者：不是理論家，而是非常優秀的語言學者。在他離職以後，學院的研究就整個走下坡了。我記得他曾經告訴我，有十卷從未出版的馬克思〈資本論〉手稿——當然，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導論裡已經提過，說這兩卷只是從馬克思為〈資本論〉所寫的手稿當中編選出來的選集罷了。梁贊諾夫計劃要把這批手稿全部出版。但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

三〇年代初期，在蘇聯當然有些哲學辯論，但我並沒加入。那時有一場辯論是德布林 (Abram M. Debrin, 1881-1963, 在二〇年代時，是相對於機械論派、繼承普列彌諾夫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學派其中一支的領袖，曾與盧卡契有過筆戰) 遭到批判。我個人認為那些批評大部分都言之有理，但是，其目的只是要將史達林塑造成一個卓越的哲學家而已。

但在三〇年代，你的確是參加了蘇聯的文学論爭。

我和〈文學評論〉這本雜誌合作了六、七年，共同提出一個非常一致的政策來反對當年的教條主義。法捷耶夫 (Alexander Fadeyev,



• 盧卡契在匈牙利工人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48年6月12～14日）演講。

1901-56，小說〈十九人〉是蘇俄現實主義的高峰之一）等人曾經在俄國和「拉普」戰鬥過（RAPP，「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縮寫，曾經在1927-32年的文學爭辯中獲勝，掌握文藝路線，主張文藝創作配合新經濟政策，1934年證實失敗後被迫解散），也曾經加以擊敗；但這只是因為亞弗巴赫（Leopold Averbakh, 1903生，文藝批評家，是拉普領導人之一，和當時秘密警察領導人Yagoda係郎舅關係）等人是托派份子。法捷耶夫等人得勝以後，反而進一步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拉普主義。〈文學評論〉始終反對這些傾向。我在這本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大概有三篇引用了史達林的話——在當時的俄國，這是非如此不可的——所有這些文章都反對著史達林主義式的文學觀念。這些內容的目的始終是把矛頭指向史達林的教條主義。

自認不適於從政

在你一生中，有十年在政治上很活躍，從1919到1929年，然後不得不完全放棄政治的直接參與。對任何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都是極大的改變。1930年，你的工作生涯驟然發生的改變，是不是因而感到束縛了，或者，反而感覺解脫了？你生活中的這一面，和童年與青年時期之間，有何關聯？對你產生影響的又是那些呢？

不管我的政治生涯是怎樣結束的，我都毫無遺憾，你是知道的，對於1928-29年的黨內爭議，我深信自己是完全正確的——迄今我未改變對這事的看法；然而我却無法說服黨來接受我的觀點。所以我想：如果我是這麼正確，却又取得這麼徹底，這只能說我沒有政治才能。所以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實際的政治工作——我確定自己沒有這方面的天賦。我被逐出匈牙利共黨中央委員會這件事，就算再加上第三階段為禍深重的宗派主義，也絕對改變不了我的信念；一個人只有在共產主義運動的陣容裡，才



• 納吉
(Imre Nagy)



你問我個人對放棄政治生涯時有何感受？我必須承認，我自己對眼前的時代可能不太具有感受力。可以說在我的生活裡，從來沒有過挫折感或是任何情結。從二十世紀的文學以及從閱讀弗洛伊德的作品中，這些名詞的涵義我當然清楚。但我自己則不曾經驗過。在我一生中，當發現錯誤或方向不對時，我總是願意承認——這樣做對我毫無損失——然後轉向另一條路。十五、六歲時，我寫了一些現代戲劇，是易卜生和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國內有〈織工〉等作品）那一類風格的。到了十八歲，我重讀舊作，發現它們糟透了。就在當時，我確定了自己絕不可能變成作家，立刻全燒燬了。我毫不後悔。這段早年的經驗對我日後受用極大，因為就一個評論者而言，每當看到一部覺得自己也寫得出來的作品，我就知道準是劣等之作；這是非常可靠的評論標準。這就是我最早的文學經驗。我最早受的政治影響力是當學生時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後來的影響中最重要則是匈牙利詩人亞迪的作品（Endre Ady, 1877-1917，匈牙利民族詩人，被尊為匈牙利現代文學之父）。做小孩子時，我的生活是很封閉的，而亞迪帶給我極大的衝擊。他是個非常熱衷於黑格爾的革命者，儘管從不接受過黑格爾所謂與既成現實做調和的觀點；而這也是我一開始就拒絕接受的。沒有人精通黑格爾是英國文化極大的弱點。我至今仍欽佩他的思想，而且我認為馬克思所展開的工作，也就是所謂黑格爾哲學的唯物化，是必須繼續推進，甚至超過馬克思。在我這本即將印行的「本體論」裏，有些章節就是試圖做這種嚐試。當一切都給說完和做完時，西方就僅有三位真正偉大的思想家，是其他人比不上的：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馬克思。

能有效地反擊法西斯主義。這看法，我一直沒有改變。我始終認為，活在最糟的社會主義裡也比活在最好的資本主義裡來得更好。

至於後來我在 1956 年加入納吉政府，並不與我的宣告脫離政治互相矛盾，我和納吉的主要政治路線並不相同；所以在十月革命以前，當年輕人想把我們兩個拉在一起時，我總是回答：「從我這裡到納吉那裡的距離，是不會超過納吉到我這裡的距離的。」1956 年 10 月，當受邀擔任文化部長時，對我而言，這是個道德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了，我無法拒絕。到了我們被逮捕，兩人拘留在羅馬尼亞時，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同志們知道了我並不贊同納吉政府時，他們來問我對納吉政策的看法。我回答說：「在我還是布達佩斯街上的自由人，而納吉也是自由之身時，我將樂於坦然暢談我對他的評價。但只要他還是身繫囹圄，我唯有與他團結一致。」

永不憚於認錯

◎經 濟◎

剖析台灣的 民營壟斷資本 (下)

——一個初步的考察

■李榮武

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

消費，是一種社會程序 (social process)，是工作之外私下的程序，其具體實踐是在家庭內 (個體被庇護之處)，不直接受生產關係的管轄，因而消費可以演變出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且導致分化。消費也與個人在社會關係上的位置不可分。這種社會關係是經過其族群認定過，而且相對於其他社會團體的關係。社會關係雖然是以經濟關係而存在，却保有意識型態的性質。這種關係，透過社會的階層化，便展示出消費程序的分化，此即所謂身份或地位。身份或地位在消費程序上反映出一種學得的習慣，它能夠使勞動力的 (生理) 保養維持穩定，而且例行化。家庭便扮演著繁複這些習慣及行爲的功能。勞動市場的新加入者，便很自然地尋求這個在意識型態特性上已經被灌施內在化的身份位置。事實上，只有資本的累積條件變更所造成的社會流動和失業，才足以打破此種固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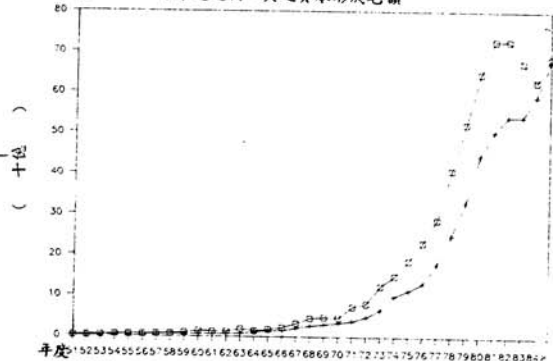
消費，也是商品的交換關係。因而，消費的盛行代表著資本主義體制的確立，意味著傳統大家庭自足自給、大量家務勞動生產方式的結束。在台灣，傳統的家庭結構早已解離。自 72 至 84 年 12 年間，每戶人口自 5.50 人降低至 4.47 人，顯示變成以小家庭為基本的消費單位。個人使用商品的高度密度平均質化，則反映出該階段的生產力水平 (即對勞動程序的控制程度) 以及資本的大量積聚與

集中化 (即所謂壟斷資本的抬頭)。早在 78 年，台灣平均每戶家庭即有電視機一架，其中 45 % 是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每 1.2 戶有一座。洗衣機每二戶有一座 (洗衣機、電冰箱、瓦斯爐等等家用耐久電器，都是勞動階級成型後，必須減少家務勞動的產物)，電話每 3.2 戶有一架，冷暖氣機每 17 戶有一部，每 1.5 戶有一部機車，1.9 戶有一份報紙。

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也決定了民衆的消費型態。即使內銷廠商的產品設計、材料、型式，也大部份受外銷的影響 (甚至同一廠商兼內、外銷)。耐久消費財 (冰箱、洗衣機、電視)，大部份是壟斷集團與國外技術合作生產，鮮有自己的格式。因而，產品消費的洋化 (東洋或西洋化) 甚為普遍。舶來品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從生產到消費上對國際資本的依賴，也迴照在文化、教育、政治等上層建築。

大量、加工的生產品態在勞動程序上是採用泰勒式的「科學管理」(動作時間研究、輸送帶式)、體力和神經的疲憊，使得上班和下班、工作場所與工廠 (或公司) 變成生活上明顯的分界。住房成為個人消費的特權場所。因而，對住宅的大量需求，是廣大的勞動階級出現定位 (無法回流農村)、小家庭膨脹、以及「過度都市化」所造成的。如表四所示，72 年至 80 年，台灣住宅的資本形成呈高度成長狀態。該行業的興盛，當然也有所謂「剩餘資本的第二條綫路」(尤其游資) 的助長，然而，

表四
 1. 表民間住宅之資本形成毛額
 2. 表運輸工具之資本形成毛額



來源：同表一，但引該書表A 6 除同表一

73% 的都市人口，吸收了82% 的第二及第三級部類（輕工業及服務業）就業，也是造成七十年代下半年期台灣房地產投機蓬勃的原因。

交通工具為的是分離工作場所與消費單位。如同表所示，也呈高速成長。住房與汽車（機車亦然）耐久財都不是每月薪水所能負擔的。因之，勞動階級的消費模式，即預設著金融業務活動的龐大社會化。國內銀行近十年來對個人放款額增加為13.75 倍。（相對的，對民營企業放款才增加1.78 倍）²⁹。民間金融資本的成長更是驚人，將於後述。金融活動介入個人生活費用的擴張，代表著對工人生活收支的嚴格管制。在大量消費的社會裡，個體的消費程序就必須這樣，經過細緻的安排，以求穩定，然而同時又不能違背商品交換的自由關係。「小家庭」便透過開支習慣而為消費模式的調節器。為了減緩工人無力償債，造成消費程序的

台灣，商品消費的洋化（東洋或西洋化）甚為普遍。



中斷，就必須限制資本主義的失業和工資，使得勞動力的供應能綿綿不絕。也因此，立法工資的均質化和社會化，以及社會保險基金的建立，都是穩定資本增殖必要的措施。爭議多年的勞動基準法，甚至即將成立的勞工部，農民保險，也唯有到了壟斷資本所主宰的大量消費環境的階級才得以完成。

總之，壟斷資本結構變化的原理，就是製造出一種新的消費模式，使得工資關係得以完全體現。在這個過程中，商品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包蓋了整個社會的生命活動，使得資本主義能夠以無以止盡的積累來擴大再生產。

對消費者運動的反思

消費者抗議運動，多是發生在壟斷資本行將鞏固前的過渡階段上。在這個時期，經濟的危機，消費者的都市化、產品標準不一，這個混亂時期也正是壟斷資本在盤算控制市場需求之時，地方性小資本無力反擊，只好以劣貨低成本出售謀利。多氯聯苯、蝦米、假酒事件，發生於1979 年，喚醒了消費者意識，即在這個資本累積條件的變化——壟斷化的傾向的階級上。

必須注意的，消費者運動如果只抗議產品本身，而忽視質詢整個生產結構問題，則這種品質檢測運動，恰可讓壟斷資本修正其資本有機構成，藉著控制價格而達市場壟斷之目的。因而，很不幸的，消費者運動，往往也是產業結構重整，小廠商被淘汰，促成邁向壟斷性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運動。

金融資本的逐漸擴充

前已述及，壟斷資本下的消費社會創造出金融資本活動的龐大社會化。而金融控制也是壟斷資本最有力的表現形式。事實上，前十大財團的辜氏、

²⁹：經濟年鑑，1986 年P.641。

- “十信案”代表台灣金融資本的危機。

統一、國泰（現已崩潰）以及松下，都控制著相當程度的金融資本。可以說，他們是工業資本家，又是金融資本家。

台灣的金融資本，雖然大部份掌握在國民黨國家官僚資本手中，而且作風保守（根據最近統計，台灣所有貨幣機構存款高出放款台幣 1 兆 2000 億元²⁶。不像美國流動比率相當差²⁷）近十年來亦有飛躍的成長。各類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信託、人壽保險、郵政儲金）的資產淨額。自 72 年的 2,274 億，升到 82 年的 23,092 億，十年間上升 10.15 倍²⁸，而同期製造業的資本形成額才增加為 4.9 倍。即使以就業人數言，金融、不動產、保險和工商服務業，亦是所有經濟活動部門成長率最快者，65 至 85 年間增加為 4.75 倍。同期製造業才增加為 4 倍。

金融資本的危機，到了壟斷階段，就會造成廣泛、連鎖性的社會危機。82 年 8 月亞洲信託投資公司因經營不善，發生擠兌風潮。連續有 84 年華僑銀行的經營不善與股權糾紛，繼則在 85 年一年內連續發生台北十信、國泰信託投資公司及華僑信託投資公司的金融風暴，而國信也導致整個國泰財團的危機，波及數百億台幣。最後只得由納稅人共同承擔虧損，由政府省屬行庫負責收拾。相對的，69 年發生的國光人壽保險公司案，以及一些小規模信用合作社²⁹或農會信用部的問題，均未對社會造成震撼，乃因當時壟斷型式尚未形成，各金融資本較為獨立，相互連結性不強之故。

雖然目前的「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部門才占國內生產毛額不到 10%，（如果加上民



間金額，大致 15%），但是由於最近台灣的「自由化、國際化」，市場對國際資本的再度開放，更進一步被整合於資本主義體系內，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度之金融資本目前呈現著過度膨脹，如美國，金融層面產值已為產品產值之 40%，股票交易每天平均數自 75 年的一千九百萬次升到 85 年的一億零九百萬次，自 77 年以來，其期貨成長率高達 370%³⁰，台灣的金融資本層面必將受波及。今年 4 月 20 日左右，股市便呈現數年來未見的漲勢，雖與台幣升值有關，但其「結構轉變，機構投資者逐漸增加，除了原先的信託投資公司、保險公司外，近兩年來又陸續增加四家證券投資信託公司，分別自美國、澳洲等地籌集一億美元以上的資金，投資台灣股市」³¹，亦大有關係。最近農民保險也將

²⁶：世界日報 1987 年 4 月 23 日。

²⁷：“Banks, Skating on Thin Ice”, Monthly Review, N. Y. 1975 年 2 月。

²⁸：台灣銀行季刊，34 卷第 4 期 P. 224。

²⁹：台灣的信用合作社，發源於日據時代，光復後成了國民黨籠絡地方派系勢力的金融工具。

³⁰：Monthly Review, 1986 年 10 月，P. 15。

³¹：世界日報 1987 年 4 月 23 日

實施。配合著保險業務的對外開放，金融活動勢必更多。至於期貨，早在 80 年前後，台北市就有百餘家左右交易的公司，最近由於游資氾濫及新台幣升值，「期貨業者們正紛紛拓展業務，所從事的期貨交易項目，也由以前的黃豆、玉米、豬腩、黃金等原料商品，擴增到馬克、日圓、法郎等外匯^②。

金融資本層面，由於數據資料不易掌握，也就難以定量分析。但是，從質來看，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不同，前者以信用形式買賣證券、股票、期貨交易及其他金融工具，操縱公司的併合和收購。金融資本並不產生使用價值，只以貨幣資本形式在金融層面上流通。同時也雇用一大批有用的人力資源。當然，即使生產層面凝滯（生產力下降），金融層面依然可以同時蓬勃發展（如現今的美國），甚至藉著辦公建築、運輸、通訊和商業機器的需求，以及刺激消費，奢侈品及服務的購買，稍為緩衝經濟的凝滯，但是，由於金融資本只是錢滾錢，未介入生產程序，它是一種外部化的，最具商品拜物教形式的資本，不代表生產力的進步。

被擠壓的中小企業

自八〇年以來，台灣以出口為主宰的經濟體制一直被困在西方資本主義凝滯、結構改造的衝擊，以及其他勞力密集的第三世界國家外銷競爭中，亦呈凝滯狀態，如下表所示：

出口成長率

年度	79	80	81	82	83	84	85
%	26.9	23.0	14.1	-1.8	13.1	21.2	0.9

資料來源：經濟年鑑 1986 年 P.136

1985 年，占出口 98.5 % 的工業產品生產設備利用率降至 80 % 以下的低水準。八十年代初以來，是台灣企業跳票、破產、再重整的艱苦年代。大資本企業，如楊鐵、國豐實業、金豐富、十信、國泰企業、環亞百貨、RCA、增你智、華納利、新竹玻璃等等，都發生空前未有的大危機。即使加工出口區，這些年來也有 290 家工廠被淘汰，其中中小規模者有 80 % 左右，屬於勞力密集被淘汰者有 90 %。退票率亦回復到 75 — 77 年石油危機衝擊時的高水準。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變動率，以及投資率（固定投資 / GNP），均較上次不景氣相差甚多^③，顯示出產業結構問題。

這種衝擊，對壟斷資本及中小企業却有著不同的作用。如前所述，壟斷資本剩餘利潤創造的環境有三，一是出口服務，二是政府開支，三是民間消費。顯然，當出口導致危機，它們必定轉移經營方向。近年來政府開支既然年年增加，當然對壟斷資本最有利，但是要鼓動政府大大增加公共投資以抵消出口層面的萎縮，也不見得非常輕易。因而，最簡截的就是促動民間消費的擴充。否則便將一部份過剩的生產能力移植海外。

因而，我們看到壟斷資本的結構調整，它們藉著政府扶植，與國際資本結合，或縱向整合及橫向連合多角化經營，或改變資本有機構成來適應經濟難關。因此，保利和奇美、台灣玻璃和台福玻璃、飛利浦電視和飛利浦電子、兆麒電子和嘉新、嘉利企業，都各自併合。台塑、統一也進軍電子業，其他大同、聲寶、台塑、統一、長榮海運甚至增大其資本輸出。當然，更重要的是民間消費信用的擴充，如簽帳卡、信用卡的大量啓用，前者已經合法化。相信危機更深沈時，信用卡的使用將會被政府批准。

反而，中小企業在外銷不振，加上民生用品（

②：世界日報 1987 年 3 月 1 0 日，注意在台灣，期貨交易屬非法，未計入正式金融活動內。

③：經濟年鑑，1986 年 P.54。

中小企業唯一仰賴的內銷層面)被國際資本蠶食,可以說是面臨存亡危機。中小企業被國際資本與國內壟斷資本擠壓的情狀。只要看下表即知:

將公營事業,以及服務業(金融、保險……)除外,使得這個法案像「自由化、國際化」一樣,各種資本規模對之有著不同的利益期待。像事實上曾是

中小企業與非中小企業財務狀況比較

單位%

項目	機械設備	固定資產	流動負債	營業費用	營業淨利	短期借款 (國內金融機構)	長期借款 (國內金融機構)	對外國銀行 之長期借款 (國內外國銀行)	海外 長期 借款	獲利 能力	內 銷	外 銷
中小 企業	14.6 ~11.9	28.8 ~32.3	55.8 ~63.8	11.8 ~12.5	2.2 ~4.4	56.3 ~71.3	71.8 ~80.2	1.0 ~4.9	3.6 ~7.4	1.0 ~2.6	26.4 ~46.5	53.5 ~73.6
非中 小企業	20.8 ~28.4	39.7 ~47.4	42.1 ~49.1	9.5 ~10.7	6.8 ~9.5	71.1 ~83.6	53.0 ~62.8	7.9 ~14.2	13.3 ~19.2	2.6 ~7.1	52.6 ~59.9	40.1 ~47.4

資料來源:「台灣中小企業與非中小企業財務狀況比較」

周大中,台灣銀行季刊B4卷3期,1983年9月

註:1.中小企業指資本額在二千萬元以下之民營製造業廠商,非中小企業指資本額在二千萬元以上之民營製造業廠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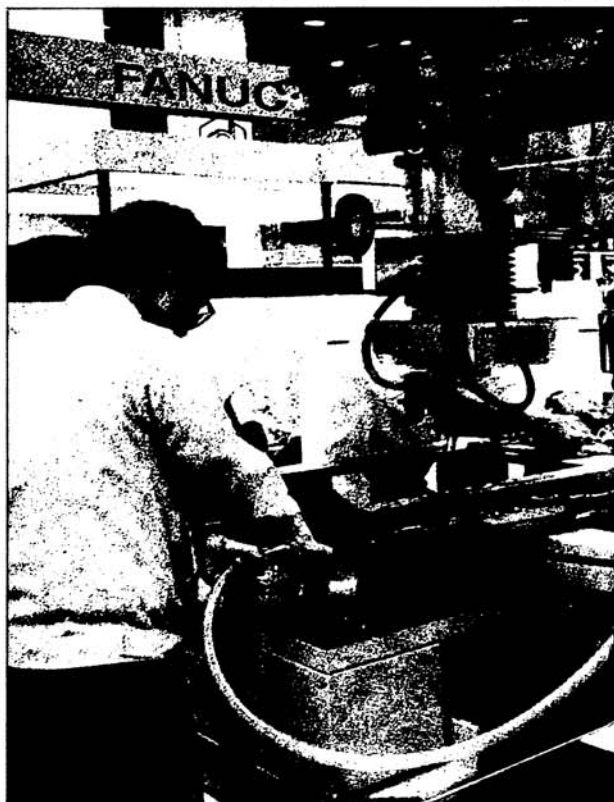
2.本表乃1976~1981年之調查情況。

3.表內數值乃占總資產額之%。

這個表告訴我們①中小企業固定資產低,機械設備少,即資本有機組成差。②中小企業外來資金一般在七成以上,流動負債高。③偏重外銷,利潤率差。④短期借款比重高,且對民間金融借款甚為倚重,表示對購買生產設備所需之長期借款興趣不大,即投資意願低落。⑤非中小企業對國際金融資本倚賴甚重,幾乎高達20%。⑥最重要的,中小企業盈利能力甚差,不及非中小企業的一半。

也就是中小企業無法與壟斷大企業「公平競爭」,去年夏天行政院才提出爭議近十年的「公平交易法」,送立法院審議。該法最主要的用意是防止獨占的濫用、違法的聯合,以及對其他不公平阻礙或限制競爭的行為予以處罰。然而,一方面政府却寄望大企業能提升技術,因而該法中也容許企業結合,另一方面又須鞏固其國家官僚壟斷資本,因而

壟斷資本逐漸改變資本有機組成,以自動化節省



④:本段內容採自經濟雜誌,1986年7月1日。

「聯合獨占」，最近因互相削價競爭的輪胎業，就想期待此法來制止偏低的售價。也是聯合壟斷的化纖業也想藉此法「建立產銷秩序」。平板玻璃業者不認為是獨占，雖然有些聯合合約，業者認為不應該受法限制。水泥業者則斷然否認有聯合獨占。家電業者亦然，甚至反而指責仿冒者會「以小吃大」，政府應予管制注意。至於中小企業對公平交易法，除一些技術細節外，都大表支持，深盼嚴格執行消滅特權，防止大企業與風作浪³⁵。

內受大企業的特權壓迫，以及原料、零件的控制，外却是「出血外銷」，中華民國許多曾博得王國美譽者，如洋傘、熱水瓶、電話機、玩具、聖誕樹等，獲利率都低得可憐。這些傳統性工業（政府所謂的「夕陽工業」）廠商的獲利率，平均要比策略性工業低一至二個百分點（如電子、人纖，大約7~8%左右）像紡織、合板只有5~6%上下。而熱水瓶，79年左右一隻報價大約16美元，84

年降為3美元，而產量仍與前同。鞋在80年平均單價2.71元，83年降為2.56元³⁶事實上，台灣的產品出口單價正日漸下跌。比日、美、韓、新加坡情況差。紡織、成衣、石油煉製品、收音機等都是，即使資訊產品也不例外。顯示貿易條件日益惡化³⁶。難怪中小企業在猶太與日商的逼迫下，為了生存，只有爭取訂單，而不惜殺價。目前又遭升值壓力，其艱困可想而知。這點，我們只要再把上表的「營業淨利」欄細節顯現出，就有更清晰的印象：

中小企業與非中小企業
營業淨利的比較 單位%

年 度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中小企業	4.4	4.0	3.1	2.8	2.6	2.2
非中小企業	8.2	8.0	8.9	9.5	7.5	6.8

註：資料來源及統計方法均如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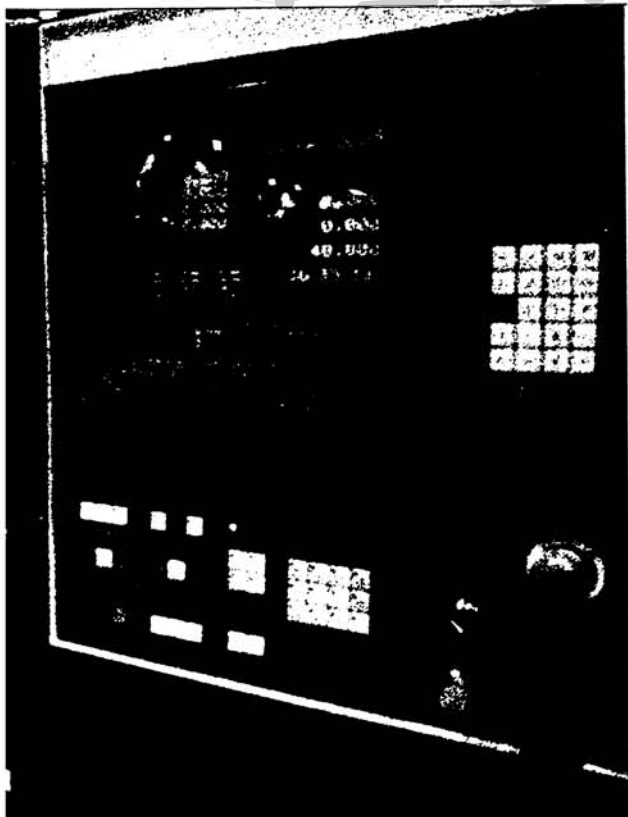
表中顯示中小企業的利潤逐漸下跌。而大企業雖然不是每年上升，其利潤率還是中小企業的兩倍到三倍！顯然，大企業的利潤即使在小企業下降時也照樣上升。可是當小企業下降到一個程度時，大企業的利潤也會下降的，因為大小企業都有一共同依賴性——出口導向工業。然而，因為大企業主要業務是在內銷，可以吸收政府開支、民間消費而能保存相當水準的利潤率。可是，大部份外銷的中小企業就無路可走了。

因之，解決中小企業危機的第一個根本之道，應該是經濟結構的扭轉——自外向式的出口經濟轉為內向式的，以國內為主的生產結構，以及對民營壟斷資本勢力的節制。

台灣的中小企業，被內外夾殺，加上政府偏頗

³⁵：世界日報1984年10月2日。

³⁶：世界日報1987年4月21日。





、不平衡的產業發展策略，反映出台灣經濟結構的環節脫落現象，而其社會表現，就是——失業。

失業

許多人都稱道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創造了極為充分的就業。事實上，即使承認官方的失業率計算可靠，自76年至85年，台灣的失業率成長率高達 $3.02/1.48 = 204\%$ ，不但高過美國的93%，日本的130%，甚至高於韓國的103%，新加坡的109%，以及香港的65%極多。根據天下雜誌報導：1985年「失業人口的結構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不再只是年輕的女工、黑手，也包括了一家之主的中年工人與白領階級。」^⑳

也有人指出失業率計算的不準確，即以失業率才2.14%的1982年看，其低度就業率高達15.36%^㉑！

數字還不能表現出台灣真正失業的情況，因為「台灣的家庭制度與家族企業特色，也掩蓋住失業問題。台灣的小商店和攤販林立，使得失業者可以暫時回家幫忙……而且台灣的真實薪資可以透過物價與年終獎金與薪水的升降來調整，所以資方不必依賴解雇員工來減低真實勞動成本」^㉒由於台灣小企業起步簡單，許多人（尤其中年人）被解雇後便自己當小老板^㉓，因而，失業人數之增多與「自營作業」「自雇者」人數之增多是平行的。因而，大量失業的存在，已經是台灣依賴性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現象了。這有幾個原因：

一是中小企業的被擠壓。占台灣企業總家數98.76%，總生產值65%，雇用人數70%的中小企業^㉔，往往是不景氣的第一波被襲擊者，已如上述。據估計，因公司倒閉而失業人數，85年比84年增加10%^㉕。

二是國營企業經營不善。至86年3月為止，共裁員7600人。

三是廠商，尤其是壟斷資本，已逐漸在改變資本的有機組成，亦即增加固定資本中的機器與設備，以自動化來節省成本，增加「工作效率」。這幾年來，政府無時無刻在提醒廠商，應致力於工業結構的改善，以提高生產力，加強產品競爭力。自61年至72年間，我國製造業工資雖然每年上升7.8%，可是其勞動生產力每年提高8.8%，使每單位

⑳：天下雜誌1986年3月1日，P.13。

㉑：李瑟“失業率是怎樣算的？”，天下雜誌，1983年4月1日。

㉒：林忠正“揭開我國失業問題的面紗”輯於「財經風雲」1985年，P.232。

㉓：許多人嘲笑台灣人喜歡當老板。事實上，人員流動率高，企業起步容易，加上失業都是促成的原因。當然七十年代初會有許多小企業因國際景氣而賺錢，現在好景不再。

㉔：張炳耀“台灣地區企業小型化問題之剖析”，台灣銀行季刊35卷4期，1984年12月，P.150。

㉕：同⑳。

愛護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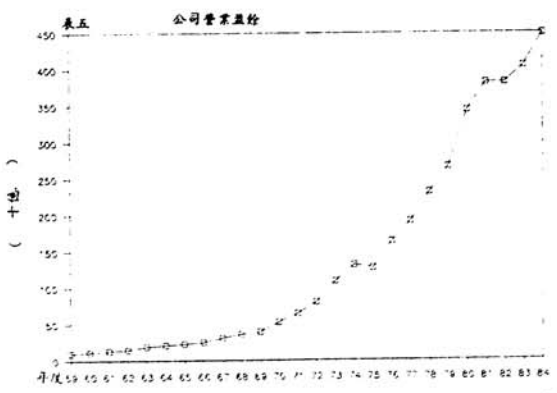
● 台灣失業率高達 204 %，遠超過美、日兩國。

成本下降 1%，「因而產品競爭力相當高」。(對勞工而言，即勞力剝削程度相當高)。但是，根據官方及資本家說法，過去五年來(80~84年)，製造業工資每年上升 14.4%，而生產力才只有 5.6%，致勞動成本每年上升 8.3% (亦即相對起來，工人生活改善程度較資本家剩餘利潤率高)，削弱出口競爭力。甚至有人把 1985 年的出口不振歸之於勞動成本的大幅上升為「關鍵因素」④③。不檢討經濟結構，逕把生產力的衰退歸咎於勞工工資，這根本是階級壓迫的經濟分析。事實上，國際勞力分工在八十年代，勞力成本已不是決定生產的最重要因素。在消費產品上，市場的拓展，新產品的推陳佈新、節制資本家的消費(交際應酬)，減少管銷費用等等，都是提高附加價值，爭取競爭力的重要方法，絕不是「精簡人事」。

雖然台灣的勞動成本最近提高，却並不意味著資本家利潤的縮減。剛好相反，如表五所示，除 81 年外，台灣企業的營業利潤一直在增加(如上所述，中小企業營業利潤一直減少，可見大部份利潤均積

累在大企業裡)。而且，自 1976 年以來，台灣的所得分配已呈停滯且不平均的傾向，亦即貧者愈貧，富者(大資本家)愈富了，眼看資本的積聚及集中化情況愈來愈強烈，連「經濟年鑑」也認為所得分配平均的展望，相當不樂觀④④。

如今，政府與壟斷資本所聯合推動的「提高生產力運動」，正無情地打擊這個勞動力供應充沛(1985 年勞動力參與率高達 59.72%，農林漁牧人口已降至 18.6%，零成長，1984 年已萎縮至 43 歲有著低度就業率，亦即龐大產業後備軍)的小島。因而，台灣標準電子在 86 年初裁掉十分之一(100 人左右)員工。吉梯電信也跟進，裁 90 多名。台化也以自動化「精簡人事」達 1170 人。杜邦中壠廠也裁 385 名。82 年紡織成衣業有正成長，却也在改造中裁了兩萬多名員工。85 年前十個月內，加工區二十多家公司亦裁一萬一千人。外商銀行七十多位。台塑也「精簡人事」500 人。另外，RCA、增你智、華納利(「朝陽工業」)也大量裁員……在內政部的勞資料紛統計上，1973 年才 262 件，78 年增至 506



資料來源：1 1959-1983，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R.O.C. 1984，工研院，Table 5，P. 98 和 101；2 9 項得公司營業盈餘 1984 年 12 月 1 日，1986 年 P. 793，經濟日報社

④③：經濟年鑑 1986 年，P. 239。
 ④④：經濟年鑑 1986 年，P. 167。

件，至 81 年已打破一千件，85 年甚至高達 1622 件，86 年稍減一些為 1471 件。其中，在精簡名義下，「因故解雇」、「無故解雇」者所佔比例均高達 30 % 以上，82 年甚至高達 80.4 %。

生產力的進步或變化，必須牽涉到生產關係（勞動組織、公司結構），甚至社會制度的重組。因而，即使自動化機器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存在（二次大戰後所發展的數值控制機），然而由於無法調和社會的衝突，尤其是工人的抗爭，自動化的進度相當緩慢。可是在台灣，這個工會是政府和資本家的傀儡，工人沒有抵抗組織的社會裡，自動化的推廣却正高速地進行著。最近台幣的升值更助長這種「提高競爭力」的說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最近的調查，87 年大型廠商的設備投資將擴增達 97 %，中型企業增加 22 %，小型企業反而減少 11 %⁴⁵。總共會達 779 億台幣，比 86 年增加 43 %。這絕對不是投資環境改善，而是資本家害怕目前工人意識的日漸覺醒，以及對工人的保險、賠償、退休的費用也因勞基法實施而增加，因而必須改善其資本的有機構成，減少勞工人數，控制生產和勞動程序的決策權。

台灣的生產組織，自始就控制在資本家手中，出口導向的大量生產是泰勒科學管理式、輸送帶式的，透過動作與時間的研究而把生產動作分割成各種細微簡單的動作，不熟練的工作人員很快就可以被訓練就位。因而，台灣的製造業並沒有經過西方以技術工人為生產骨幹的手工製造業階段，而逕自美、日輸入泰勒式、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理論上，泰勒式管理勞動程序下所要求的勞工的體力消耗，以及生產線的集體性，反映在工人鬥爭上的，會



⁴⁵：世界日報 1987 年 2 月 24 日，雖只是調查主觀願望，但可看出這些資本家的用心。

⁴⁶：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N. L. B., 1979 年 P.130。

⁴⁷：蔡建仁，「台灣工運為何不振？」未發表論文。

⁴⁸：彭百顯、鄭素卿，「台灣民間金融的黃金管道」，台灣銀行季刊 36 卷 3 期。

⁴⁹：經濟年鑑 1984 年，P.3。



- 台灣非正式層面經濟的膨脹，到處都可見攤販林立。

組織式的、個人式的鬥爭（如離職、怠工、轉業率高）展開⁴⁷。如今，政治稍為走向民主化，也稍為顯露出有集體性抗議行動的可能之時，却即將面臨「精簡」及「自動化」的失業威脅。是故，對於勞動程序控制權的爭取，勢必成為八十年代台灣勞工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地下經濟與非正式層面的膨脹

台灣地下經濟層面的膨脹主要源自於金融機構的特權及當舖作用，使得龐大的中小企業必須以30%的年利率向民間借貸，如前表所述，其金額高達28.7～43.7%，促成了台灣金融資本一個獨特的現象，即民間金融（所謂地下金融）的發達。

根據統計⁴⁸，台灣民間金融的流通數額，1964年才272億台幣，佔總資金體系的25%，到了1983年，竟膨脹到15496億，且佔總資金體系的33.4%，二十年間增加為57倍之多！甚者，78年以後，民間金融資金體系的規模已大過金融機構的放款。在整個資金存量統計，整體資金規模中，民間金融資金的平均比重竟高達33.2%～45.2%。中小企業的利息負擔甚重，有的甚至動用消費者貸款，據估計，1985年的3500億消費者放款中，竟有13%是被中小企業用來作週轉。

再者，中小企業的沒有出路，甚至破產，造成失業的增加，導致台灣的非正式層面（地下經濟）在第二次石油危機（1979年）之後大為擴張。大量地攤的出現使得1985年百貨公司的成長率大為下降，80、81年甚至變為負成長，有的倒閉成經濟犯。美元黑市在八〇年代高過官價10%以上。套匯、地下錢莊、互助會、期貨大為盛行，而互助會倒閉，捲款而逃者有的達千萬、億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安。資金外流在1983年高達國民生產毛額（GNP）的8.7%⁴⁹。仿冒產品的出口也高達GNP的1%（單在83年就有120家廠商仿造

是勞動日（勞動時間）的抗爭以及集體議價的鬥爭形式⁴⁶，然而由於官方的鎮壓，台灣工人只能以非

APPLE^[1])。全球所注意的 151 項仿冒品中，就有 60 % 來自台灣。大家樂一年吸收了至少一百億元的游資。根據 1984 年經濟年鑑的報導，地下經濟已日趨活躍，其金額在 83 年高達 GNP 的 32 %，達 42473 億台幣！

在各種非正式層面的活動中，有一項社會意義非常突出的行業，那就是色情業。

色情業的氾濫

色情業寄生在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上，正如種族主義依附在美國經濟結構一樣，在台灣的色情業幾乎遍布 27 個都市內，滲透到各種消費行業。有人統計目前台灣從事色情的女性可能有 60 萬至 100 萬人，寄生在這些女人身上的嫖客，又不知有多少！

台灣出口導向工業資本積累的基礎，就是小農

升至 78 年的 39.18%，85 年更達 43.45 %。因「料理家務」而未參與勞動力者已愈來愈少，81 至 85 年間大概就減少十萬人左右^[2]。

從事家務勞動女性的減少，使得女性佔男女總就業人口的比例一直增加，自 65 年的 27.35 % 增至 79 年的 33.07 %，85 年更達 36.50 %，大部份是 15 歲到 34 歲的年齡，以 86 年 2 月為例，就佔女性就業的 62.5 % (同階段年齡之就業男性佔總男性就業 49.3 %)。甚者，女性就業人口也大部份集中在製造業上，79 年佔總就業女性之 67.55 %，86 年為 65.07 %。(同期男性才各為 45.58 %、48.26 %)。如前所述，台灣的中小製造業，在依賴及壟斷資本的壓迫下，就業相當不穩定，絕大部份女性工作的不穩定，乃是必然。因而，女性失業人口佔女性勞動力的比，一直就高於男性失業人口佔男性勞動力(勞動力 = 就業人口 + 失業人口)之比。如下表所示：

男、女性失業能力比

單位：%

年 度	1964	1968	1972	1976	1978	1980	1982	1983	1984	1985
($\frac{\text{女性失業人口}}{\text{女性勞動力}}$)	6.9	2.03	1.99	2.13	1.87	1.48	2.25	2.75	2.47	2.90
($\frac{\text{男性失業人口}}{\text{男性勞動力}}$)	3.32	1.58	1.23	1.54	1.58	1.11	2.08	2.69	2.43	2.90

資料來源：1964 ~ 1976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R.O.C. 1984, 9
1978 ~ 1985 中華民國勞工統計月報 1986 年 4 月

商業化和不熟練勞力^[3]。女工是台灣勞力密集工業結構的骨幹。隨著資本主義化的延伸及深入，台灣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愈來愈高，自 65 年的 33.11%

尤有甚者，失業的女性，大部份分佈在 15 至 34 歲之間(事實上，台灣失業人口不分男女，該階段年齡失業者佔比例最大，自 78 年以來都在 65% 以

[1] 劉進慶“從中樞衛星關係的觀點看台灣政治經濟的演變和展望”，「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P. 326。

[2] [3] 中華民國勞工統計月報 1986 年 4 月，圖 12。這方面也表示消費模式的改變。尤其住和行方面支出的增加，必須夫婦共同上班才可維持生計。

[4] [5] 廖碧英，“色情問題現況報告”，亞洲教會婦女大會觀光與資春研討會報告，載於紐約台灣公論報 1986 年 4 月 30 日。

• 色情業泛濫是台灣經濟結構的必然。

上)，如1986年3月，失業的七萬二千名女性中，竟有六萬九千人是在15～34歲之間，佔96%！可見，年輕女性持續而高比率的失業是常態，它是寄生在出口導向的勞力密集結構上的。

由於台灣服務業就業人口的比例一直增加，自65年的31.25%升為85年的41.72%，可能吸收滯滯製造業的過剩人口，譬如金融及商業兩部門，近年來女性多於男性。或許有這種流動存在（因為不少女工是高職畢，極可進入服務業），因此，持續而高比率的女性失業率亦指出，失業者是教育程度、都市謀生能力相當差的女性，她們是社會階梯的墊底者，她們，大多數就是台灣資本主義的移入勞力：原住民女性。

因此，色情行業的存在，絕對不是大眾消費社會的物化（笑貧不笑娼），或有的女性為提高物質享受而甘願下海。從事色情業女性工作環境的惡劣與不人道剝削，是沒有人樂於此道的。而是由於年輕女性的失業，在一個充分無產化的階級社會裡，為了生活，只有出賣自己的原始本錢。

色情業表面上會有財富的再分配，事實上大部份利潤還是歸捐客所有。即使從事色情而賺大錢的女性消費也大部份是奢侈品或舶來品，對國內生產



設計刺激作用，縱然賺取一些外匯，也助長消費的不平等（奢侈）。至於色情業所引伸出來的犯罪、家庭及社會問題，顯現出色情業存在所需要的社會成本相當大。

總之，到了八十年代，隨著資本累積的延伸與密集，大量勞動階級的台灣社會已經呈現著一種均質化、集體性的消費模式。這種質的變化，也加速金融資本的擴充。然而，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的結構改造，以及國內勞動生產力提高的需求，使得台灣的壟斷企業在政府與國際資本結合下，逐漸改變其資本的有機組成。這種情況，加上中小企業內外被夾殺的困境，造成社會大批的失業、地下經濟以及非正式層面的大肆擴張。泛濫的色情業，便是這種經濟體制下，女性勞動力的持續高比率失業下的無情產物。

必須成立反壟斷聯盟

從我們的分析，可以瞭解到，反對壟斷資本的擴張，是八十年代台灣社會運動最重要的課題，反壟斷資本有幾個意義：

- 一、扭轉出口導向經濟體制，由外轉為內向的生產，同時抑止壟斷資本延伸。
- 二、解救中小企業，解決大部分人的失業問題，以減少非正式層面的活動，因而我們會有個更乾淨的社會。
- 三、反對特權及經濟的不公平、不合理分配（只優惠特權廠商的策略性工業輔助政策）。
- 四、使消費者運動看到更長遠、更廣闊的經濟結構問題，避免走向有利資本壟斷化的方向。
- 五、環境運動者能看到壟斷企業（不管公、民營），是污染的最大禍首。
- 六、勞動階級反對壟斷資本「精簡人事」的生產力自動化計劃。
- 七、婦女運動者正視色情業的存在導源於失業問題，亦即中小企業的破敗。而經濟的壟斷化，才使這個問題更加惡化。

願民進黨人士，以及所有關心台灣鄉土的進步人士都來參加這一批判性、重建性的反壟斷聯盟！

◎香江話題◎

楊尚昆訪美 揭開對台 新攻勢序幕

■章 名

今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楊尚昆訪美，引起各方矚目。楊尚昆此行的重點之一是積極提出中國統一的方案，據觀察這是中共對台灣發動全面攻勢的開始。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鄧小平以下第一號軍事強人楊尚昆在大陸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首次代表中共最高層訪美，正如美國「新聞周刊」說，美方對此報導不多，中共對此却極重視。在宣傳上，不僅連篇累牘，且接近個人崇拜。

楊尚昆起行首夕，香港親中共的「廣角鏡」月刊，不以本月當地萬眾矚目的政制改革綠皮書當主題，却以笑得欣然，然香港人並不熟悉的這位軍頭為封面。與此配合的兩篇文章共九頁篇幅，標題是毫不客觀的「美國深知楊尚昆地位重要，台北對楊尚昆訪美感不安」、「馳騁疆場飽經戎馬生涯，坐鎮中樞掌握核心機器。楊尚昆地位舉足輕重」。為了突出楊在黨、軍內論資排輩的地位，文中引述不知名的美國「中國通」說，楊尚昆任軍團政委時，胡耀邦只是該軍團屬下共青團的宣傳人員，目前身兼代總書記和總理兩項最高職務的趙紫陽更只是鄉下的小共青團員。甚至當楊出席共軍著名

的遵義會議時，當今的「老大」鄧小平也只是列席當記錄。也許是回答楊可能接任總書記的傳言，這份在關鍵上會製造輿論，却斷不敢傳播謠言的雜誌，圖文並茂地高舉楊後作結說：八十高齡的楊繼鄧之後作過渡性的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似乎是比較穩妥的做法」。

楊抵美後，中共有關新聞媒體除了不遺漏官方報導外，並一再以社論強調楊與雷根總統等巨頭分別會晤，以示接待的隆重。除了遊覽活動的報導不及，其聲勢較近年趙紫陽甚至鄧小平本人訪美，不遑多讓。

楊尚昆訪美的四大目的

中共大事宣揚楊尚昆訪美和楊的地位，原因約有四個：

一、對美關係：反資掀起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致將其視為反對西方甚至排外捲土重來的罡風。近日更初見中蘇共緩和的跡象。中

• 楊尚昆與雷根。



屬中共寄望其接班的青年才俊、高幹子弟，包括出國前已對中樞出謀獻策的人物。這封對胡耀邦下台表示不理解，強烈憂慮中共再颺左風的精英上書，對重視上層輕視群眾的中共，震撼當較「北京之春」有過之而無不及。被視為偏左的「中報」月來風雨飄搖，傳即因獨家刊登這封要命家書所致。

楊尚昆等在美多次出席華人場合，重申開放政策不變之餘，特別表示理解留學生的反應，並不會打擊上書者。

同期內，學運期間以開明發言人身份曝光的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亦分別訪美，巡迴強調放人出國留學政策不變。

此類活動，用意不外一句話：請大家放心。

四、對於台灣來說，尤其重要的是，槍桿子楊尚昆據說也是「對台工作最高負責人」。有關澳門的協議簽訂時，中共即順勢表示，餘下的台灣問題亦按港澳所依循的「一國兩制」模式解決。美國國務卿舒茲在上海則以承認台灣兩岸「三通」實際上已存在為由，對此由靜觀其變有轉趨鼓勵的跡象。隨即，鄧小平在香港政制改革爭議中接見香港基本法全體起草委員，將早年的憂慮舊事新說：台灣一天不收回來，地位就不穩，說不定會被美國、日本拿去。（大意）黨方的新華社發表此語時，以「人」代替國名。鄧接著在首次會晤台籍諾貝爾獎新鮮人李遠哲時，重申此語。

對各方提出中國統一的方案

楊尚昆同期內，藉著紀念廖仲愷的機會，重新呼籲國共合作，而勿囿於黨派、制度、經濟發展之爭。年來大抄台灣雜誌上高層變動內容，相信在這方面負有新任務的「廣角鏡」，

共會否再度親蘇反美，深受白宮的關注。派出被視為鄧小平代表的楊尚昆訪問頭號的資本主義國家，盼能澄清西方的疑慮。

二、軍事合作：美國為了在中美蘇三角關係中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近年一再在軍事上協助中共：國防部長及高級將領相繼互訪，輸出武器及技術，培訓中共人員，在大陸設立衛星監測站，艦隊首訪大陸。亟於現代化的共軍則希望獲得美國更先進的東西。身兼黨軍委員常務副主席和秘書長的楊尚昆率領科技最高負責人方毅和軍事情報頭頭徐信等訪美，自是表示，反資無礙軍事合作，白宮且應提升有關層次。

三、挽回僑心：美國華人知識界，尤其意料不到的是，大陸留美學界，對反資反應極其強烈，接踵發表公開信。其中佔大陸留美學生約十分之一人口簽署的請願書上，半數的人公開本名。這對社會控制嚴密的大陸，簡直不可思議。況且，能出國留學，敢於站出來的，多

- 中共積極推動與台灣的學術文化交流。圖為 198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學術會議中，費孝通（前右二）與芮逸夫（前右一）毗鄰而坐。

這次為楊尚昆訪美造聲勢時，也以對台的作用為重點，甚至說台北下令密切注視楊此行，及時報告。

概括之，中共以台灣為港澳後的下一個目的物，發動攻勢，而派楊來美，在國際上遊說台北主要靠山的美國由不干預改為對台施壓，最終促成國共談判，對「內」則化解海外台灣人的抗拒力。

果然，楊對雷根面陳，「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已在收回港澳的經驗中得到印證。不過，中共不允放棄對台用武的可能性，仍然是美國改變態度的主要阻力。白宮事後重申，希望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此問題。

訪美期間，楊尚昆一行積極統戰美國的台灣人，在重申談判對象仍以掌權的國府為主外，表示不排除與贊成統一原則的台灣人對談。楊本人並就中共「本世紀內三大任務」之一的統一重開有關的支票：在「一國兩制」下，台灣可享有獨立的行政、軍事和司法系統，國民黨和各界代表可參與中共全國性的政治機構（應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財政獨立，不須對大陸承擔財政義務；外貿外資和有關關係、權益不變。台海兩岸在經濟技術上還可互利。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未提到台灣可享有獨立的立法權，但李先念年前極惹人反感的保留特務系統一說則予略去。至於人大，政協的參與權，並無吸引力。這兩個組織近年雖初聞刺耳之聲，本世紀內恐怕也難以成為真正民主的議堂。相比之下，台灣立法院和國民大會可望在同期內完成自然更替。

楊尚昆的助手和中共駐美「大使」韓敘並特地與政治上活躍的南加州台灣人會晤。後者促中共放棄對台用武，與民進黨討論統一的問題，以突破「三不」，要求予台灣人平等參政、擔任要職的機會，對台灣人提供經濟優惠……前者則重申不放棄用武乃避免外人干預、談判對象仍以當權者為主的既定方針。



楊尚昆訪美，肯定只是中共對台發動全面攻勢的開始。在接著夏天的一連串台灣人學術、聯誼、政治活動中，中共勢必較近年更積極。鄧小平近來接連親自抨擊日本藉光華寮事件搞「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復韓軍國主義，也可被視為針對另一個「可能拿去」台灣的國家施壓。國民黨除了開放政治，「民主拒共」外，對於中共主動四面出擊，還有何對策？遠未能解開「統獨爭論結」的民進黨和其他黨外人士，對此又有何反應？中共一方面強調反資，另一方面強調開放改革的雙手互搏式矛盾，對遊說人心來歸到底有多少說服力？一連串的問題，也許在今後數月內，即可見分曉。

◎香江話題◎

他們真的愛香港嗎？

■章名

近來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界對香港問題，別有居心地大發議論，其虛偽與霸道，大惹人反感。

隨著九七問題出現、土生一代長成、中產階級壯大，香港首見社會、政治意識。近年的政治爭論，對習慣於賺錢以外不問世事的人來說，也許是一種騷擾，然而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相對於奴化式的溫馴，或埋首沙堆自欺欺人，都是可喜的進展。

然而，施加於香港的另一類關切，却予人虛偽霸道之感。這就是海外非港人的愛港表現。九七問題提出後，紐約的一些華人成立了有關團體。這聽來很自然，問題是，已知的成員清一色是看法上較傾向台北的台灣居美學者、新聞人員。誠然，每個人都有權關心本土以外的事，香港人也極關切中國的發展。而這些「愛港」的親台學人，相對於國民黨內的傳統派，亦屬開明。然而，選在台北決定「支援香港僑胞保衛自由」之時成立這個比美國的香港人還愛香港的組織，不免惹人疑竇。香港在美、加的專才縱不及來自台灣的多，尚未至於空白。在港曾參與學運的一些專業人士和校園內的港生，均曾討論過「九七」，且發表過簡單的評論。不過，上述組織好像決心維護其外人愛港的純一性，或以為該會的看法，比美國的香港人更權威。如果香港人以「港人愛台純一會」招搖，台灣來的人怕不甘休。本土意識特強者更會猛轟大漢沙文主義。如果洋人搞這類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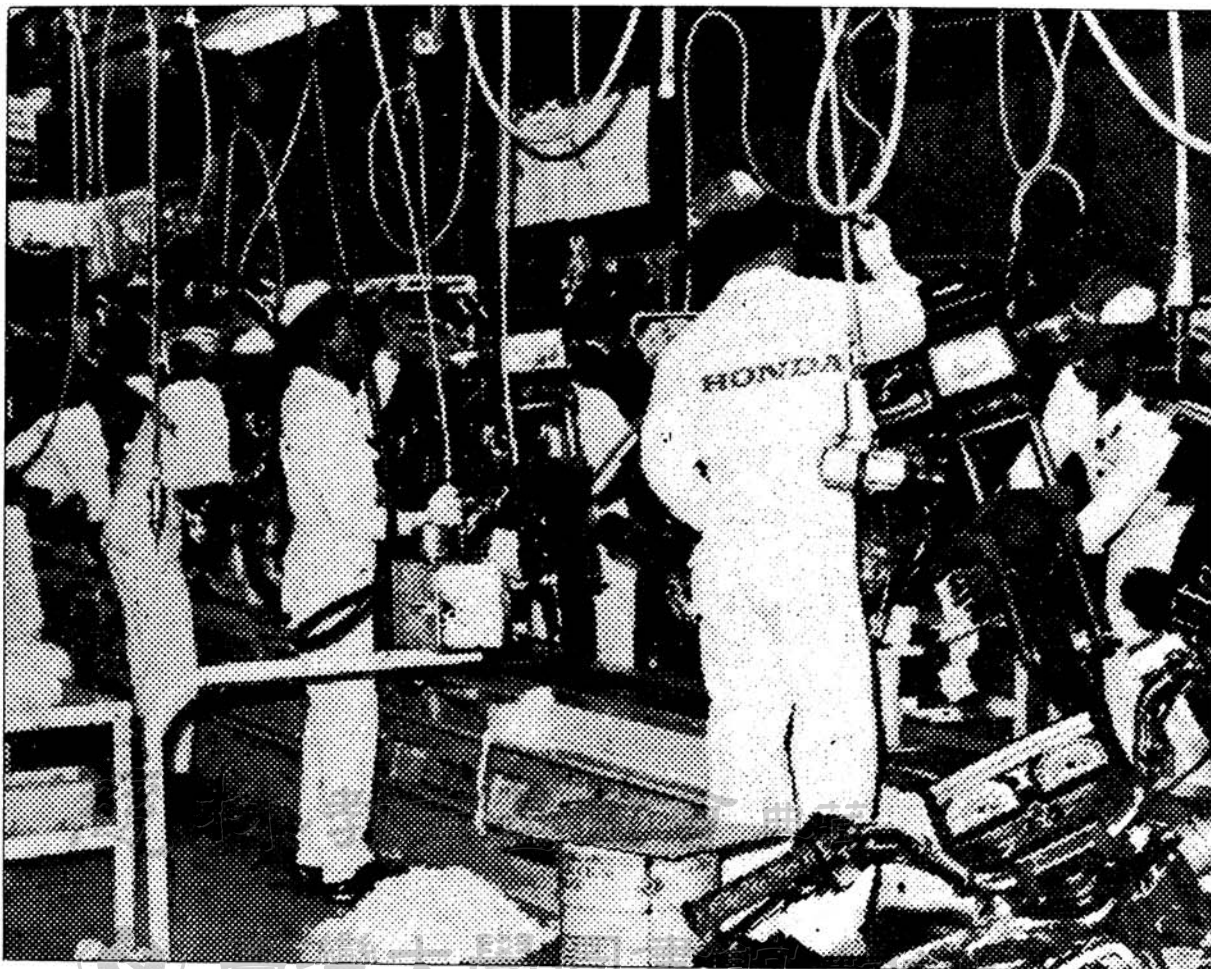
動，則更難脫干政之嫌。

可是，上述越俎代庖的怪現象，在今天香港論政人才輩出中，仍然如此。五月廿四日在紐約舉辦的「香港問題座談會」，還是愛港台人的獨腳戲。講者除了為此向台北進言，一位以美國名週刊為個人招徠的這種場合必然講者，則覆述他十年不變的話題：「新聞自由」。一些人自由、民主、人權不離口，可和底下似乎相符：隻手遮天有理且有利。

勘誤表

本刊上期

- P. 36 倒數 17 行第 15 字
“不”乃“示”字之誤。
- P. 80 第 20 行“也就……
自然條”接到第 34 行
“件惡劣
，……貧困”之一行。



◎勞工廣場◎

• 穿著日本光陽 HONDA 工業製服的印尼工人。

亞洲的跨國公司 與工會

■ David Kowalewski 著

■ 余宗理 譯

以美國為主的跨國公司，為確保低廉的勞力與亞洲第三世界的政府勾結，利用暴力、分化等手段打擊壓制工人，使工人無法組成強有力的工會。作者呼籲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對抗跨國公司龐大的組織力量。本文譯自「Labor Studies」，1987年冬季號。作者現在美國德州大學，教授國際與比較政治學。——編者



- 波帕爾化工公司的氯氣外洩，造成大量印度人民死亡，這也是跨國公司毒害第三世界的一例。

組織在在都與跨國公司對第三世界經濟的滲透特別有關係。結果，與跨國公司合作的各地政府，把國家生產導向跨國公司支配的全球市場。

本文細查跨國公司與第三世界亞洲國家工會衰微無力的關係。工會的無力是指工人無法進行聯絡、組織，而且工會在向跨國公司的老闆申訴、要求時，也無法代表工人行使集體爭議權。跨國公司在亞洲地區是否對工人組織工會有重大的不良影響？例如，跨國公司是否主動的想要藉著招募新工人、禁止工人互相訴苦、鼓勵工人間競爭，來防止工人組成工會？他們是否促請亞洲第三世界政府鎮壓有組織的工人勢力？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他們是透過什麼樣的干涉的機制，來使強有力的工會無法成立，或是喪失戰鬥性？

跨國公司的策略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跨國公司運用各種策略去防止亞洲的分公司組織工會。揚言撤資是跨國公司恐嚇亞洲政府和工人的有效手段。跨國公司常轉移投資地點，亞洲政府官員爲了不讓跨國公司轉投資至其他工資較低的國家，必須壓制工運，防止工資上漲。跨國公司常以撤資直接威脅工人，據馬來西亞的 Pasir Gudang 自由貿易區一位電子工廠中工人說：「我的工作大部分非常枯燥，在顯微鏡下焊接金線的費神工作，嚴重地影響了我的視力。然而，自從公司威脅說我們如果罷工要求加薪，或是要求醫療給付，他們就要撤資工資較低的國家。從此以後，我和同事就只好繼續忍受這種低工資、長工時的工作……，難道我就要每天對同一工作重覆作上千百次嗎？」

亞洲的跨國公司長期來也灌輸工人一些反工會的觀念。在香港，跨國公司非常反對初級

跨國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NCs) 對第三世界工人組織的影響，日益爲人關注。有些證據顯示，能有力的跨國公司工人運動，往往只是一些特例而非常態。一份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統計研究發現，外資與工運呈反比，跨國公司對拉丁美洲經濟滲透愈厲害，則該國的工運愈軟弱。其他的研究也發現，一個國家愈是以跨國公司的產品爲出口大宗，壓制工會也就愈厲害。第三世界工會的受壓制，及工會之被轉化爲政府與跨國公司聯手控制的

部門的工人加入工會（譯按：初級部門指生產工業原料，或簡單的成品。）有證據顯示，亞洲跨國公司的工人要組織工會，往往比當地本國公司中的工人要難。

跨國公司爲了阻止工人組成有力的工會，常採取一些迂迴策略。在成衣和紡織業中，跨國公司儘可能雇用柔順又沒有政治經驗的年青單身女性。根據全球女性工作組織的資料，女性的被雇用往往是因爲她們被認爲是最容易控制的工人。有位學者調查了七十家設在亞洲的跨國電子公司，發現女性的被雇用最普遍的原因是由於她們溫順。主持面試的公司主管敬謹遵守這個原則。一家美國跨國電子公司在亞洲的分公司，根據工人的「態度」來發放工作獎金。

跨國公司經常雇用「臨時」工人，來阻止工人組成有力的工會。菲律賓Bataan的加工出口區中，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工人是「非永久性」的雇員，因此不能成爲工會會員。

另一種反工會的策略是控制工人的行動。馬來西亞的自由貿易區中，警衛禁止工會組織者進入工廠。新加坡的Kallang Bahru工業區中，三百名泰國的移民工人，住在用籬笆和警衛隔離的特別區內的公寓。根據報導，Gurkhas族人（譯按：居住在印度、尼泊爾之好戰的印度教種族）被雇來擔任步哨的職務。工人只能搭乘跨國公司的專用巴士去上工。

“分而治之”軟化工運

分而治之也可阻止工人組織工會的運動。公司常禁止工人之間的聯繫。在新加坡，有些製造業的跨國公司禁止工人在工作期間交談。在香港，Fairchild公司安排工人飯廳中的座位緊鄰於自己的朋友，如此，他們才不會將不

滿擴及陌生的工人。

跨國公司利用種種競爭來分化勞工。工廠報紙鼓勵工人效忠資方，另一方面卻鼓勵工人之間競爭。一份對亞洲電子跨國公司的研究，發現不僅種種規定禁止工人之間交談，而且也利用生產業績比賽和選美比賽來分化工人。在馬來西亞的Penang自由貿易區的一個美國跨國公司中，女性員工競相參與選舉「自由貿易區小姐」；同樣地，在亞洲其他地區的跨國公司中，還有所謂「溫柔小姐」的比賽。

跨國公司也利用種族意識來分化工人，根據對亞洲七十家跨國公司的電子公司負責人所做的訪問，分化土著與中國工人，有利於控制工人。

跨國公司的工廠散居世界各地，各地工人相隔千里，也就無法組成跨國的工會。跨國公司各國工人語言，文化互異，難以聯繫，要聯合起來一致對抗跨國公司的世界各分廠，確乎極不可能。

跨國公司的聯盟

相形之下，跨國公司却廣交亞洲的政經權貴，狼狽爲奸，這在工會勢力高漲時，最爲明顯。馬來西亞Penang自由貿易區中，跨國公司集團聯合訂定薪資的標準，並拒絕雇用任何被公司解雇過的工運份子。在韓國的Swany加工區中，310個工人要求組織合法工會，幾家跨國公司便聯合起來向韓國的勞工事務部施壓，促其拒絕承認工會；跨國公司威脅，否則，他們將集體從韓國撤資。據設在菲律賓的成衣跨國公司中的350位工人說：積極參與組織工會的人被解雇，而且被其他跨國公司列入黑名單。大部份的人後來都無法在其他跨國公司中找到工作。



● 馬來西亞跨國公司礦產部門中辛苦工作的女工。

跨國公司同時也廣泛地與各級政府的官員（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區域性組織以及國際性組織）勾結，以阻止工會的成立。例如亞洲開發銀行提到「法律、秩序以及政治穩定」是「東南亞地區出口擴張的重要因素。」跨國公司也對亞洲的各政權施壓，促其壓制工會，有時甚至要求警察出動，逮捕工會積極份子，以阻止工會成立。Chase Manhattan 銀行借兩百二十萬美金給南韓政府，以發展它在南韓的業務，並要當時的總統朴正熙保證不會有罷工來干擾盈利。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馬來西亞的副總理 Datuk Seri 替一家英國跨國公司向工人喊話，他呼籲工人要「更盡責」，不要「嚇跑了」跨國公司。

美國與日本的跨國公司對南韓的勞工政策有極大的影響力。在一九七八年，沒有政府特許，就無法在跨國公司中組織工會。而那些特准成立的工會，必須加入由政府資助的韓國總工會。政府也強制「調解」跨國公司工廠中的勞動糾紛。一九八〇年在 Masan 的自由貿易區中，明文禁止組織工會。可能就是因為諸如此類的因素，韓國只有百分之十的跨國公司有工會。

根據對工人的調查，在菲律賓 Bataan 加工出口區中的跨國公司與政府的勞工部密切合作，以使工會萎弱不振。一九八二年七月，馬可仕總統宣布禁止工人在跨國公司電子區罷工。

在馬來西亞，政府官員同意限制工會組織，以確保適合跨國公司投資的穩定環境。在印尼，受調查的日本跨國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碰到工人組織工會相抗的問題。在斯里蘭卡 Kutunayake 自由貿易區中，工人就業前，都必須經過由傾跨國公司的執政黨所控制的「職業儲備所」的政治過濾。

跨國性工運的挫敗

報告顯示，事實上在每個亞洲國家的工業部門中，跨國公司一直在壓制工會的組成和成長。在跨國公司農業部門的耕地上，武裝的保安隊巡邏工人的住處，以監視他們的活動。菲律賓 Del Monte 的三角洲農地裡，沒有工人的組織。根據一項目擊的報告，當工人有意識地團結起來時，跨國公司也就展開一連串干擾的行動，以徹底地根除那些活躍份子。

「在一個月內，百分之三十的工人力量支持他們自己的工會組織，其他許多人持同情態度，但不敢簽署任何文件……，警衛把一名工會組織領導者抓起來，指控他擁有非法槍械。他辯稱槍枝是經理的，但警衛却在經理的一個暗號指示下，把他抓起來。他遭痛毆，頭縫了好幾針，最後被捆綁著吊起來，在太陽下好幾個小時，然後送到菲律賓警官隊監獄。……，投票在公司辦公室裡舉行，武裝警衛刻意圍站在投票區附近；有些工人指責警衛站在那裡，會看到工人投票給誰。有些農場工人放棄休假以配合選舉。警衛帶著被數人視為帶頭組織工會的人到辦公室，當場投票，然後又被送到監獄裡去。公司以極微小差距擊敗工人組織……，從此後沒有人敢再嘗試組織工會。一個女工說：『大家都變得害怕而沮喪。』」

在馬來西亞的 Sime Darby 公司不准農業部門勞工組織工會。在泰國的 Castle & Cooke 公司則利誘反工會的工人，以阻止工會成員增加。對於與跨國公司合作的工會領袖，則昇職、加薪。Stanfilco & Dolefil 跨國公司在菲律賓的子公司，雇有兩百名田地監督和一百名的安全警衛，用以恐嚇工人。在菲律賓內的 Sa-fcol 跨國公司水生養殖部門內，資方每天下午



兩點就召集檢閱工人，選出新的工作人員，這樣就能區別出工會積極份子，加以防制。

在製造業部門中，亞洲的自由貿易區常圍著高籬笆，這不僅用來保護跨國公司的財產，更是用來防止工會積極份子進入工廠。在自由貿易區內的工人，入廠前必須亮出特製的證件，並接受搜身檢查。如果工人堅持他們擁有合法組織權，那他們將被調到工廠中工作較困難的部門，最後終被解雇。菲律賓 Bataan 加工出口區中的工人被威嚇不准組織工會。在斯里蘭卡 kutuayake 自由貿易區裡，跨國公司極力阻止工人組織工會。泰國的 BIC 工廠中，想要組織工會的工人遇到無比的困難，女發起人以偷竊的罪名被關了兩天。根據她的支持者說，跨國公司勾結地方警察將她逮捕：

「警察不保護無自衛力量的無辜市民，反而和資方關係密切。偵訊過程中，警察拒絕聆聽工人訴說事情真象的證詞……警方無疑成了資方忠實的『工具』。」

利用工資差別，打擊工運

跨國公司雖然常需與地方政府聯合控制工

- 菲律賓跨國公司的汽車廠雇用柔順、無政治經驗的女性勞工。

人組織工會的行動，但有時候他們也採取直接的壓制行動。印尼通用食品公司的工人初次試圖組織工會期間，工人發現他們六百人之中有兩百人被解僱。即令工會最後仍組成了，但成員却發現他們的工資少於非工會的工人。卅四名工會成員要求工人不得任意被降職，却被關在工廠的一個沒有水、食物及休息設備的房間中一整天之久。雖然最後工會幹部向法院控告跨國公司，但這案子至今懸而未決；就在選舉之前，工會主席被停職。在菲律賓，通用汽車公司乾脆開除所有工會幹部。

在勞力密集的紡織與電子工業裡，跨國公司特別小心防止造成工資上漲的工會出現。在菲國成衣工廠中，當工會準備要成立，工人就遭到跨國公司報復、解僱和列入黑名單的威脅。根據日本成衣業跨國公司的副總裁 Jelenk 所說：「任何時候只要你高興，你可以解僱任何一個工人，因為這樣你才可以安心保證沒有任何罷工。工人階級根本沒有談判能力，所以你可以隨心所欲，達成目的。這種關係就像是射擊—永遠是單向的。」Gelmart 公司是美國的成衣業的跨國公司，他們將工人關在工廠的宿舍裡，以阻止工人參加工會會議。菲律賓擁有高壓強制性力量的團體都站在跨國公司這一邊，工人幹部常在菲國的警察部隊面前收到解僱的通知。

「我們不是水牛，我們是勞動者！」

相反地，當成衣工人有時能籌組戰鬥性的工會時，情況會改觀。在菲國的黛安芬女用成衣工廠中，資方不再能因生產沒有達到配額而解僱工人。工人宣稱：「我們是一個戰鬥性的工會。」「我們不是水牛—我們是勞動者。」然而，工人為了獲得在黛安芬工廠中的勝利，

● 韓國跨國公司電子廠中女工。



也付出了心理上的代價。一九八〇年，工人常被密切地監視，「我們常被領班監視，禁止我們交談。」若是抱怨經常遭到解僱的威脅。

一般都認為電子工業業者之間競爭很激烈，但跨國公司在開除工會幹部，並列入黑名單這件事上，却是合作無間的。在斯里蘭卡自由貿易區工作的女工，經常為了組織工會而被解僱。報告顯示加拿大在馬來西亞的跨國公司開除了工會幹部和會員。在南韓的 Motorola & Radio Shack 公司裡，工人不准組織工會。在印尼，Fairchild 公司開除工會的積極份子。根據一項調查報告，在菲國的 Intel 公司中，「工會恐懼症」瀰漫在整個工廠。據品質管制部經理的說法：「保證這兒沒有工會。」跨國公司威脅工人不准加入工會，否則一律開除。倒是有兩個「反工會」團體在工人間組成。其中一個團體努力說服工人，讓他們相信組織工會對他們不利。另一個團體則偵察工會組織，負責將他們的名單告知資方。在 Soltron 公司，一名工人嘗試組織工會却備受干擾、降職，在跨國公司和政府的合作下，捏造假罪名，地方警察將他送入監獄數天。在 Timex 公司的工人嘗試組織工會時遭到解僱、監視、電話竊聽以及臨時通知加班，以防止工會開會。

在重工業和觀光事業中，勞工也同樣面臨跨國公司以種種手段阻止組織工會。在印尼，Caltex 公司（德州和加州的標準石油公司）透過與非工會雇員轉包承攬的手段，來預防強大工會的組成。在碳化物工廠中，工會領袖由於不滿危險的工作環境而被開除。在菲律賓，觀光事業的跨國公司中罷工也是被禁止的，因為觀光事業被稱為「生命工業」。馬尼拉的 Ramada 客棧拒絕承認工人的工會，以莫須有的藉口將工人領袖解僱或調職。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退出工會，他們會被升職。工會幹部被拒絕進入在旅館大樓中的辦公室。在泰國富豪（Volvo）汽車廠，一位名叫 Kampun Wongkham 的工運領袖在一九八〇年被公司解僱；不久之後，他被人槍擊死在街上，據稱此一血案乃是政府保安隊所幹的。

御用工會

跨國公司當他們在亞洲面對既存的工會勢力時，經常運用他們可觀的全球性資源，並與政府勾結，進而排除任何造成損害的勞資爭議。遭削弱後新選出的工會，或所謂的御用工會，在整個亞洲地區的跨國公司中頗為常見。在新加坡的跨國公司，工人對於工會的興趣不高。對亞洲地區跨國公司的調查中，一位跨國公司的新加坡經理宣稱：「工會領袖瞭解我們，而且非常合作。」七〇年代中期，工人和聲援的學生嘗試說服新加坡的「先鋒工業雇員工會」強迫美國海軍再雇用被裁員的工人，積極參與者就被鎮壓下來。其中一名學生被迫潛入地下活動，而另三名學生領袖被新加坡政府驅逐出境。一位名叫秦茱麗的年青馬來西亞籍學生，她是新加坡學生聯盟的活躍份子，她安排在庭上作證，却在一大早被新加坡警察逮捕而解

• 菲律賓的前獨裁者馬可仕，打擊工運不餘遺力。



送回馬來西亞，一上岸立刻被馬來西亞警方逮捕，沒有按國安法審判就把她下獄。一個學生和兩名工人以「暴動」之名被審—宣稱他們破壞了工會辦公室中的家具。然而，其他工人作證指稱三名被告當時遠在辦公室之外，傢俱實際上是工會幹部自己破壞的。一份美國友好服務協會所作的調查發現，工人都認為被告是被設計陷害的，目的在防止學生與工人的聯合，並減少大眾對跨國公司的批評。甚至連一位在新加坡大銀行裡的中國分行經理也同意被告是冤枉的。然而學生和工人還是被判坐牢，御用工會當然也不會對美國海軍當局作任何抗議。

台灣內政部操縱工會選舉

在台灣，許多跨國公司裡也有這種御用工會。工會理事長常由內政部私下指派。台灣工會的選舉經常舞弊，工廠的雇主本身通常也是工會的代。在香港的 Fairchild，經過一九七九年罷工之後，跨國公司組成一個「聯合審議委員會」，透過對工會活躍份子的改選，以瓦解一切強硬的要求。南韓的跨國公司也利用相同的手段，根據調查工人指出他們的工會都是傾向資方的。在南韓的 Mattel，工人被迫加入跨國公司中的御用工會。工會的幹部由雇主挑選，工會可不作任何說明，直接從工人薪資中扣除所謂的「會費」。因此當工會拒絕為工人爭取更高的薪資後，有一千個工人抵制工會的活動。

根據一九八〇年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泰國清邁的一個美、泰合作投機事業中，工會是由資方指定人員負責，工會沒有什麼權力。在印尼 Fairchild 的工會也與資方合作，形成「勞資聯盟」。當工人真正屬於自己的工會，跨國公司便要求解散工會並威脅它的活躍份子，

在印尼的澳洲跨國公司經常沒有工會。就是有工會也是用來控制工人的，據稱為澳洲的三家跨國公司成立了以公司為主的工會，政府官員常被安插在工會組織中。一份報做了以下的結論，通常，工會顯示其「缺乏戰鬥性、無力掙脫政府或資方的控制而獨立」，使得「工會活動和勞工法令並沒有給大多數公司帶來大的問題」。

根據 Castle 和 Cooke 鳳梨工廠的工人的說詞，在菲律賓跨國公司經常改選工會領袖。據一位在 Stanfilco 農場中的受訪工人說，「我每個月付六個披索給工會，但他們為我們做

• 跨國公司水產部門女工。





● 印度總統蘇哈托與跨國公司勾結。

了什麼呢？……工人對工會都非常不滿。」工會拒絕為工人辯護。有太多的理由，讓工人認為工會是逢迎拍馬的。可能是相同的理由，Castle 和 Cooke 的 Dolefil 附屬工廠經理 Richard Wolford 就非常滿意工人的組織，「工會領袖非常的負責，我很高興跟他一起共事。」在菲律賓 Del Monte 的農場，工會幹部由跨國公司所控制。在 Atlas 聯合採礦發展公司中，工人告訴調查員「工人聯合工會」致力於壓低工資，每個月還向跨國公司領取津貼。這個工會經常從各個和跨國公司聯合的政府單位處獲得補貼，例如美國國際發展組織、美國國務院亞洲勞工小組。在菲國的宿霧 (Cebu)，在一次引起爭議的工會選舉後，工人以罷工為要脅手段的行動立刻遭到地方武裝警力的鎮壓。另外，菲律賓的 Mattel 工會從未與資方作有實質意義的談判，也從來沒有威脅要舉行罷工。工會第一任的理事長最後被跨國公司雇用納入資方代表。在「尖端形式」胸罩工廠裡，工會是由跨國公司所把持，十八位「不聽話」的工人被革職，另一由工人控制的工會的領袖受到干擾、解雇。據報導 Dynetics 也有御用工會。當工人要籌組真正屬於自己的工會時，跨國公司開除了八名活躍份子，並推薦現有的御用工會。在菲律賓的 Interfashion 一家西德跨國公司裡，工人召開成立工會的選舉，結果工人獲得了超法定票數 20% 的得票。資方却立刻又組織另一個工會來對抗，並要求員工簽名，但遭到工人的拒絕。最後資方將一份工人簽名支持原有工會的名單交給勞工部，

展開一連串干擾工人的行動。參加真正工會的工人被迫自動辭職，因為公司宣稱「原料短缺」並給付遣散金。在一個勞工代表團赴勞工部請願以後，次日，二七四名工人被公司以「嚴重不法行為」為由，拒絕他們進入工廠，以報復他們的請願。工會的會員控訴說：「這樣的慘境究竟還要延續多久？我們實在不知道。……我們僅知道我們的家人不能再長久地飢餓下去……我們僅知道我們渴望正義。」因此，即使跨國公司的工會組織能夠運作起來，但其效力還是相當可疑。鎮壓工會、改選工會領袖保障了跨國公司及其官方盟友的龐大利益，而工人則僅沾到一點殘湯剩水罷了。大不相同的是，強大而獨立的工會得以存活之時，工人能得到的利益就大得多了。

串連

證據顯示在許多的案例中，跨國公司或個別或集體地，經常得政府各級官員之助，積極打擊工人組織。當工人偶而組成了工會，跨國公司就施加強制的手段或滲透改組領導者使其癱瘓無力。結果，亞洲跨國公司工人常發現他們的福利與自由每況愈下，而跨國公司却獲取了高額的利潤。無組織的跨國公司工人一般必須面對官商聯手組成的高度組織化的勢力，這種在組織力量上的不平衡，又強有力地瓦解了工會的形成及其強度。

當然在亞洲的跨國公司工人所面臨的組織上的障礙，和第一世界〔指美國及西歐（除西、葡之外）一譯註〕的工人在工業化初期時的遭遇有幾分相似。然而這種「演化」的觀點不論在解釋跨國公司反工運的行動上多有價值，但却不能正確地指出今天第三世界中，跨國公司工人何以特別軟弱無力？第一，現代跨國公

司具有高度流動性，他們威脅要撤資轉到較無工會活動的地方時；工人就必須認真考慮；第二，現代跨國公司向全球擴展，造成企業部門中所有工人都難以組織起來，更遑論工業部門了；第三，今天低度發展國家中的勞工，可供動員起來以爭取所需的政治空間小得可憐。當類如蘇哈托（印尼總統）或馬可仕的獨裁者警告工人不得動搖國本一跨國公司時，這類威嚇事實上是攸關工人生死的大事。最後，現代的跨國公司運用改選工會幹部，以及給予象徵性的報酬，來瓦解強大的工會，這些伎倆遠較過去的企業高明。證據雖顯示，有些工人確實可以看穿這些複雜精巧的經營騙局，但大部份的工人却無法看透。

總之，上述的案例並不只要證實在第三世界中，跨國公司的投資與第三世界工人運動的衰微不振有關係；同時也要指出許多相互勾結的機制，如何阻止這個關係的改變。看起來，只有在跨國公司工人擁有與他們的敵人同樣堅實的國際經濟組織和政治權力時，工人才能獲得並保障他們的福利與自由。

但是現在呢？在此國際經濟衰退的時刻，要談一個有力的全球工會聯盟，反制跨國公司的全球工廠，不是天真，就是言之過早。但這篇分析却提出了要改善目前的處境，可以先做些什麼。

正因為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在爭取他們的結社權時所能運用的物質資源與民主空間，遠遠不如第一世界的工人。因此，大部份的責任便落在工業化國家中的工會以及同情者的肩上。這者，這一反剝削的努力必須有國際的視野，兼及政治與經濟的範圍。爲了要與跨國公司的跨國組織旗鼓相當並支援被圍剿的工人，在政治、權力的各個階層結合成跨

國的聯繫，似乎是必要的。

當下，第一世界的工會應該採取下列政策：

1. 成立第三世界的「兄弟支部」。
2. 工業化國家的母公司中的工人，以及第三世界的子公司內的工人，應予資助，做雙向的交流。
3. 對御用工會加以調查並公布於世。
4. 團結起來怠工和罷工。
5. 設立特別的基金，做爲工會被鎮壓時的緊急援助。
6. 和跨國的教會團體、學術機構以及消費者組織結成連盟，以便蒐集資訊、宣傳，以及股東的提案。

就長期而言，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可以力促國內政黨列上有利於第三世界跨國公司工人的政綱。工會的策略還可以包括以下對跨國公司、和他們勾結的政權的限制和懲罰：

1. 停止在國外的稅務信用帳款。
2. 取消外國直接投資的保障。
3. 斷絕對壓制跨國公司工會政權的外援。
4. 嚴格禁止個人或團體賄賂第三世界的政權。
5. 禁止輸入鎮壓罷工的第三世界子公司的貨品。
6. 禁止跨國公司雇用或出賣股份給第三世界卸任或現任的政府官員。

在區域性和國際性的層次上，工業化經濟中的工會，可以努力強化國際勞工組織，與國際和區域性開發銀行，並取得更多的影響力。他們尤其可以力促實施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制定的指導原則，並力促以此原則監督跨國公司。用這些方法，或許第三世界跨國公司工人的組織力量，有可能和他們的雇主匹敵。

◎勞工廣場◎

加工出口區抑或 “加害”勞“工” 出口區？

■姚國建

台灣的加工出口區吸納了農村廣大的年青勞動力，其中尤以女工為多，台灣女工有如下的特質：

(一)女工原本大多在家務農，對物質的追求慾望不是很強。

(二)傳統道德使女子成為體制下的犧牲者，幾乎對外在壓力沒有任何抗拒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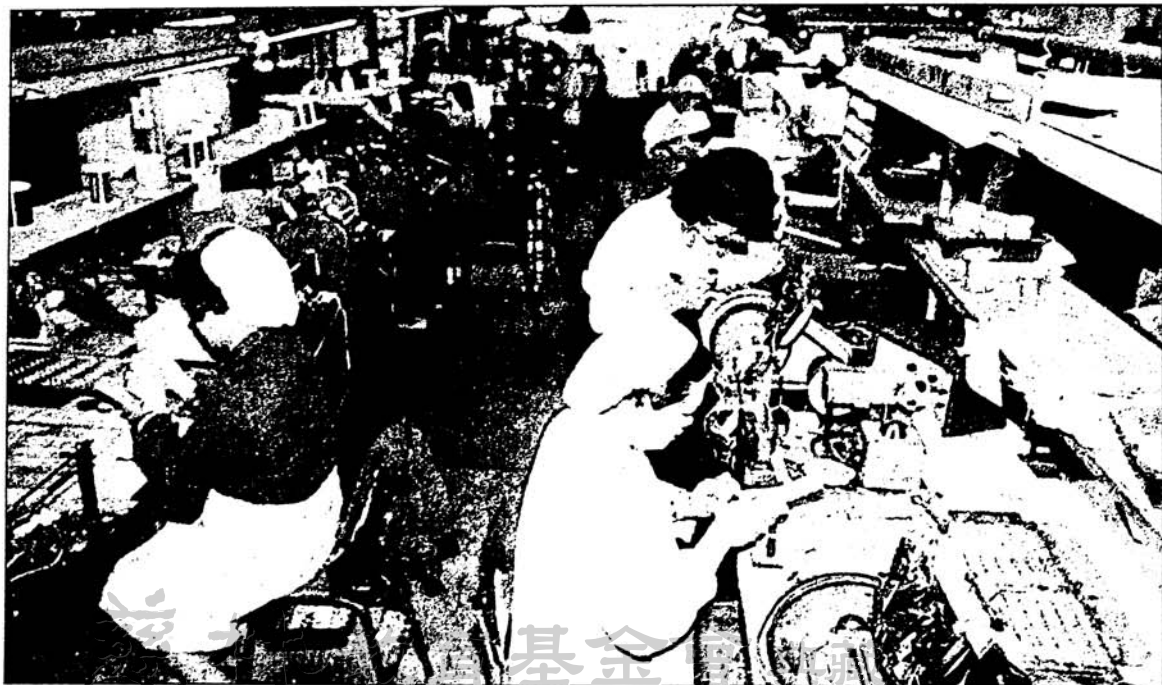
(三)女子做工只是為了儲存嫁粧，或貼補家用，故抱着過客心理，在工廠做工，隨遇而安，不講求工作環境的品質。

低工資、性格柔順、有刻苦精神，這些是任何資本家所夢寐以求的勞工，也因此，台灣各加工出口區歷年皆被評鑑為優良或特優單位。台灣勞工在層層壓抑下，對自己的權益鮮有所知，雖在資方一再的壓迫下，卻鮮少見到勞方能有效反擊。

加工出口區的廠商多由外國人投資設廠，其中美國、日本廠商佔大多數，按理說，美、日有較完整的勞工

制度，對於勞工的權益應該較重視，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在台灣的加工出口區中，壓迫勞工最力者，首推美、日廠商。滿嘴仁義道德的資本家，在壓榨能為自己帶來財富的勞工時，卻是一副窮凶惡極的嘴臉。平日高談人權、民主的美日兩國，在榨取經濟利益時，帝國主義侵略的獨霸心態便一洩無餘，這在美、日外商身上最是明顯。更可鄙的是，有些國人為虎作倀，幫着外商榨取同胞的血汗。而政府則偏袒外商、縱容其違法獲得不當的利益。此種現象普遍見於新竹工業園區等五個直屬經濟部的特區中。

早期的勞工事務由於事權不統一，故而問題重重，自從勞基法訂立之後，勞工事務統由內政部勞工司以及省、市社會局、勞工科等相關單位主管，唯獨加工出口區卻依據經濟部頒訂的「加工出口區管理辦法」由經濟部管理，導致加工區的勞工權益受損之際，常不知應向何單位申訴。據加



● 出口加工區中大量被壓迫的女工。

工出口區管理處的解釋，他們也有一個勞工科。不過這個勞工科對於出口區的勞工有多大的幫助，我們由歷年來它為勞工服務、解決勞資爭議的成績，即可見分曉。

外商違法，官方不罰

例如：楠梓加工出口區內的「有力電子公司」，違反勞基法規定——「勞工每週工作時數四十八小時」，長達兩年。此事雖經經濟部及出口區管理處等主管單位查證屬實，累積罰金近兩百萬元，積欠的加班費更不知凡幾，然而該公司卻我行我素，置之不理，截至目前為止，還看不出有何單位能拿出具體的辦法。外國廠商由經濟部統籌管理，而加工區管理處的勞工科只不過是個職低權小的單位。這個小單位在上級龐大的壓力下，自

然難以發揮功能。經濟部站在鼓勵外商投資設廠的立場，自然偏袒資方，要一個偏袒資本家的單位「體恤」在資本家剝削下的勞工無異是緣木求魚。近年來美國指控台灣當局壓榨勞工以降低生產成本，與美國進行不公平的貿易競爭，可是加工出口區的外商中，美國人佔大多數，他們苛待台灣勞工，甚至出現以“發覺你不快樂”為由而任意調動勞工的。看來，壓迫勞工最力者首推美方，台灣的資本家不過是學徒。

隨著時代的進步，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勞工人權意識抬頭，這種以出賣勞工人權換取經濟發展的政策將漸不可行。我們盼望政府不要再處處遷就加工區的外商。拿出魄力解決加工出口區的問題。

◎文化批判◎

期待台灣電影長大

——對電影「期待你長大」 的一些觀察

■李荒原

由剪接出身的廖慶松所執導的第一部影片「期待你長大」，在台灣電影市場的淡季中一暑假之前的五月及六月一推出，雖然一般的評價只是平平而已，卻在票房上，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令人難以置信。這個例子，與去年柯一正執導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頗為相似：兩個片子都是國民黨所經營的「中影」公司出資拍攝、發行的。兩者都在這段淡季時推出，同時這兩部片子在影評人眼中，都有相當的瑕疵，卻意外的頗為賣座。如果還有相似的特徵，就是這兩部片子都可以歸類為「新電影」；在一些重要的層面上，誠實的觸及了台灣的現實，並在對劇情的敘述上，以有意的淡化情緒的手法來處理一些感情戲，擺脫了以操弄觀眾情緒為導向的台灣主流娛樂片的僵化格式。

「中影」注重行銷策略

就電影賣座的因素來分析，「期待你長大」的行銷策略是頗值得一提的。以中影這個老化保守的半官僚機構，能在八十年代成為台灣本土電影工業的巨人，不只成為「新電影」的搖籃，發掘了新導演，影響了台灣的電影文化，而且在企業組織的擴大、營業收入的成長及利潤的回收都有非常漂亮的成績，這種轉變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其財務來源的穩定，在資本集中的競爭過程中處於不敗之地，另一方面則又

與台灣較優秀的電影工作人員先後在這段期間內為中影吸收有關。這些電影工作人員，在幕後從事企劃工作，與「老人」最大的不同，是深具行銷意識，在實際作業上也勇於嚐試創造市場優位的行銷策略。他們由於年青，所以熟諳日漸年青化的台灣電影市場。從影片內容的差異化開始，到廣告促銷，都有相當的考慮及計劃。像「期待你長大」的拍攝，就是趕在端午節這個冷門檔推出，一方面減少硬碰硬的競爭，另一方面又利於在一片疲弱的局面下，製造強片的態勢，佔取競爭的優勢。另外，在片名上亦字字斟酌，將原來的片名「來不及長大」，改為「期待你長大」，以去除悲觀的聯想（雖然內容在實際上是令人悲傷的），這種情況有如去年將原名「同學會」我為「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具有相似的行銷考慮，亦即在品牌命名上，突顯產品的獨特形象。在廣告上，由於電影的「產品生命週期」頗為短暫，便更具關鍵性功能。為了沖淡片中死亡的不祥氣氛，「中影」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出現的廣告，都極力避免一般電影廣告中的「精彩片段法」，而改採「推薦法」及「障眼法」。前者強調侯孝賢及萬仁兩位導演的推薦，有如對「戀戀風塵」的作法，引述了影評人的評語以為推薦。後者則以一段在影片中從未出現的童星對白來暗示影片的天真幽默。



「期」片塑造了台灣社會已中產化的假象

類似這樣的行銷手法，如果沒有相當實質的產品以為後盾，難免不被消費者（觀眾）所察覺，而引起反感，終而喪失信心，將之唾棄。「期待你長大」的實質，並不在於「戲」的濃厚，相反的，卻是「戲」的淡泊。廖慶松以較為客觀的敘事觀點，對於一個中產家庭內的悲劇，做了幾近記錄片的呈現。尤其是影片後半部，冷靜的記錄著患著血癌的女童逐步走向死亡的過程，一反過去國片在類似題材上，煽情的處理，可以說是「期」片最為突出的地方。這種「逼實」的處理手法將子女死亡對父母的打擊，毫無留情而具體的表現在銀幕之上，不能說沒有扣人心弦的強烈震撼效果。如果說父母的倏然而逝是傳統社會的極大哀慟的話，「期」片所展現的子女早夭，則是現代台灣新

- 「期」片的廣告海報，以最近流行的兒童電影的外貌，來做為吸引觀眾的包裝。

興中產階級最為恐怖的夢魘了。也就是扣準了這種現代都市小家庭的隱憂，「期」片可以在空洞的劇情結構上引發出觀眾豐富的情緒反應。子女成為現代小家庭生活的重心，成為年青父母事業成就的動力泉源，正是本地一些學者以儒家倫理來解釋台灣過去這二十年來的經濟成就的論點。亦即台灣的經濟奇蹟除了客觀因素的配合外，主觀的動機因素亦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男人拼命的工作賺錢，隱含的目的是讓妻小吃得好穿得好。這種源自儒家的倫理觀在傳統社會是表現在光宗耀祖，在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後，大家庭制分解成小家庭制，父母的地位轉由子女所取代，子女的幸福成為努力賺錢的最終意義所在，子女的成长成為父母安身立命的支柱。子女對家庭的重要性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裕愈顯增加，這種微妙的變化正是「期」片所描述的故事背景，也構成了它的實質部份。

「期待你長大」在這個時候出現，一方面可以理解為中影公司在營利目標及社教目標之間尋求平衡的表現。在「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的認識下，中影公司對自身角色的調整、對新環境的適應所展現的彈性，是其他獨立民營公司所望塵莫及的。可以預見的是，台灣的電影工業如果沒有民間財團的投入，「中影」仍將佔領主導的位置，從而支配了台灣電影文化的走向，扼殺了蓬勃的多樣化發展。另一方面，「期」片的出現也可以理解為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在映象媒體的過度膨脹，形成一個台灣社會已達中產化的假象。中影有意識的發展這個路綫，台灣電影在過去幾年裏所見到的活力，勢將銷聲匿跡，台灣電影的成熟，也只能做無望的期待。

◎文 藝◎

七十年代

大陸新詩選析 (上)

■高準

七十年代的大陸詩壇，是一個從瀕臨絕滅的邊緣經過突破而躍向再度繁盛的過程。在開始三年，延續着六十年代末期，是文革鎮壓最嚴酷的時候，根本沒有任何文化性刊物，知識份子也盡遭打入「牛棚」，全「國」找不到一首詩。在一九七三至七六年，稍有一些刊物上刊出一些詩，但所刊也可說全是四人幫的教條口號式的作品。這七年間有一些詩人在極端艱困的環境下私下偷偷寫了一些表露心聲的作品，都是到四人幫打倒後又過一、兩年才發表出來。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抗暴事件，開始對整個局面有了突破，其時出現的大量「詩傳單」中自不無佳作，但基本都是舊體或民歌體的篇章，新詩尚未復甦。這可能也說明一首好的新詩之完成要比舊體來得困難。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式可循，須要較費時間的經營而難於「出口成章」。

四人幫打倒後，七七至七八年，是新詩開始復甦的年份，但還是比較單調。而隨著七八年底青年民主運動的掀起，到一九七九年及隨後的一九八〇年，新生代才華煥發的詩人突然成批的綻現了出來，構成了一段佳作如林、風格多樣的繁盛局面。大陸的詩壇，在經歷了一九六五年以來長期的凋零之後，到這七十年代的最後一年，終於再度展現了令人振奮的新生光芒。

(一) 綠原

綠原（一九二二—）是成名於四十年代的老詩人，本名劉仁甫，湖北黃陂縣人。其生平已述於四十年代新詩選析中（見〔東亞季刊〕十七卷三期）。他於一九五五年起即因「胡風案」而遭長期鎮壓，文革期間，更被打入「牛棚」，遭受非人待遇的勞改。但他生命力還相當堅強，並沒有被壓扁，而且還偷偷寫下了一些詩篇，這首《重讀〈聖經〉》——「牛棚」詩抄第n篇即為其中之一，作於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發表出來。

《詩選》

重讀《聖經》

——“牛棚”詩抄第八篇

兒時我認識一位基督徒，
他送給我一本小小的“福音”，
勸我用剛認識的生字讀它：
讀着讀着，可以望見天堂的門。

青年時期又認識一位詩人，
他業頭擺着一部厚厚的《聖經》，
說是裏面沒有一點科學道理，

但確不乏文學藝術最好的味精。

我一生不相信任何宗教，
也不擅長有滋味的詩文。
慚愧從沒認真讀過一遍，
儘管趕時髦，手頭也有一本。

不幸“賈索狂文昌”：又一次沈淪，
沈淪，沈淪到了人生的底層。
所有書稿一股腦兒被查抄，
單漏下那本異端的《聖經》。

常常是夜深人靜，倍感淒清，
輾轉反側，好夢難成，
於是披衣下床，攤開禁書，
點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盞油燈。

不是對譬喻和詞藻有所偏好，
也不是要把命運的奧秘探尋，
純粹是為了排遣愁緒：一下子
忘乎所以，彷彿變成了但丁。

裏面見不到什麼靈光和奇蹟，
只見蠕動着一個個的活人。
論世道，和我們的今天幾乎相仿，
論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們。

我敬重為人民立法的摩西，
我更欽佩推倒神殿的沙遜：
一個引領受難的同胞出了埃及，
一個赤手空拳，與敵人同歸於盡。

但不懂為什麼丹尼爾竟能
單憑信仰在獅穴中走出走進；
還有那彩衣斑斕的約瑟夫
被兄弟出賣後又交上了好運。

大衛血戰到底，仍然充滿人性。
《詩篇》的作者不愧是人中之鷹；
所羅門畢竟比常人聰明，
可惜到頭來難免老年痴呆症。

但我更愛赤腳的拿撒勒人：
他憂鬱，他悲傷，他有顆赤子之心；
他撫慰，他援助一切流淚者，
他寬恕，他拯救一切痛苦的靈魂。

他明明是個可愛的傻瓜，
幻想移民天國，好讓人人平等。
他卻從來只以“人之子”自居，
是後人把他捧上了半天雲。

可誰記得那個千古的啞謎，
他臨刑前一句低沈的呻吟：
“我的主啊，你為什麼拋棄了我？
為什麼對我的祈禱充耳不聞？”

我還向馬麗亞·馬格黛蓮致敬：
她誤落風塵，心比鑽石更堅貞，
她用眼淚為耶穌洗過腳，
她恨不能代替恩人去受刑。

我當然佩服羅馬總督彼拉多：
儘管他嘲笑“真理幾文錢一斤？”
儘管他不得已才處決了耶穌，
他卻敢於宣布“他是無罪的人！”

我甚至同情那倒楣的猶大：
須知他向長老退還了三十兩血銀，
最後還勇於悄悄自縊以謝天下，
只因他愧對十字架的巨大陰影……

讀着讀着，我再也讀不下去，
再讀便會進一步墮入迷津……
且看淡月疏星，且聽雞鳴荒村，
我不禁浮想聯翩，惘然期待着黎明……

今天，耶穌不止釘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決不會為耶穌講情，
今天，馬麗亞·馬格黛蓮注定永遠蒙羞，
今天，猶大決不會想到自盡。

這時“牛棚”萬籟俱寂，
四周起伏着難友們的鼾聲。
桌上是寫不完的檢查和交代，
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鬥爭。

“到了這裏一切希望都要放棄。”
無論如何，人貴有一點精神。
我始終信奉無神論：
對我開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1970) ——《芳草》第9期
(選自《1980新詩年編》)

《作品簡說》

綠原從一九五五年被鎮壓後，長期毫無音訊，一度傳言他早已去世，但他早年的詩却並沒有被人遺忘。五十年代初期台灣的楊喚，其詩風即頗襲自綠原。後來綠原的名字像傳奇人物般的流傳在台灣詩壇，都說他的詩好，却又見不到他的詩集。一九七五年香港出的尹肇池等編《中國新詩選——從五四運動到抗戰勝利》中選入了他的早年作品，而仍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到八〇年他重獲「解放」後，大家才知道他尚在世。

這首《重讀「聖經」——「牛棚」詩抄第n篇》，在他被迫放下詩筆十五年後偷偷寫下的作品，却正是一首歷史見證性的佳構。它寫的雖是文革時期被打入牛棚的遭遇，實在却也是中共建政後歷次運

動中被鎮壓的一切人的遭遇的總寫照。

在牛棚中他幸運還在手頭保持了一本《聖經》，在排遣愁緒中重讀《聖經》裡的故事，他發現其中那些壓迫人的惡人竟都還比他當前的壓迫者要可愛些。他深切的感到耶穌是以怎樣的寬恕的心去「撫慰、援助一些流淚者」，因為在當時大陸的社會已不知道什麼叫寬恕與撫慰。他「敬重為人民立法的摩西」，因為那正是一個沒有法制的社會。他「更欽佩推倒神殿的沙遜」，因為他的社會中正是以一座嚇人的「神殿」鎮壓着人民。他更發現書中無論是被嘲笑的妓女、殺耶穌的羅馬總督、或出賣耶穌的猶太，也都還比他社會中那些壓迫者要來得有良心。而在他的社會中，不但壓迫者恣意入人於罪、殘酷折磨處決，一般人與人之間亦更相互出賣而毫無愧作。每天是「寫不完的檢查和交代」、「搞不完的批判和鬥爭」。這就是一度吹得鎮天價響的文革時期的社會真象。當然，事實上，早在文革開始前，從綠原自己開始被鎮壓的一九五五年中起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宣告文革正式結束止，這種情況都沒有斷過。

這詩的另一項引人注意之處是在以往中共長期排斥宗教的情況下，首先以《聖經》為題材而作了讚賞性表現。這可能也是自一九五〇—八〇的三十年間第一首對宗教經典表示了讚賞之意的詩作。全詩二十段八十行一氣呵成，內容堅實，氣概沉着，音韻朗朗。與他早年作品的天真活潑構成了對比。

(二)李瑛



李瑛（一九二六一）是部隊詩人，河北豐潤縣人。他的生平已述於六十年代新詩選析中（見《兩岸》詩刊第二集及第三集）。李瑛生平作詩雖多，值得注目的却並不多，這首《是什麼閃爍在草上》可能是他最值得注目的詩之一，作於一九七三年。
《詩選》

是什麼閃爍在草上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我邊防部隊在吳八老島進行正常巡邏，蘇聯軍隊竟悍然對我瘋狂射擊，戰士任久林同志英勇犧牲。附近鄂倫春族獵民聞訊，連夜趕至，躍馬揮槍，呼嘯復仇。

是什麼閃爍在草上？
是什麼發出耀眼的光？
是我們戰士沸騰的血——
灑在黑龍江邊，化作鮮花怒放！

任敵人的彈雨織成火網，
任敵人的硝煙掠過胸膛，
他保衛祖國的誓言吶，
在千山萬水間發出回響。
如同我們對祖國的愛，
請看他的生命何等堅強：
即使倒下，也抱着祖國，
即使倒下，也緊握刀槍！

是什麼閃爍在草上？
是什麼發出耀眼的光？
是鄂倫春獵民憤怒的淚滴——
燃燒着夜的邊疆！

像團團滾動的火，
匹匹馬直奔向烈士身旁；

他們眼中有十分悲切、十分驕傲，
更有十二分憤怒，激盪胸膛：
“讓我們再看一眼我們的兒子，
鄂倫春要跨馬去討還血賬！”
聽他們舉槍迎風呼喊，
像火山，像炸雷，在深山轟響。

是什麼閃爍在草上？
是什麼發出耀眼的光？
是我們威嚴的刀槍——
在巡邏神聖的邊防！

當星飛月暗，江潮低隱，
烈士的喊聲便把我們的刀鋒震響；
是的，讓我們保衛我們至高無上的事業，
用滾燙的子彈，滾燙的胸膛，
我們的山才有脈搏，水才有呼吸，
春天才會有色彩、生命和希望。
那閃爍在草上的耀眼的光，
正激勵着我們的人民成長！

1973.7.21 於十八站

（選自《李瑛詩選》，一九八一，成都）

《作品簡說》

李瑛長期生活在部隊中，文革時沒受到什麼麻煩。所以在文革期間他也繼續寫了不少詩。這首《是什麼閃爍在草上》作於一九七三年而追寫一九六九年的事。從詩的小序中，已可很清楚的瞭解其題旨，那是寫一九六九年蘇俄突然襲擊東北邊境而駐軍及居民展開了英勇抵抗的事跡。這可能是大陸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唯一的一首以抗俄為題材的詩篇，不能不使它具有了獨特的地位。

全詩氣勢軒昂，正氣磅礴，以響亮的音節、堅定的志節，緊湊而多彩的詞句，歌頌着保衛祖國，

抵抗蘇俄入侵。高度的發揚了愛國主義精神。是一首動人心魄的戰歌。「即使倒下，也抱着祖國／即使倒下，也緊握刀槍！」正是作為一個戰士詩人所能寫出的最嘹亮高貴的語言。在七十年代前期黑沉沉的大陸詩壇，由李瑛的這一首詩，却不期然的奏出了一道閃亮的強音。

(三) 蔡其矯



蔡其矯（一九一八一），福建晉江縣人。幼年隨家庭僑居印尼泗水。十一歲回國，先後在廈門、泉州、上海讀小學和中學。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暨南大學附中讀書時曾參加學生愛國運動，開始寫反映抗日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轉到延安進入「魯藝」文學系。次年，到晉察冀邊區，當過教員、記者和編輯。一九四一年，他以《鄉土》和《哀葬》兩首詩分別獲得了晉察冀邊區詩歌第一獎和第二獎。受到矚目。

一九四八年起，從事國內外政治社會研究工作數年。到一九五三年，在北京文學講習所任教，繼出任該所教研室主任。一九五六年，出版了詩集《回聲集》和《回聲續集》。次年，又出版《潑聲集》。五七年「反右」掀起後，他因寫了一首題為《紅豆》的詩，歌頌愛情，並歡呼「少女萬歲」、「愛情和青春萬歲」，遂遭到猛烈抨擊，隨即被下放到福建。一九五八及五九年他還發表了幾首詩，其後即長期無音訊，直到一九七八年始獲復出。

一九八〇年，出版了詩集《祈求》。另有詩集數種在整理中云。

《詩選》

丙辰清明

好像閃電
沖進城市的心臟
沖進被監視的春天
破壞黑沈沈的啞啞
讓凍僵的語言甦醒
那血淚奔流
連同絕望的心痛哭
升起壯烈歌聲
爆發了醞釀已久的鬥爭。

不安的陣風
吹向生命墊伏的一切地方
融化封鎖大地的冰雪
解放對種子的束縛
叫詩歌不再沉睡
沖毀重重壓抑
報告時代更生！

二

聖者的血
流在天堂
有如燃燒的花
瞬間即變為種子。

他們在激怒的時候
把長久以來被容忍的
欺騙的圖畫撕得粉碎；
靈魂的珠寶

難以挽回地拋棄
 希望被蹂躪到底
 心靈在深淵旁邊所感到的
 猛醒的暈眩
 連同痛苦刺進心窩
 蔑視從眼睛跳出
 變成一顆未灑的淚！

三

十分鮮艷的未來之花
 在它出生的
 被狂風暴雨所席捲的山谷裏
 無法盛開！

我不願意相信邪惡勢力的輿論
 會傳達任何真理
 讓我們自己當心
 不被謊言的網套住
 馴服地接受它；
 面前伸展着
 荊棘密布的路
 讓我們永遠遵循着
 那普遍受苦的人民的意志
 在浸透鮮血的崎嶇道上前進。

四

當內心的波浪襲擊海岸
 而又退潮時
 騷亂的心靈因痛楚顫抖
 耳中卻轟響着濤聲。

權力至高無上
 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禍害
 使身心都會焚毀的

篡奪竊取的欲望
 彷彿可怕的旱風
 很快使大地的作物全部枯乾；
 在道貌岸然之下
 藏着最腐朽的因素
 到底替自己在生前搞到看得見的標記了！

五

剝奪人民發言的權利
 讓政客把持報紙
 使任何吹牛家都會發迹
 靈魂枯索的他們通權達變
 不斷把腐臭裝在紅瓶裏
 這是獸性的渣滓
 生命之河中的淤泥
 人共唾棄的垃圾！

他們卻毫無慚色地蕭蕭騷鳴
 邁出扭曲癱瘓的昂首闊步
 為高傲而顛狂
 因虛弱而偏激
 在夸夸其談中痴人說夢
 嘲弄億萬生靈
 向毀滅的深淵一直走去
 卻以為已經掌握宇宙！

六

啊，祖國！
 我憂心如焚
 到處在尋找你的踪影：
 那些鴿子那兒去了？

那棵大樹
 為什麼倒身在泥濘

眼前只有小路
又被迷霧封鎖
叫我怎把方向辨認？

到如今才聽見潮聲
讓戰士再次認出你的容貌
展現在一片新生的熱情；
春風再次飛蕩在你的崇山峻嶺。
果實成熟落地
種子在它酸苦的體內
人的權利覺醒
不再忍受任意的欺凌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辰！

1976年4—6月

(選自蔡其矯詩集《祈求》，一九八〇)

《作品簡說》

蔡其矯早期的詩，除了一九五七年前後所寫而受到批擊的《紅豆》等少數幾首，現難於見到。從所存的幾首看來，其風格屬於柔婉的抒情一類。在當時競尚剛勁與「政治抒情詩」的年代，不能不算是較具個性的作品。但詩句的鍛煉上看來，則究竟還是比較平凡。

這首《丙辰清明》，據詩末自記，寫於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六月，也就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兩個月內廣續寫成，他這時已是五十八歲的垂老之年。題目《丙辰清明》，就是天安門事件發生的那天，而內容也就是對天安門事件本身的正面直接的詠吟。其時四人幫尚未打倒，天安門群眾被血腥鎮壓，並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他敢於秉筆直書的寫下這首作品，可說是相當勇敢，值得敬佩。而其內容的生動與洋溢着的熱烈的感情，已使它成為最切近而直接的記載了天安門事件的最優秀的文學證言之。全詩熱烈的歌頌了天安門群眾的怒吼，嚴厲

的批判了當權者的壓迫與暴虐，焦慮的擔憂着國家民族的前途，而歸結於「人的權利」之「覺醒」的期盼。六節九十餘行，氣勢洶湧連貫，讀來不覺其長，而各段亦多佳句。例如第二節的第一段，第三節的第一段，單獨看來也都可自成精警的小詩，而放在全詩中自然也不是孤立的。無疑的，這詩比起作者的早年作品，無論內涵與詩藝，都已有大大的突進。它無負於它的題目，當得起是記載那歷史性重要日子的一篇佳構。

(四) 劉祖慈



劉祖慈（一九三九—），安徽肥西縣人。他於一九五七年在合肥醫校畢業，當過多年城市和鄉村醫生。一九五九年開始發表作品，文革期間遭鎮壓。復出後，一九七八年起寫了較多的詩和散文。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在《詩刊》發表《為高舉和不舉的手臂歌唱》一詩，於次年獲得了「一九七九—八〇年全國中年詩人優秀新詩獎」。

《詩選》

廣場

頭枕古老的都門，
腳抵坦蕩的街衢，
擁抱你的，
是祖國蒼茫的大地。
昨夜猙獰的喧囂，

已經永遠消逝；
只有青年的吶喊，
還呼嘯在人民的心底……

困苦、挫折和損失，
曾經比萬架大山還要沉重；
但革命又雙手支撐着大地，
從血淚中昂然站起！
只是那股紅的血迹，
經過歲月的風霜雪雨，
磨洗得更加清晰，
像朝霞，像晨曦……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1978年11月

（選自《詩選 1949 — 1979》）

《作品簡說》

這也是一首寫天安門事件的詩。題目《廣場》，即指天安門廣場。比之前面蔡其矯那首，則前者是當時直接的悲慨，而這首是事後的追懷。這詩寫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正在這時，中共中央宣告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稱之為革命行動。這詩及時的為平反作出了呼應。它雖然不如蔡其矯那首那樣洶湧浩瀚，却也能在短小的篇幅裡凝聚出寥寥幾筆的鮮明形象，不失為一首精簡而生動的頌詩。

(五)黃翔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起，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允許人民在北京街頭張貼大字報與小字報。人民對專制積壓多年的不滿以及「上訪」、「告狀」的受迫害群眾的冤情，一時如山洪爆發。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逐漸集中在西單電報大樓旁二百米的圍牆上。稱為「西單民主牆」，隨後簡稱為「民主牆」。到次年四月中而再遭壓制，不再出現。這段時間，又稱「北京之春」。

參加民主運動的詩人黃翔（約生於四十年代初期），在「六十年代大陸新詩選析」中已介紹過他的《火炬之歌》。這時，他的另一首代表作《民主牆頌》於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民主牆上張貼了出來。

《詩選》

民主牆頌

——獻給民主戰士們

啊中國，我看見你站出來了，在民主牆上。
你在這兒站着大聲疾呼，大聲發言。
你手裏提着油印機的滾筒，或者一張剛油印好的詩篇，身上沾滿了藍色的黑色的油墨。
你被無數的人包圍着，是的，無數的人，越來越多的人，
男人們、女人們、孩子們。
你大聲地宣講民主，宣講未來，
同時又回答着從四面八方湧來的詢問、疑問和質問。
你的聲音鎮定，你的目光坦白、熱情、自信。
雖然包圍着你的是一片喧嘩和雜亂的聲浪，
充滿了信任、支持、疑慮和擔心的各種各樣的眼神。
你剛掙脫镣铐，手腕上還印着紅色的血痕，
你剛跨出監獄，你身後還迴蕩着兩扇鐵門的吱吱呀呀的回音。
但是中國，你並沒有退卻——
在良心上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

今天，你不再被禁錮在與世隔絕的皇宮的圍牆裏，
 被擱在那些專制者和獨裁者的私有的手提包中，
 你重新把你還給了人民。
 你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一個普通的農民，一個普通的
 士兵。
 你是一個熱情的演說家，被別人駁斥又把別人駁倒；
 你是一個正直的詩人，歌頌藍色的自由，白色的光
 明。
 你是一個思考者，覺醒者，發言者，判決者，選擇
 者，
 一個敢於暴露也同樣敢於歌頌的普通的公民。
 啊中國，或許你會失敗的，會遭受挫折，
 被淹沒在誤解、歪曲或污蔑的聲浪中，重新和自由
 一起被投入監獄。
 但是中國，無論你是戰勝者還是失敗者，
 你都將永遠——
 站——站在民主牆上，
 倒——倒在民主牆下，
 並且將在一部正在誕生的共和國的憲法——人民的
 新憲法上，留下你的偉大的簽名。

（貴陽針織廠 黃翔）

1979年3月19日夜

1979年3月25日張貼於北京西單民主牆上

（原載《啟蒙叢刊之四》）

（選自《大陸地下刊物彙編》第三輯）

《作品簡說》

黃翔這首《民主牆頌》，與他的《火炬之歌》
 寫法不同。它以絕對的自由體意氣豪邁的奔瀉而出
 ，與自由詩祖師惠特曼的雄健詩風極有異曲同工之
 處。語言似從胸臆中噴騰而出，不假絲毫雕飾，而
 自然豐富多彩，充滿信心的有力呼聲，滔滔雄辯的
 嘹亮聲浪，自然的已使腳韻成爲多餘。故它雖不考
 慮押韻的問題，而音韻自然高朗。它內容是充實的
 ，境地是卓越的。當得起是「正氣充沛」，「詞情
 並茂」。非真正的民主鬥士詩人絕難有此篇章。

（六）白樺



以電影劇本《苦戀》而廣泛知名的白樺，也是
 詩人。白樺（一九三〇—），本名陳佑華，河南信
 陽人，早在一九四六年讀中學時，發表了第一首詩
 。一九四七年初，參加學生運動，並與同學合辦了
 一本油印刊物《人民》。同年秋，加入了「解放軍
 」，在軍中擔任宣傳員和俱樂部主任等工作。一九
 五一年開始寫作，小說、詩歌、散文、電影劇本都
 寫。次年，任昆明軍區創作組組長。一九五四年，
 出版了小說《竹哨》和《鹿走的路》。

一九五五年，調「總政治部」創作室創作員。
 同年，出版了詩集《金沙江的懷念》，一九五六年
 ，出版長詩《鷹群》。一九五七年，又出版詩集《
 熱芭人的歌》、長詩《孔雀》和小說《邊疆的聲音
 》。

「反右」掀起後，他被劃成右派，遭開除黨籍
 ，在上海當鉗工。一九六一年，獲派到上海海燕電
 影製片廠協助編劇工作。一九六四年，調武漢軍區
 話劇團編劇，文革期間再度遭受鎮壓勞改。

文革結束後復出，恢復了黨籍，一九七七年，
 發表了話劇劇本《曙光》。一九八〇年，出版詩集
 《情思》。一九八一年，發表電影劇本《苦戀》，
 寫知識份子在文革時的慘況，其中有一句台詞是「
 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爲之轟動一時，遂受到
 軍方發動的猛烈抨擊，已拍成的電影也遭到禁演。
 但一方面則獲得黨內外相當多數人的共鳴與支持。
 同年，以《春潮在望》一詩獲得「一九七九—八〇

年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獎」。

一九八三年發表話劇劇本《吳鉤越劍》，寫越王勾踐伐吳後變成荒淫無道的暴君的經過，演出後再度轟動。同年十月，中共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後，他再度受到批擊，由於他不肯按黨方所定調子自我檢討，傳已再遭開除出黨云。

他於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自選詩集《白樺的詩》，分爲兩輯。第一輯《我的青春在邊疆》收錄一九五二—一五六六年間詩十八首；第二輯《沉默和思考之後的歌》收錄一九七六一—八一年間詩二十三首，共存詩三十八首。

《詩選》

風

宇宙間如果沒有風，
天空就失去了多彩多姿的雲，
雲中就失去了御風飛翔的鷹，
森林就失去了美妙的歌聲……

沉默的風鈴，
僵死的樹影，
不轉動的風車，
水面上沒有紋波……

世界將會多麼呆板，
空氣將會多麼沉悶；
你怎麼做出這樣可怕的設想呢？
兒童般天真的詩人？！

天地間只有相對的靜止，
銀河系由於運動才獲得永恆；
千百年無數人都由衷地感嘆過：
天有不測風雲……

不測而又司空見慣的風啊！

你真是個幽默的精靈；
每一齣悲喜劇的大幕都由你吹開，
一再演出似曾相識的戲文……

土撥鼠說風就是雨，
說雨就成了冰凌；
一剎那又幻想出漫天的暴風雪，
它們在土洞裏把自己嚇得戰兢兢。

風來了，松雪翩翩起舞，
風來了，滿天烏雲滾滾；
狼群撲向匆匆趕路的行人，
多麼可惡！這些嗜血的畜牲！

芸芸的小草，你們就倒伏吧！
有些懦夫卻要責備弱者無能；
乘風飛騰的落葉，你們就高升吧！
羨慕投機的只有商人。

田頭上像煞有介事的草老倌兒，
只有在變幻不定的風中才具有“生命”；
萬古不廢的滔滔長江，
頂風高歌萬里行。

每一次大風之後，
總有一批枯枝敗葉滾進泥坑；
雪松失去的只是渾身的塵土，
芳草天涯處處青……

也會折斷幾棵拔尖兒的大樹，
那有什麼，轉眼又是一片新生的森林；
在風和日麗的大地上，
惡狼又扎上了老外婆的頭巾。

夾着尾巴溜走還會齧着牙再來，
誰也別指望狼會改變本性；
那就讓有記性的人接受教訓吧，
在風裏趕路要睜着眼睛。

千萬別做沒有信念的革命者，
如果你的確在憂慮中國的命運，
即使像拔尖兒的大樹那樣被摧折，
也將無愧於後代子孫。

風從我們軀幹上搖落的種子，
將會發芽、生根……
他們將比我們更高大，
比我們更健康、更英俊……

世界只會更美好，
中國必須向前進！
不斷的风雨只會使大地更秀麗，
只會使空氣更清新！

天上飄蕩着多彩多姿的雲，
雲上飛翔着矯健的鷹；
森林在合唱，
山谷在共鳴；

叮叮的風鈴，
斑斕的樹影，
旋轉的風車，
水面上碧波萬頃……

萬物都要感激風，
不只是為了良辰美景；
風是誨人不倦的教師，
他教草木在泥土裏深深紮根。

他教人類建築堅固的大廈，
製造噴氣飛機和核動力巨輪；
聽！風在發出嚴厲的警告：
人們呀！你們要堅定！

1979.4.15

（選自白樺詩集《情思》，一九八〇）
（又收入《白樺的詩》，一九八二）

《作品簡說》

白樺在他的《白樺的詩》自序中說：「…我不想多說些什麼，這些詩已經說得夠清楚了。關於詩，時至今日，我仍以爲根本的問題還是如何滿足大多數需要詩的人民群眾的需要。詩歌是什麼？當你在大庭廣衆朗誦的時候，它就是人民群眾的吶喊，因此可以引起霹靂般的共鳴。當你在你的同志、親人的耳邊吟哦的時候，它就是你的同志和親人的心聲，因此可以引起秋葉般的顫慄…」對於他這首《風》，我們也不需要說很多話。它以對風的多種情狀的寫照而表達出人生與社會的道理，終則以「要不怕風雨」來自勉而勉人。這詩作於一九七九年四月中旬，正當「民主牆」開始受到壓制收縮之時。則其末句所謂「人們呀！你們要堅定！」或亦可謂大有寄語之深意在焉。

詩潮 再出發！

〈第五集〉要目

高 準 主編
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

- 偉大的鄉土詩人陶淵明（編輯部）
- 我對新詩的看法與期望（皮介行）
- 浪漫主義的新高潮（邱振瑛）
- 東風夜放花千樹（古露琴）
- 民族詩選（古與詩、康有為、高準等9人13首）
- 中年代詩人作品（郭楓、藍采等6人11首）
- 台灣當代青年詩人大展（廖慶等名家名派48人55首）
- 五十年代大陸新詩（高準選輯1艘辰等16人20首）

廿五開一〇六頁 重慶柏森紙張印 定價一四〇元

函購處：台北市敦化南路三六二巷四六二二高準收，掛號發售。

◎文 藝◎

台灣人看草原

陳若曦

二上草原

聽說大興安嶺西面的呼倫貝爾草原，可以找到「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緻。今夏，我再度奔赴草原。

也是八月中旬的事。拜別了蕭紅的故鄉，我和幾個朋友搭上前往滿洲里的火車。夜裏穿過興安嶺，一早醒來，火車剛過臥牛河。這時，窗外出現了蜿蜒的山丘，茂密的森林，還有綠油油的草原。這裏的草原像森林足下的一匹絲綢，隨著山勢的起伏而舒展，平緩順坦。草色蒼翠欲滴，嫩得嬌慵，如美人乍醒的星眸，柔情萬種。須臾，朝陽躍上林梢，照得草原像碧玉般，晶瑩光亮。花紋斑駁的奶牛，三三兩兩點綴其間，襯著藍天白雲，一片風光旖旎。

這種景緻並不陌生，廿年前在瑞士首見，以後在北美洲也常經驗。然而，在中國土地上重逢，感受又自不同。除了美得令人驚喜，它還激發一份自豪、一份親切感。

比起陰山之下的沙漠草原，呼倫貝爾真是得天獨厚。水源受到森林保護，草長得十分茂密，有半尺到一尺高。正值夏季之末，到處見到打草成捆，紮得結實如石板，便於輸送，以供牲畜越冬之用。

草原上不時出現電線桿，顯示現代文明已和它結了緣。電線桿上佇立著蒼鷹和黃鷹，像是草原的守護者。蒼鷹展翅飛翔時，遠看如穿雲疾走，帶動得整個草原生氣勃勃。

呼倫貝爾草原寬濶無邊，但沒有靜寂感。草長鷹飛，連雲彩也詭譎多變，聚散無常。日頭到這兒，把自己變成了頑童，只知追逐白雲嬉戲，何時藏頭露臉，全憑己意。驅車草原只不過半小時，便經歷了微雨和陰晴三種截然不同的變化。

訪問牧民那順一家，是此行最有興味的一件事。

那順夫婦和兒孫輩，三代九口人，共住三個蒙古包。待客的蒙古包是二老所住，非常寬敞，地上鋪著厚實

• 草原上的蒙古包

的毛毯，這角上另擺了張小床。皮箱疊得塔高，彩色電視頂著收錄兩用機，帳篷前面還停了一輛摩托車。他們利用風力發電，據說很方便，只要有二級風便足夠收看電視。

主人說，目前豐裕的生活，主要是這二年來掙來的。八三年允許牧民單幹了，他領著兒女們起早摸黑地幹，很快變成了萬元戶。牧民的財富似乎不難估計：一個蒙古包值三千元，一頭牛一千，馬五百，羊八十。那順家三年前領養了八十頭牛，二百匹馬，五百隻羊，如今幾乎翻了一番，家業之大，可以想見。

他家的財富也可以從十四輛勒勒車揣摸出來。這種牧民自造，以樺木為軸輪，直徑一米半的雙輪車，上搭木棚，覆以皮毛和樺樹皮，用途頗廣。拉水、運燃料、搬運蒙古包外，婚喪嫁娶也可乘坐。它可以單獨用馬拉，也能首尾相連而組成車隊，前頭套馬。行駛在碧波如海的草原上，它們可像船隊了。

他家另有一輛三輪車，支架和扶手用鐵棍，車門垂簾，號稱「草原坦克」。這種車以前有王公貴族才能乘坐，現在已平民化了。

那順留我們吃午飯。請教他們夫婦姓名時發現，蒙族沒有姓氏。這很像冰島人，沒有固定的姓，只知道是某某之子女，隔代便失去承續關係。好在游牧生活能加強親族的凝聚力，血源關係容易辨認。

那順夫人年紀不到五十，性情渾厚，步履健壯。臉上佈滿草原風霜，笑容樸實憨直，却又含蓄深邃。她很

好客，領著兒媳煮麵條，又宰了一只羊做手扒肉。漢人一般吃不慣這種白水煮肉。在座的半打客人中，只有北京來的張桐（他曾在內蒙住了六年）和我吃得津津有味。白煮羊肉沾韭菜花汁，其味鮮美無比，我吃了一整只羊腿和大塊排骨。南方佬這麼能吃羊肉，把主人喜得笑不攏嘴。

主客席地而坐，矮几上還擺上了蒙人早晚的吃食：奶茶、奶酪、奶皮子和奶菓子（油炸奶麵製品）。奶酪帶酸味，和歐美奶酪味道有異，由於缺乏蔬菜水果，吃肉的人必須喝奶茶，才相得益彰。客人中，只有我和張桐飽得晚餐都吃不下，其他人大都以麵條裹腹。

蒙人宴飲不可缺歌。那順請了旗裏女歌手來唱祝酒歌。他本人喜愛歌舞，年輕時曾到北京表演過。他雖自謙老來嗓門不行，在眾人鼓噪下，到底引吭高歌了一曲，果然寶刀未老。

那順家屬於半游牧，這是目前較通行的生活方式。夏天選個水草豐美，高亢通風的地點紮營，冬天則遷移到避風的山谷裏。越來越多的蒙族考慮定居方式，據說這樣對推廣教育最有利。

那順剛為老二娶了媳婦，一家人喜氣洋洋。如今蒙人嫁女已不索取聘禮，父母賠嫁牛馬各一，相當開明。

草原明珠達賚湖

地理老師曾說，呼倫貝爾草原的名稱，來自呼倫湖和貝爾湖，它們是草原的一對眼睛，一雙明珠，漁產豐富。

到了草原，念念不忘要去瞻仰這對明珠。

地理老師可能不知道，外蒙古獨立時，鑑於中蒙兩國「兄弟友好」，經過交換協商，中國把貝爾湖劃給外蒙，只保留一段湖濱的捕撈權。中國的睦鄰之道，堪稱世界第一。

呼倫湖如今恢復舊稱為達賚諾爾，簡稱達賚湖。它是內蒙最大淡水湖，面積兩千兩百多平方公里。湖水澄澈，浩渺如海，岸邊處清可見底。嬌陽下，水光粼粼，翡翠般綠。外行人也看得出，湖水富含有機物，魚飼豐富。

漢字「鮮」是由羊和魚構成的，祖先早已視此為人間美味。蒙人本來喜愛吃魚，後來傳進喇嘛教，禁止吃魚。本世紀中葉，破除了迷信，才逐漸恢復魚食。

在呼和浩特時，曾品嚐了有名的黃河鯉魚。蒙族作家安柯欽夫說，達賚湖有全魚宴。到此一嚐，果然名不虛傳。

鯉、鯽、鮫、白魚是達賚湖主產。以前，據說湖魚多到「魚聲喧囂，飲馬不進」的地步，但已今非昔比。然而，即使在五十年代，冬日鑿冰捕魚，一網可以撈起三噸魚。現在，湖上共有兩只機船捕撈，一網只有三到五百斤而已。

這兩年發展旅遊事業，湖邊蓋起了有兩百床位的觀光旅館。當家的經理卅多歲，極有企業眼光。冬閒時把服務員送到內地培訓，堅持「顧客第一」原則，更有一本擴充營業的藍圖。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觀光客

潮湧而來是指日可待的事。

旅遊是無煙囪的工業，但若處理不當，也會和湖魚捕養失當一樣，造成不良後果。

我在湖邊走了一下，發現圈出的游泳區內，人們在身上打肥皂洗澡，把大好魚塘當成澡盆了。此外，供觀光客垂釣的河邊，人們用玻璃瓶裝餌釣魚，以致地上滿是碎玻璃渣，相信河內也難倖免。

濫捕已造成漁獲銳減，若再加上環境污染，魚產前途堪憂。這草原上僅有的明珠，希望大家把它當自己的眼睛那般愛惜才好。

邊城滿洲里

火車駛進滿洲里站時，只見僅有的一條月台上，孤立著一棟老式的西方建築，漆成明亮的土黃色。它令我想起四十年代，日本佔領台灣時，南部小城的火車站。

滿洲里的火車站台是俄人於一九〇三年建的，格局適合當時邊境的轉口小鎮。如今城裏人口近三萬，加上轄內煤礦的幾萬名職員，要應付客運和貨運，車站便顯得捉襟見肘。每當火車進出時，附近交通一片堵塞；月台上車滿為患，調頭都煞費周章。拓建站前廣場或停車場，似乎已成燃眉之急。

滿洲里是滿語的自稱，意思說，滿人疆土自此始。可惜大清帝國顛覆，「有邊無防」，土地被沙俄蠶食。本來是，中國最冷最苦的北方，却是人家最暖最夢寐以求的南疆，無時不在覬覦。連日本也不遠千里，跨海而

● 蒙古人的傳統武術——角力。



色彩的協調和變化，美觀中透著典雅，頗有歐洲萊茵河畔的小城情調。特別是建築帶有俄國特點，像玻璃窗加建朝外對開的木門框，比哈爾濱還多些異國風味。

記憶和傳說中的滿州里，是個多民族的雜居地，白俄、猶太、日本兵、朝鮮人，不一而足。加上各族妓女在此淘金，也是個罪惡淵藪。如今，城裏有幾棟建築，是沙俄和日本商行的前身，此外已無舊時痕跡可尋。

城內有紅軍烈士紀念公園，紀念四十年代東北解放時捐軀的紅軍戰士。老一代的蘇聯人還常過境來憑弔。

參觀公園時，不禁想起老作家蕭軍來。紅軍幫助共產黨解放東北，誠然有功，但也乘機掠奪大批工業設備，不肖份子甚至姦淫婦女。蕭軍提出批評，為此沉淪了大半輩子。中國人喜歡「隱惡揚善」，此是一例。

難得來到一個沒有車馬喧的城市，不禁要到商場走走。百貨店裏貨色齊全，而且高檔商品多，價格和內地不相上下，固然邊城有工資補貼，一般人購買力強，相信國家也貼入不少運費。由於顧客稀少，服務態度十分文明，允許看貨比貨，自八二年回國觀光以來，這是僅見的一次。

書店亦然，書店上羅列著許多內地脫銷的緊俏書，還讓顧客自行挑書。機會難得，同行的朋友嚷著行囊過重，却又紛紛買書。我已有柯雲路題贈的著作，仍忍不住又添了一套，準備返美以饗同好。

我喜歡逛農貿市場，這裏市場只有一條街段大。凍肉堆成山，蔬菜少

來搶奪。小城真是歷盡滄桑。

滿洲里首先被帝俄霸佔。一九三一年，日俄戰後，又落入日帝手中。附近的草原和煤礦備受掠奪和蹂躪。煤礦以最原始的方法開採，華工充當苦力，造成白骨累累。一九四五年，它才回到祖國懷抱。由於蘇聯在領土方面，也繼承沙俄的蠶食和擴張傳統，導致邊界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八三年，這個城市才開始對外開放。

走遍全中國，還很少看到像滿洲里這麼整潔美麗的小城。每條街都種行道樹，家家門口植花草。車稀人少，不聞喧鬧。它是內蒙僅有的「文明城市」。爲了贏得這個稱號，去年花了許多石灰和油漆，把市內街道店舖和機關民房，全粉刷一新。特別講究

● 中、蘇邊境，圖為移動的中共軍隊。



而且長得小。菜花只有拳頭大，泛紫色，名副其實的花，也像一顆珊瑚。

小城的空氣，潔淨無比，走在街上可以暢快呼吸。行人都像在散步，生活調子非常從容。太陽下山，商店便早早打烊，入晚，街道一片岑寂。人到這兒，不用安眠藥，個個沉入睡鄉，這兒的人一定健康長壽。

城北是國境線，距城中心十六里，十六里便成了地名。久住加拿大和美國的我，習慣了隨意穿越邊境，思想麻痺大意，離開蕭紅故鄉時，帶了幾個西瓜和香瓜，打算到邊界慰問邊防軍，到此才發覺不可能。

不過，我們終被允許，去參觀了國際列車的最北站，並隔界瞭望蘇境。

兩國的車站都豎著高大的牌坊，間隔約兩百米。蘇方漆紅色，大字劃出國名。中方藍色，無國名，以示「疆界未定」。據說相爭不下的是區區三根枕木的地盤。

比起草原明珠貝爾湖，三根枕木真是微不足道。但是中國人講原則就表現在這種地方。友好時，一切好說；不友好，那就寸土必爭。

中國和北朝鮮，一直同車同軌，和蘇聯就不一樣了。國際列車一過紅牌坊，要立即架高，另裝車輪才能行駛在他們的鐵軌上。旅客站在中國境內，若用望遠鏡瞭望蘇方車站，或拍照，都會引起對方驚惶抗議。他們用閉路電視，偵察這邊的一舉一動。跋扈心虛，莫此為甚。

中國對外開放滿洲里，真是明智而且坦蕩大方。其實，邊境車站也不妨考慮開放。在偵察衛星滿天飛的八

十年代，邊防已大大降低機密性。讓世人親眼目睹蘇聯的專橫虛弱，也大有宣傳價值。

離滿洲里前，去遊覽市內最大的北湖公園。

公園以湖名，不料未見一滴湖水，湖底已曬成陸地。附近農民抽水灌溉，早破壞了泉眼，又逢今年夏天旱，竟出現這種底朝天的景象。

湖旁種了幾行楊樹，滿目黃葉，風過處颯颯飄落，益增蕭索。才八月中旬，秋天已提前降臨北國。我漫步湖濱，凝視著涸池落葉，內心的嘆息竟比秋意還深。

滿洲里以前叫布魯金保勒格，蒙語「泉水旺盛之地」。如今，連一個公園湖也難於維持，地下水位下降的嚴重性，已到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水是草原的生命，農耕和工業若 unlimited，無異竭澤而漁，損失的不止是風景而已。

我是外行人，僅憑兩次草原過客的印象，深感草原的開發，農耕是大忌，近乎自殺。草原表土太淺，一旦裸露，很快變成沙礫地。聽到不少例子，種地一年，收穫差不說，要用十多年才能恢復草地面貌，真正得不償失。可嘆的是，侈言農墾的常常是運籌千里之外，腳不曾踏過草原的決策者。歷史還時常重演。

草原發展有先天限制，移民要有控制才行。草原也只宜畜牧，只能用科學方法提高效益。農耕不但要停止，最好能還農返牧，讓草原止於草原，草原才能永恆。

（八六年十一月寫於柏克萊）